

社會科學研究集刊

9

南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出版

目 錄

| | |
|---------------------------------------|--------------------|
| 讓我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壯大成長..... | 林衍忠..... 1 |
| 系統分析經濟資料深入研究土地問題..... | 秦林秋..... 2 |
| 英殖民主義勢力侵入北婆三邦的幾個歷史問題..... | 王 平..... 4 |
| 凱恩斯及其就業理論..... | 陳啟寧.....10 |
|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聯合邦的民族教育問題 | 程 衆.....12 |
| 馬來亞紗廠為什麼會關閉..... | 堅 毅..... 18 |
| 歷史科學及其任務..... | 史丹青.....21 |
| 包工制度在建築業..... | 陳 彬.....25 |
| 我國民族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特徵..... | 小 川.....30 |
| 回教改革運動在馬來亞..... | 陳蒙鶴..... 39 |
| 1938 - 1957 馬來亞對外貿易概況與特徵 | 范小秋..... 35 |
| 關於商業利潤..... | 易書源.....40 |
| 農業國家工業化的若干問題..... | 華碧譯..... 43 |

本會一九六二年度職員表

| | | | | | |
|-------|---------|---------|---------|---------|-------|
| 顧問 | 會長 | 秘書 | 財政 | 研究 | 出版 |
| 莊竹林博士 | 正：林衍忠 | 副：張佩玉 | 正：楊有瑞 | 副：葉瑞人 | 正：李凌千 |
| 嚴元章博士 | 副：劉行驊教授 | 正：李祥麟教授 | 副：黃應榮博士 | 正：林我將博士 | 副：李闕水 |
| 林我將博士 | 正：陳澤農 | 副：王祿堂 | 正：郭孝信 | 副：林謀騰 | 正：鄭錦祥 |
| 黃應榮博士 | 正：李炎光 | 副：韓亞疇 | 正：謝明元 | 副：傅孫中 | |

讓我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壯大成長！

本會會長：林衍忠

雖然擺脫了殖民主義者的直接統治，但却延續着殖民教育政策的今天，南大的存在和發展，在在遭受着權貴們的敵視和抑制。無疑的，這些打擊和扼殺正是民族教育在不合理的社會和不平等的教育政策下必然的遭遇；不消除不合理對待民族教育的野蠻態度，民族教育就一天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無論如何，我們堅信，任何對南大打擊的陰謀，在全力維護民族教育強大力量的捍衛下，必定無法得逞。

對自己民族教育所持的態度，正是驗證這個民族的自尊的最好尺度。今天，華文教育正遭受沉重的壓制，華校學生年年銳減，無形中是對華文教育一個致命的打擊。現時的維護民族教育面臨着一個嚴重的考驗階段，也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慘淡的現況下，唯有羣策羣力，不屈不撓，自力更生，才能找到正確的出路，才能導使民族教育的生存發展得到切實的保障。我們深信，渡過了苦難的時期，民族教育必定能夠蓬勃地發展。

同學們！在一個衰朽的社會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光榮無愧地把自己鍛鍊成一個堂堂正正有用的人。我們一方面要頑強地學習，一方面要作為一個新生活的創造者，五年來我會即秉承着這一貫的立場和遵循着這一一定的方向：熱忱地探討祖國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深刻地認識祖國的真實面貌。我們自信不會辜負人們的期望，也沒有辱沒自己。無庸諱言，限於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能力所及的社會深度和廣度，還不能使我們自己感到滿意，必須再接再厲，自強不息。事實上，我們不過份強調客觀的困難，但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實實在在是嚴重地侵犯了學術的研究。政府嚴厲禁止書籍的入口，使我們不能得到豐富學識的滋育，政府唯我主義的文化政策，使我們沒有學術的研究自由。個人無法突破「封鎖」，但是，集體智慧却能使重壓下的學術研究的花朵燦爛盛開。如果以現實的眼光和客觀的態度對待南大，將更感到我們在困難環境中取得的微小成績是值得珍惜的。雖然我們的努力還不能達到社會所要求的地步，尤其是經過長時期殖民統治後千瘡百孔的

社會遺留下來的許多腐朽殘餘，仍然深藏在現社會中，待於暴露。我們的研究更顯得不足和微不足道。

況且現實生活使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學術的研究不能僅僅為了學術，也不單單局限於純理論方面，學理的探討，雖可作為實際深入研究的指導，但却不能孤立單存，唯有配合現實課題的研究，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雖然我會二度提出的社會調查的「鄉村調查報告書」和「漁村調查報告書」還待社會的評價。無疑的，親歷的考察和搜集資料後的研究，不僅擴展了我們的視野，加深了我們的認識，並且為社會反映了鄉村和漁村的真實面貌，提供可靠的資料，作為各有關方面的參考，使學術的研究貢獻出現實的社會價值。我會今後將繼續遵循這方向做去。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我會中堅組成部份的文學院經濟學組，今後歸屬於商學院，自成一系。很顯然的，作為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將不會因大學當局行政上的變動而受影響，它仍不失為一個全校性的學生學術組織，也不至使我會一貫的立場和方向有絲毫的改變。值得重視的是，我會今後將是商學院的一個新夥伴，前此的置身今已大不相同。新的環境需要我會以新的姿態出現。

過去由於院系的緣故，我會與商學院同學的關係不很密切，現在既然是同院的學術團體，自應重視同學的學術研究。我們相信，新力軍的參戰，將能使我會在學術疆場上取得更輝煌的成績，況且我會的學術研究正與商學院各系的課程內容，相輔相承，互相為用。實用的學識可以補充理論的修養，或於學習理論之餘兼而掌握實用的技術。

新的環境存在着新的發展條件。

在「加強會員聯繫，研討我國經濟」會務方針的指引和會的領導下，我們將為同學的學術研究創造有利的條件而努力。

同學們！要排除萬難，頑強地學習，要經受攷驗，做一個真正的人。讓我們在學習疆場上勇往直前，在艱難的環境中壯大成長。

系統分析經濟資料

深入研究土地問題

秦林秋

(一)

任何想要進行認真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人，都會知道收集豐富的資料，在研究工作上的重要性。不論我們所要進行研究的是那一方面的課題，收集豐富的資料，深入分析資料的種種發展形態，探索資料各種發展形態的內部聯系，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只有認真地，實事求是地從這樣的一個過程中走過來，我們才能針對問題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判斷，才能掌握問題本身所固有的，而非我們主觀所臆造的規律性。如果離開了資料的廣泛收集，離開了對於資料的去蕪取菁，棄偽存真，由表及里的周密、系統、認真的調查研究過程，任何正確判斷的取得，任何客觀規律的掌握，都是不可能的。

今天，隨着人們對於我國事物日益增強的廣泛關注，隨着人們對於我國當前重大課題的熱烈研討，我們迫切須要知道的，是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際情況，是我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近幾年來，論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章的出現，也漸漸地多起來。可是，在經濟方面（只談這方面），資料的收集，仍然是零碎的，缺乏周密系統的分析研究。資料缺乏的感覺，依舊是我們今天許多有志於我國經濟課題研究工作的人，所深為困惱、並感到棘手的問題。有必要指出，缺乏系統的周密的收集資料加以研究，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情況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依然是我們今天在我國經濟課題研究工作中的一項不可忽視的缺點。說句衷心的話，對於我國經濟的現狀，我們實實在在所懂得的，還是不多。我們只知道，我國的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但我們却還不完全知道，像我國這樣的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會所固有的經濟規律與具體的特徵是什麼；我們只知道，地租在我國社會里是個廣泛的經濟範疇，但我們却還不完全知道，在封建主義土地制度下與在種植園這種生產形式下地租的實際內容；我們只知道，今天的廣大種植園的土地，極大部分是由農民、小生產者手中掠奪過來的，但我們却還不完全知道，這個從農民、小生產者手中掠奪土地過程的真正內容；我們只知道，大約在19世紀，外國資本主義的力量侵入了我國的封建農村，但我們却還不完全知道，外國資本主義力量的侵入在我國的封建農村中是引起怎樣的一個特殊的變化過程……。總之，一句話，我們今天所懂得的我國經濟面貌，只是一鼻一眼，還不是個「全貌」。隨着我國反殖事業的日益發展，我們完全有必要，並且完全有這個義務，來正視這項缺點，改善我們對於我國經濟課題的研討工作。我想，倘若我們要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研討我國經濟課題，要使我們所寫的文

章，不是英文資料的翻譯重版，不是資料原本的一二三四的排比羅列，那麼，有組織地進行資料收集工作，周密地系統地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便完全是今後的一項必要步驟。

今天的馬來亞並不是一個什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一個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外受殖民主義力量的摧殘，內受封建主義勢力的壓迫，他們本身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因此，在馬來亞，我們也就無從看到，像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為了適應資產階級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需要，所刺激帶動發展起來的各種為這目的服務的研究機構。在那樣的國家里，競爭與發橫財的慾望，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撥出一筆利潤，去僱傭一批學者為其服務，為其研究市場情況、生產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這種研究工作是為社會作出了收集資料的工作。當然，他們只能從追求最大限度利潤這個觀點出發，來處理他們所能夠搜索到的資料。我們也無從看到，像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為了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生活與文化水平的需要，為了日益提高生產技術的需要，所刺激帶動發展起來的各種為這個目的服務的研究機構。今天的馬來亞，還不是那樣的一個國家。今天的馬來亞，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地位上的受盡壓迫，使他們既使在這方面多多少少有所作為，也只能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在今天，如果我們要研討我國的經濟現狀，我們還得去翻查諸如“*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之類的書籍。這種現象的存在，為每一位有志於我國經濟現狀研究工作的人，提出了一項極其重大的任務：必須為我們民族的需要，為我們自己的需要，有組織地廣泛收集有關我國經濟的一切資料。這項任務，究竟是極其繁瑣，難以見到成績的。但是，這又是一項具有極其深重意義的工作。我國反殖事業是否早一點取得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說，將要看我們是否能夠合乎客觀實際地認識我國的經濟面貌。我想，採取點滴然而有步驟、分工然而有組織的原則，我們是不難完成這項任務的。

尋根究底地說來，長期的殖民統治是造成我國在這方面的落後狀態的主要因素。像普都却里的「馬來亞經濟的所有權與控制」一書那樣，站在馬來亞人的立場，比較有系統地研究我國經濟課題的書籍（當然，這并非就等於說這本書毫無暇疵）的出現，還是近幾年來反殖運動高漲結果。雖然，為數少得很，但，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我們今天所能夠找到看到的一些資料，極大部份，還是英殖民地官員或是與殖民地官僚機構有關的人士（或是與外資有關的人士）所書寫的東西。這些東

西，極大部份，是用英文來書寫的。爲了長期維持殖民統治，殖民主義統治者，是需要了解我國的風土人情，了解我國的過去與現在的（外國資本家也是要知道這些事物的，只不過他們的目的，在於掠奪利潤）。正是爲了適應殖民主義統治者在統治上的需要，我們今天才見到爲數頗多的殖民地官員或與殖民地官僚機構有關人士所書寫的東西。也正是爲了適應殖民主義統治者在統治上的需要，我們也才見到，在這些東西中，他們總是這樣那樣地竄改、歪曲或掩蓋我國的史實。這種現象的存在，又爲每一位有志於我國經濟問題研究工作的人，提出了另一項重大任務：對待資料，不能蕪菁僞真都一視同仁；必須進行系統的周密的深入分析，必須去蕪取菁，棄僞存真，由表及里，找出其內部的聯系。在處理資料的問題上，我們既反對一視同仁地將資料一二三四地排比雜列的現象，我們也反對不作分析研究地將別人的觀點原樣照搬的現象。我們贊同的，是將資料周密地系統地加以分析研究，加以催化溶合，變爲適應我國反殖事業需要的東西。這確是一項極艱且難的任務，有待於有志於此的人士的集體的共同努力。

(二)

像馬來亞這樣的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隨着國內國外形勢的變化，在經濟方面，尚待研討的問題，實在是多而複雜的。一般地說來，在研究工作上，我們是需要實行各面關注、多方研討的方針的。但是，爲了配合我國當前形勢的需要，我們又有必要集中全力，擊打一點。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在紛紜複雜的問題中，緊握住某些與當前形勢具有最密切關係的問題，將它放在第一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集中全力，勤苦鑽研。尚處在民族民主運動階段的我國，這項當前的、最重大的經濟課題，應該就是我國的土地問題。我想，這已是毫無疑義得了。許多從殖民地，半殖民地鎖軛下解放出來的先進國家的經驗，早已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

在今天，幾乎所有對當前國際形勢，尤其是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運動形勢略有關注的人，都會知道，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裏，民族運動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在這樣的國家中是佔人口的絕大部份。他們也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羣，因此，他們是工人的最可靠的朋友，是民族民主運動中的最重要的主力軍。今天，我國社會的性質，既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我國的當前政治任務，既然是反殖反封建，那末，如何使被剝削與壓迫的農民在其自覺地投入我國的反殖反封建的鬥爭洪爐時，敢與一切反動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敢於堅持鬥爭，敢於勝利，這便是一項極其嚴重的問題。歷史已經證明，要徹底地完成我國的反殖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不去合理地、徹底地解決我國的土地問題，消滅封建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不行的。

上面所說，就是爲什麼每一位有志於我國經濟課題研究工作的人，應將土地問題放在第一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集中全力，加以研討的原因。是現實的需要，決定了我們當前的主要研究對象。現在，不妨再讓我們略爲具體地談一談土地問題的嚴重意義。

我們有必要從這樣的問題談起：一切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如何建立絕大多數人所共同享有的真正民主政權的問題。我國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不合理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樣的一種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在過去，是殖民主義統治在我國內部的社會基礎，在現在，則是反動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基礎。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長期以來，使到我國的農民處在一種極端貧困落後與思想閉塞的境地，這就是爲什麼殖民主義與反動政權得以維持其長期統治的主要因素。建立在這樣的一種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的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基礎上的一切政權，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質的。這樣的一個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在過去、現在以及當它尚未被徹底改革的將來，將依然是我國社會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嚴重障礙。爭取一個爲絕大多數人所共同享有的真正民主的政權，合理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這才是我國真正獨立，民主的可靠保證。我國廣大人民的生活尚待改善、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有待發展，但我國廣大人民生活的真正完善化，我國經濟建設的真正發展，只有在這樣的真正民主政權建立起來後，才有可能展開。

我國目前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我國工業化的嚴重障礙。誰都知道，發展工業需要資金與市場。但是，市場的縮小與資金投放在土地上，而不投放在工業部門，都是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與殖民主義勢力的剝削與迫害的必然結果。

在一般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以地租形式爲地主所佔有的超過平均利潤部份的剩餘價值，是爲地主所消費掉的，並不重新投資到工業部門去。在我國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地租却是封建性的，佔有了農民全部的剩餘勞動，並且往往也吞併了必要勞動的一部份，因此，農民只可能進行簡單的再生產，甚至日益縮小生產規模。在農業生產上，根本就不可能有着資金的積累。以地租形式累積起來的的大量資金，爲地主所佔有。它的一部份，變爲地主奢侈生活的藥費；它的另一部分，則轉化爲高利貸與商業資本，成爲併吞土地主要手段。民族工業的受盡迫害，阻塞了資本由土地流向工業部門之途徑。合理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政策之一，便是禁止土地的買賣，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國家壟斷土地的措施。這不但消滅絕對地租，而且也根絕資金流向土地的不合理不正常的現象，爲我國工業化的資金，開闢了一大源泉。

我國目前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實質，就是地主對農民實行強制的超經濟的殘酷剝削。在這種殘酷的剝削之下，我國農民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益破產的命運。農民生活的日益相對貧困化與絕對貧困化，是我國農村的一項顯著現象。殘酷剝削使到農民的購買力日趨下降。合理地、徹底地解決我國土地制度政策之一，便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一般地保護農民土地所有制。這就不但使農民獲得了生產手段，而且也大大鼓起了農民生產的熱情。農民的生活條件、生產條件，便能逐漸改善，其購買力也日益提高。這就爲我國的工業化開闢了廣大的市場。

我國目前的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妨礙農民生

英殖民主義勢力侵入

北婆三邦的幾個歷史問題

王平

(一) 18世紀英人的侵略

18世紀下半期，英國產業革命已踏入第一階段，英國東印度公司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合股公司。(1)並且兼有東方貿易獨佔權與戰爭權，真正成為國家向外侵略的工具。於是，英國人到馬來半島和北婆羅洲大肆活動。1762年，蘇祿蘇丹簽約割讓從汶萊手中得到的北婆予英國東印度公司。英殖民主義勢力侵入北婆，直接威脅着領土相鄰的汶萊建封王國，在一步步的向汶萊緊逼。

1774年，汶萊蘇丹允許納閩島成為英國的商站，英國東印度公司奪得了胡椒貿易的專利權，這比過去16、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義者還要嚴重地破壞了汶萊王國的社會經濟，事實告訴我們：自汶萊王國喪失胡椒貿易專利權之後，「18世紀末葉，汶萊船塢雖可容納六百噸，而商船數目遞減，每年僅有七艘。華僑椒園雖拓于穆盧(Mulu)山下而胡椒之貿易一蹶不振。正當之貿易盡行廢止，諸島皆然，商業完全凋殘。」(劉彥譯英人 H. R. Hughes-Hallett 著之汶萊史綱)。

英殖民主義勢力的侵略，雖然當時主要是在商業貿易方面的壟斷，但其影響汶萊王國的社會經濟是非常深刻而且長遠的。我們知道：汶萊封建王國原有的經濟體系有三個主要的組成部份，也就是說，汶萊封建王國國家經濟有三根支柱：最基本的組成部份是直接統治地區的土地稅收，比較次要的組成部份，一是對外商業貿易的收入，一是封建附庸地區的貢禮。然而，到了這時，在英國商業資本勢力的侵略活動影響下，即在英東印度公司一方面于納閩島設立商站，以控制從新加坡到香港和中國這條中西海上交通路線，取消了汶萊王國過去對

中國進行貿易所佔的地理優勢，另一方面壟斷胡椒貿易的市場，使得作為汶萊王國國家經濟支柱之一的對外商業貿易關係崩潰了，即使以後能夠恢復與中國的通商關係，但也競爭不過英殖民主義勢力的雄厚資本。同時封建附庸地區的貢禮又是極不穩定的收入。或者貢禮很少，或甚而完全沒有，實際上，這時汶萊蘇丹對鄰國都較遠地區的統治主權，有名無實，所以，汶萊封建王國的另一經濟支柱也崩潰了。獨木難支大廈，單單靠土地的稅收，是不可能維持封建貴族奢侈豪華的生活享受，那麼，汶萊封建貴族只有加緊對農民的剝削來滿足其無厭的慾望，但過度剝削的結果，農民普遍赤貧化，奴隸化，終於脫離土地耕種的農業生產隊伍，鋌而走險，搶劫來往商船，做起海盜來了；況且，海盜的領袖，有些還是封建貴族，這是因為汶萊封建貴族從事海上商業貿易的利益，被英殖民主義者剝奪掉了，轉而組織和領導馬來村民或海達雅人。(2)搶劫英國的來往商船。於是汶萊成為海盜的巢穴，四十年來的英國商船地圖都警告商人不要進入汶萊的，免致死之。(3)海盜的隊伍日益擴大，相對的減少了從事農業生產的隊伍，這就是說，汶萊王國封建的土地稅收也隨着相對的減少了，汶萊王國封建經濟體系的最基本組成部份，最主要的一根經濟支柱也就受外來侵略勢力的影響，而被剝弱了，蛀蝕了。

海盜的問題，令西方殖民主義者感到頭痛。這問題一直拖到19世紀，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日益加劇，這是什麼緣故呢？那我們就得先了解西方殖民主義者所謂「海盜」的本質。我們說過，組成海盜的隊伍的基本成員是農民，他們參加了海盜的隊伍，便可避免土地租稅的

產技術提高的主要因素。殘酷的剝削，使農民連簡單的再生產也難以維持。農民不得不以日益降低自己生活條件的方式來維持日趨縮小的生產。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產條件、改革生產技術，是必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亦促使那些有能力改善生產條件，改革生產技術的農民，不願進行這麼一項改革工作。因為產量的提高，總是同時帶來地租的相應增加。我國稻農的稻米之所以只有「一造」，在極大程度上，並非是由自然條件造成的，而是由社會條件造成的。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一般地保護農民土地所有制，將能鼓起農民的生產熱情，刺激農業生產技術的逐步改善與提高。

應該在這里指出，在我國的土地經營方式上，尚存在着殖民地的種植園的生產形式。這種殖民地種植園，基本上，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由於我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它仍然保留着極大的落

後的封建的成份。在這方面，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商品化農作物的小生產者，但，外國壟斷組織在生產中佔據統治地位。這種殖民地種植園生產形式的實質，就是以殘酷地剝削農業工人的方式，以掠奪商品化農作物小生產者的勞動價值的方式，維持外國壟斷組織的最高限度的利潤。對於外國壟斷組織來說，聯合社陣在最近的立舉改選中所提出的「國有化」的口號，是正確的。對於目前尚存在的大量商品化農作物小生產者來說，合作化的道路，將是一條引向繁榮的光明的康莊大道。

上面所述，是關於我國土地問題的一般性質與解決的一般方針政策。土地問題上的民族的、具體的特徵，尚有待於有志於我國經濟課題研究工作者的努力。我覺得，在這方面，應該重視下列幾點：

第一，我國土地經營方式上的兩種類型（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與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種植園生產方式）的同時存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具有

壓迫，不承認封建統治的權力，因此這種海盜，在本質上來說，是農民起義的另一種表現方式，是具有一定的反封建鬥爭的積極意義，農民或海達雅和封建貴族聯合起來，搶劫來往的西方商船，打擊和對抗各國殖民主義勢力壟斷性的商業貿易活動，這是具有一定的反殖鬥爭的積極意義。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海盜的隊伍，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支反封建反殖民鬥爭的隊伍。不過，農民參加了海盜隊伍，並沒有推翻汶萊封建王國的政治要求，主要的目的只是在於暫時逃避封建勢力的重重壓迫，加以大股勢力的海盜隊伍受汶萊封建貴族的領導和控制，因而不能像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一樣，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迫使封建統治階級作一定程度的讓步，舊王朝的封建統治長期繼續維持下去，這僅僅是一種自發性的反封建鬥爭，談不上有什麼政治口號提出；同時，封建貴族組織海盜隊伍，主要的目的在於劫掠商貨販賣奴隸，頂多不過是向殖民主義者進行報復而已，不是有計劃性的全面展開反殖的海上鬥爭，那也不能說有什麼反殖的政治目標。由於如此，海盜隊伍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非常容易墮落變成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盜寇之流。

(二) 19世紀初汶萊各省的社會性質

19世紀初，從沙撈越邊境到民都魯 (Bintulu) 以及更遙遠的地區，分成五省，各由一位汶萊朝廷派來的總督統治。但這些省份的總督，實際上只是名義上的統治者，當地的部族多不接受政府的控制。汶萊封建統治勢力所能壓服的只有馬來族，陸達雅族和沿海一帶的馬蘭諾族。在峇當魯巴河流域的海達雅族，與峇南河流域的加央，肯雅族，根本不受汶萊封建勢力的統治。

當時汶萊王國各地區的各個土著部的社會發展是很不平衡的；馬來族最爲先進，汶萊封建王國便是他們所建立起來的。事實上，早在16世紀末期，馬來部族所建立的汶萊王國已進入比較成熟的封建社會階段，維持封建統治秩序的古代憲法也確立了。中央政府制度也比較完善，有系統；蘇丹之下，爲四個掌權大臣，再下爲八個次長(4)，還有代議官員 (Mentri)，是由要人中選

出爲汶萊市各區及各村的首領。然而決定汶萊王國的社會性質是否封建社會，不能單只看表現在政治上的政府組織形式，最重要的，是看汶萊王國的階級關係和經濟結構如何而定。我們知道，當時汶萊王國維持國家經濟的賦收，基本上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國產，即土地屬於國家，蘇丹可以從中抽稅，只是產業不得佔爲私有或遺給子孫，必須由繼位的蘇丹承受。(5)第二種是采邑，土地屬於上卿次卿諸大臣，大臣生時可抽其稅，死後歸還皇室，第三種是田賦，徵收多少租稅全由蘇丹決定。因此從經濟上來看，當時汶萊王國主要的經濟支柱是土地稅收，換句話說，是以土地作爲剝削手段來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這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特徵之一。從階級關係來看，當時汶萊王國封建統治集團里，國王是全國最大的地主，不但可以任意向人民抽取田賦，並且還可以從國有的土地多得一筆收入。此外，國內的貴族官僚，其實也就是大地主階級，儘管采邑土地在法律上規定不能佔爲私有，但他們在職的時候，就是土地的主人，坐享農民勞動的成果；而這種食邑制度不止在汶萊王國才有的，這一種特殊的封建土地佔有制，即由君主暫時賜給貴族們的一種有條件的地產制度，盛行於15世紀中葉的俄國，中國秦漢以後的食邑土地，其性質也是如此；汶萊朝廷分派到各省的總督與官僚集團，也是大地主階級，實質上就等於佔有一個省份那麼大的土地的地主，他們可以對所統治省內人民橫征暴斂，強制租稅，只繳交一小部份的貢品給汶萊朝廷，或者完全不交。在汶萊國內的階級關係中，雖然還有銀匠，織繡匠等手藝工人，還有奴隸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但汶萊封建地主階級主要剝削的對象是農民階級，不是其他的階級。既然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毫無疑問的，汶萊王國國內階級關係中佔主要成份的，還是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由此決定了汶萊王國的社會性質是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

峇南河一帶的加央族和肯雅族，種植旱稻，沒有發展到用水灌溉，種植稻米的地步。他們的社會階級，結構非常明顯，酋長是最高的統治者，中等階級是手藝工人(銅匠，鐵匠)和自由農民，最低的階級是奴隸階

典型的意義。關於我國土地問題上的殖民主義掠奪事業的揭示，將會在人們的眼前展開一幅具有一般普遍意義的畫面。

第二，我們不但要研究外國資本主義力量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分解作用(即：一方面，使農民的自足自給經濟破產，使城鄉，手工業小生產者破產；一方面，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要研究，外國資本主義力量如何爲了統治上的需要，而保存着封建經濟制度。在我國，這個過程是一個具有自己民族特點的極其特殊的過程。應該注意的現象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力量對我國社會經濟分解作用的深度與廣度，種植園生產方式的形成，華印族勞工的大量移入，殖民主義以諸如「馬來人保留地法令」之形式對地主貴族的經濟利益作某種程度的保留等。

第三，我國的農民極大部份都是馬來民族，而工人極大部份是華印民族。這種現象給予我們一種啓示：在農民與生產手段——土地的分離過程中，馬來農民並沒

有構成我國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極大成份。有些人以爲這是由於馬來亞的封建農村尚未受着外國資本主義力量的衝擊的緣故。其實，我國封建農村受着外國資本主義力量的衝擊是有的，問題在於這種衝擊引起了怎樣一種變化。我想，這或許與下列的原因有關：(1)土地的「碎割」(Fragmentation)固然一方面使農民所擁有的土地面積趨於縮小，但另一方面，這種小塊土地，對於農民來說，却是較可能維持的。這並非是說，農民可避免其必然破產的命運，而是說，小塊的土地使到農民在生產危機中，往往較有可能以犧牲自身的生活條件(雖然其生活條件已經是極端惡劣)的方式來渡過。土地是農民的命根。農民維持土地的願望是強烈的。這就未免使農村經濟的破產顯示一種長期、緩慢的特點。(2)由於殖民主義統治者實行分而治之的統治政策，脫離土地的農民極大部份成爲軍隊、警察、政府機關下級僱員的後備軍。

12.1962.

級。(6)手藝工人和自由農民構成了主要的武裝部隊，戰爭時供酋長驅使作戰，和平時，自動為酋長服役，而酋長又是世襲的，顯然的，酋長就是地主階級，剝削着手藝工人和自由農民的剩餘勞動，這說明了加央族和肯雅族的社會已發展至初期的封建社會階段上。

居住于峇當魯巴河流域的海達雅族以種稻米為生，從事遷移農業，農業生產力較陸達雅族為高，社會發展也處在較高的階段，社會內部存在着貴族階級，而貴族階級只能與貴族階級通婚，並且，也存在着從戰爭中俘虜來的奴隸階級。所以，我們可以說海達雅族正在初期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這從他們被詹姆士布律克所驅至拉讓得一帶時，大肆兼併土地的活動得到證明。(7)

在砂勞越砂隆河上源的陸達雅族，雖然懂得種植稻米，還多少以碩莪為糧食。雖然他們仍住在長屋裏，但私有財產制度已產生，除了公共的土地之外，還有私有田地。關於陸達雅族的社會經濟生活概況，于1855年11月到1856年1月到砂隆河上源考察的英生物學者窩雷斯，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他的著作『馬來羣島遊記』有這麼地寫道：「這些達雅克人耕種大片的土地，供給砂勞越以大宗的食糧，」「這些人所出產的糧食比他們所消耗的要多了許多。並且他們拿着剩餘的去交換銅鑼銅砲古瓶金銀飾物——這些東西構成他們的財富」這說明了陸達雅族當時社會內部產生了私有財產制度。窩雷斯還說：「在各個達雅克村莊內，一切果樹都有業主，所以我每逢要求一個居民替我摘取水果的時候，他往往回道：「我不能夠遵命，因為這果樹的主人不在這裏。」他好像決計不肯思量相反行為的可能。由此可見，私有財產制度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已在陸達雅族社會們根深蒂固的形成。窩雷斯還有一段敘述更詳細些反映陸達雅族社會內部私有財產制度的情況，他說陸達雅族在白色拉者詹姆士布洛克統治之下，可以安居樂業；「他的妻子兒女現在已經不致被擄為奴，他的房屋不致被燬，他的禾稼同水果現在也歸他自己所有，他可以自由出賣或自用。」可見，果樹，房屋，田地，也都成為可以買賣的私有財產了，而陸達雅族社會內部階級關係正在萌芽成長，最高的階級就是「奧耶卡雅」，即陸達雅族頭目的稱呼，是富翁的意思，還有些村中德高望重的長老。很顯然的，陸達雅族的社會發展，基本上，氏族公社正在逐步瓦解的過程中，社會內部開始了階級分化，公社關係雖然還保留相當大的成份，但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正逐漸成長。

雖然當時汶萊各省地區的各土著部族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總結的說；馬來部族的社會早已步入較成熟的封建社會階級，其次為海達雅族，加央族，肯雅族，他們的社會發展到初期的封建社會範圍內，達雅族比較落後，但氏族公社的關係逐漸崩離拆，私有財產制度已經發生，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在不斷的加強和發展中。但無論如何，我們絕不可以只憑主觀的臆測，沒有事實的根據就說十九世紀上半期，白色拉者未來之前，砂勞越土著各族仍然處於原始社會的階段，這種說法非但大錯特錯，而且是過度誇張了土著各族的落後，而事實並不如此。

汶萊王國國都和附近的馬來部族已踏上封建社會的階段，這是沒有問題的，但離國都此段遙遠的地區，汶萊朝廷的統治力非常薄弱，而且其所統治的各土著部族中有的部族社會發展比較落後，尚未進入封建社會，那麼汶萊王國各省地區的社會性質是否也屬於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呢？這個問題要這樣看：當時各省的統治者是馬來封建貴族，他們是汶萊封建王國派來的總督和地方官吏，他們是汶萊王國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他們在各省地區建立封建統治是以整個汶萊王朝作為後盾，這是當時最強大的佔統治地位的一股勢力，各省地區的土著人民受着這一股封建勢力不同程度的統治與剝削；有的被殘酷的剝削着，如陸達雅族和馬蘭諾族，都被層層剝削而家破人亡，甚至淪為奴隸出賣，有的只是名義上受封建勢力的統治，實際上都悍然不顧封建勢力的統治權威，如海達雅族和加央族，但當汶萊封建王國勢力強盛的時候，汶萊朝廷對各地區的土著人民的控制力就加強了，就不是名義上的統治者了。所以，當時汶萊各地區，儘管封建勢力對各省地區統治力各不相同，但佔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是馬來封建貴族，儘管封建勢力對各土著部族的剝削壓迫程度不同，但土著各族與馬來封建貴族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儘管各省土著部族的社會經濟發展得不平衡，有的部族內部的封建社會階級關係比較發達，有的部族內部的封建社會階級關係比較不發達，但當時歷史發展的主流是汶萊王國這一股封建勢力，假如不是英殖民主義勢力侵入的話，各省土著各族最終必發展至封建社會的更高階段。由此可以肯定，十九世紀初期的汶萊各省地區（即今日之砂勞越）基本上是屬於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

(三) 詹姆士布洛克插足砂勞越

在詹姆士布洛克未到砂勞越以前，砂勞越省的總督是馬可達。疆域很小，只限於峇當魯巴河以西、古晉一帶的地區，沒有今天的版圖那麼大。

在1839年的前幾年，馬可達被派到砂勞越省為總督，他強迫陸達雅族人每年繳納120担的穀粒和兩担燕窩，他又強迫陸達雅族人當礦工，開採古晉附近的錫礦，不發工資，不發糧食，開出來的錫苗就由砂勞越賣給星加坡兩個英國商行。

馬可達的剝削程度越來越厲害，起初達雅族只需繳付一小數量的固定貢品，以象徵臣屬與效忠，後來逐漸加重苛捐雜稅，再後來甚至將整個村落宣判為奴隸。(8)任由封建統治集團的處置。自馬可達統治砂勞越之後，陸達雅族人計有約一萬四千多人，十年以後，只剩六千四百多人，換句話說，頓然少去一半以上的人口，這個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砂勞越的陸達雅族面臨着滅種滅族的危險。

馬可達對待自己的同族和馬蘭諾族也一樣殘酷；不是殺戮，就是劫掠和奴役。這就出現官逼民反的局面，馬來人和陸達雅族在拿督巴丁宜巴里的領導之下，組織了武裝力量，反抗汶萊的封建的統治，要求組織自己的政府。到1839年，鬥爭已進行了四年，馬可達和汶萊王室無法戰勝叛兵。就在這時，一個英國紳士詹姆士布洛

克開始插足而入，為砂勞越的歷史寫下了新的一頁。

砂勞越歷史上第一代白色拉者，詹姆士布洛克被西方史家渲染成爲一位極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在英殖民史上，可與萊佛士相提並論。到底他是何等人物呢？爲什麼他能在砂勞越建立起政權，做起白色拉者呢？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詹姆士布洛克這個人，是一位冒險家，一位白色拉者，也是英殖民主義勢力的代表者，他一身兼飾三個角色；其實，也是他到砂勞越後人生經歷的三個階段。1839年，詹姆士布洛克靠着他父親給他的遺產三萬金鎊，買了一艘載重142噸的雙桅船，有武裝配備，名皇家號，到達了新加坡，恰好當時新加坡英國商業公司企圖擴大對砂勞越錫礦的貿易，託他帶一件禮物到砂勞越去，贈給哈申。同時，海峽殖民地總督也爲他寫了一封介紹信。這樣，作爲英殖民主義勢力向外伸張的觸手，詹姆士布洛克乘船過海，同年8月抵達古晉。哈申要求他的援助，替他平定亂事，但詹姆士布洛克沒有立刻行動去協助。

第二年八月，詹姆士布洛克再到砂勞越來。哈申再向詹姆士布洛克求助，並且表示：如果他能平亂，將呈獻砂勞越的統治權予他。詹姆士布洛克同意協助，首先與叛軍首領之一的沙立夫胡申(Shrip Husain)和談，結果胡申停止作戰，接着其餘的叛軍隊伍也投降，但這是有條件的放下武器，詹姆士布洛克答應叛軍不受懲罰，並且保護砂勞越人民不受汶萊貴族的統治。1841年9月24日，詹姆士使用武力趕走馬可達，正式成爲砂勞越的白色拉者，這時，他由一位英國海外的冒險家一躍而爲砂勞越的統治者。

當時詹姆士之所以取得砂勞越省的政權，主要有三個因素，首先是善於利用砂勞越人民與汶萊封建統治階層之間的階級矛盾，乘機插足，從中得利。他戰勝叛軍的戰役，不是決定性的戰役；他戰勝叛軍的因素，主要不是軍事上的因素，而是政治上的因素。他以偽善者的姿態出現，對砂勞越人民的政治要求作了一定的讓步，答應他們脫離汶萊的封建統治，爭取到砂勞越省內佔大多數人口的陸達雅族對他的支持和信任。其次，是因爲他善於利用汶萊封建統治階層之間的內部矛盾，抓緊機會，製造有利條件。當時哈申爲了急于趕回汶萊爭奪王位的承繼權，希望通過一項有名無實的砂勞越總督，作爲懸賞，鼓勵詹姆士平亂。可是，由于有了這個機會，名義總督就是抓住實權的條件，或者說是把柄也可以，詹姆士布洛克用武裝力量把自己變成握有全權的砂勞越總督。再其次，是因爲他善於利用荷蘭殖民主義者與西婆羅洲羅芳伯共和國之間的民族矛盾，乘虛而入砂勞越省，建立政權；雖然，當詹姆士布洛克涉入砂勞越事務時，荷蘭政府的三發副總督致函抗議，指責他這種行爲違反了1824年之英荷條約。(9)但他却置之不理，他早已深刻地認識到荷蘭殖民主義勢力遠非英殖民主義勢力之敵，加以荷蘭當局正積心處慮地陰謀消滅西婆羅洲的羅芳伯共和國，無力他顧，只有比比拳頭，嚇嚇詹姆士布洛克而已。

1841年9月，詹姆士布洛克只是在砂勞越省取得立

足點，他的統治地位還不鞏固，他還沒有得到英殖民主義勢力和工業資本家的充分支持。另一方面，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以古晉作爲根據地，不斷向東北婆羅洲發展，逐漸蠶食掉汶萊王國廣大的領土。爲了爭取英國工業資本家的支持，詹姆士布洛克所實行的政策中，有這樣的規定：所有交通將開放，外地商船將自由來往砂勞越河。這就等於打開砂勞越省的門戶，歡迎英國資本勢力的侵入，深入的打進砂勞越河的內陸地區，製定貨幣制度，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積極爲創造英國商品的新市場掃除障礙。

1842年年底，詹姆士布洛克所委任在英國的代理人亨利威斯，成功地說服了各種在英國與蘇格蘭的商業組織，東印度公司，使他們要求政府對婆羅洲採取更積極的政策。1843年初，詹姆士布洛克取得英國政府海軍部的支持了。在此以後，他東征西討，掃蕩海盜，都少不了英國海軍部所派遣而來的戰船，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砲船。我們知道；假如不是英國海軍部，和新加坡海峽殖民地的商業公司給予支持，派出船隻，替他撐腰，做他的後台老板，以詹姆士布洛克一個有限的日益縮小的財力，以他僅有的一隻雙桅船，和以搶劫敵人財產爲報酬的雜牌軍，這一些馬來人和達雅人的烏合之衆，要打下砂勞越的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詹姆士布洛克，在他一踏上砂勞越的土地時，就代表着英國新興工業資本勢力向外擴張的觸手，一直到他在砂勞越省站穩了腳跟，登上了拉者的王座，他更加强了對英殖民主義勢力和英商業資本的聯系，賣命的充當英殖民主義勢力開闢新天地的馬前走卒。實際上，他老早就英殖民主義勢力的代理人，而他也在不斷努力討取這種地位和身份。至1845英國外交部也就指定詹姆士布洛克爲婆羅洲的委託代理人。

十年後，就是1856年，慕娘有限公司在英國註冊，總行設在倫敦，分行除在砂勞越外，椰嘉達，暹羅，中國，印度都有。這個大公司是詹姆士布洛克強大的後台老板，是詹姆士布洛克背後大工業資本勢力，完全是爲着支持白色拉者政權和擴大對砂勞越的經濟掠奪而成立的。這時的詹姆士成爲英國大工業資本勢力的代理人，以及砂勞越的社會經濟開始了殖民地化的第一步，變成更明顯的事實。

不過，我們要知道：詹姆士布洛克同時也還是砂勞越的一個封建統治者。一方面，詹姆士布洛克本身力量不大，依附投靠于英殖民主義勢力。但另一方面，他也抄襲了汶萊封建王國統治砂勞越的老法子，任用馬來封建貴族充任官吏，管理當地人民，只不過向人民抽取一定的賦稅，不去破壞砂勞越各部族內部原有的社會組織，基本上沒有整個地改變了封建的社會性質。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英殖民主義勢力還不想直接控制砂勞越的政權，只須通過一個依靠于英殖民主義勢力的代理人，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就能壟斷砂勞越對新加坡、對中國的商業貿易，就已經在新加坡與香港之的形成一個鎖鏈，成爲擴大對中國經濟侵略的根據地；通過他就已經能夠很好的爲當時英殖民主義勢力的軍事利益與商業利益服務，那麼，直接控制政權或不直接控制政權，又有

什麼關係呢？況且英國新興資產階級所組織的慕娘有限公司，通過詹姆士布洛克這樣一個特殊關係和地位的代理人，它已經能夠壟斷砂勞越整個市場，經營出入口的商業，掠奪砂勞越的天然富源，這証明了詹姆士布洛克政權的存在是對英殖民主義勢力有利的，而白色拉者政權存在與否又是決定於英殖民主義勢力，那麼，英殖民主義勢力又何必多此一舉去直接接管白色拉者政權呢？所以，詹姆士布洛克能夠在砂勞越登上王座，製國旗，建立獨立的國家政權，做了英海峽殖民地的大功臣萊特萊佛士所想像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一個英國紳士的身份，或者說是冒險家，在東南亞的一個地方打出天下，做了封建土王，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當時確實不可能找出第二個這樣的傳奇人物。

(四)砂托山之戰和石龍門事件

代表着英殖民主義勢力的詹姆士布洛克，當他插足古晉，打進砂勞越省之後，在他所統治的境內，或擴張領土的過程中，都會遇到當地人民堅決有力的反抗，爆發過好幾次大規模的反殖鬥爭，其中，尤其以砂托山之戰和石龍門事件最為著名，值得提起。

從1843年到1849年之間詹姆士布洛克聯合英國海軍，三次發動向峇魯魯巴河流域的海達雅族圍剿，因為他們搶劫英國的商船，從事海盜的生涯。海達雅族人受到重大的打擊，一部份屈服了，一部份繼續堅持進行反殖鬥爭，他們在一位極勇敢驍悍的領袖仁達領導下，撤退到西里末河的發源地，在砂托山上建立堅強的堡壘，居高臨下，形勢險要，在達雅族流行的歌曲和傳說中，砂托山是無敵的，受神保護的。仁達被稱為內陸拉者，同時成為反詹姆士的中心人物。仁達在砂托山堅持反殖鬥爭有八年之久，從1853年到1858年，這五年之間，詹姆士布洛克的侄兒查爾斯，能征善戰，發動四次征討，出動軍隊最多的一次，竟有七千馬來人與達雅人之眾，但都失敗。到1861年，查爾斯用六十人抬的器具大砲猛烈轟擊砂托山上的第二座堡壘，總算擊破了這座銅牆鐵壁似的反殖鬥爭的堡壘，仁達敗走，砂托山上的長屋被火燒，火光衝天。

造成砂托山反殖鬥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首先由於反殖陣營的內部分裂，達雅人領袖之一的巫南向敵人妥協，削弱反殖的力量。其次，由於詹姆士採取以夷制夷，利用達雅人打達雅人，再次，由於砂托山反殖鬥爭的主力，海達雅族人在1857年2月，沒有和石龍門華工的反殖鬥爭取得配合，大舉反攻，坐失良機 只在堡壘里面等着挨打，然而，海達雅族人在砂托山上所寫下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公推仁達作為一面反殖鬥爭的鮮明旗幟，有計劃的向白色拉者鬥爭，這是比海盜式的騷擾性的反抗行動，反殖鬥爭的意義，更要積極強烈得多。

石龍門華工事件，剛好爆發在砂托山之戰的期間，這一次華工事件，幾乎推翻了白色拉者的政權，在砂勞越的土地上出現一個雛型的華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一次反殖鬥爭，是因華族商業資本的公司和英國工業資本的代理人，由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轉化為政治上的尖銳鬥爭。而且，這也是華族工人階級（當然不是現代的

產業工人）第一次在砂勞越的歷史舞台上出現，第一次展開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性的反殖鬥爭。

石龍門華工事件爆發的原因是這樣的：19世紀初葉，西婆羅洲以坤甸為中心的蘭芳大總制，分出一支客人隊伍，由劉善伯帶領，定居於石龍門一帶 種植胡椒，蔬菜，開採金礦，建三條溝公司，這是華族商業資本的組織。1850年後，蒙脫拉度（Montrado即林鳳超坤甸歷史中所謂鹿邑省）之大港公司與荷人戰，數千難民由邦夏（Pemangkat）越境而入上砂勞越，其中包括逃避荷蘭政府追捕者。(10)，於是三條溝公司的會員人數頗然激增，勢力膨脹。當時在三條溝公司的管理之下，大約有四千人，但繳交給詹姆士布洛克的人口稅只有半數，三條溝公司不但逃稅，而且還走私鴉片，這就和布洛王朝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鴉片貿易是當時白色拉者政權的重要經濟來源，本為白色拉者政府所壟斷的商業貿易。(11)所以，這一場經濟上的鬥爭就意味着華族商業資本組織三條溝公司與英國工業資本的代理人詹姆士勢不兩立。第二個主要的原因：三條溝公司不僅僅是一種商業組織，亦為當時遍佈南洋各地的秘密會黨天地會的分支之一，正如羅香林著蘭芳大總制考書中所云：「惟自嘉道以後，粵人之從事天地會運動者，反視編建而尤盛，竊假且取之與耶穌教相結合，另創上帝會，而造成掀然大波之太平天國。其在南洋而從事天地會之傳播者，亦與日俱增，婆羅洲之砂勞越，尤為會黨總匯之所，西部婆羅洲與之接壤，黨人亦盛，而蒙脫拉度（Montrado）之自治團體，更為天地會中人所立。」因此，就其實質來說，三條溝公司和蒙脫拉度的大港公司一樣，就是一種獨立自主的政權形式，是向當地蘇丹領取開發石龍門為中心地區的特權，獲得完整的自主權利，形成一個小型的獨立國家，自行徵稅。(12)不肯受任何外來的壓迫欺凌，反對土著封建勢力的剝削，反對英荷殖民主義勢力的壓迫，儼然成了白色拉者的心腹大患，直接威脅到英殖民主義勢力代理人的統治權威和所謂正統地位。

1857年初，詹姆士布洛克以華人走私鴉片，懲罰150鎊，華人雖如數交出，但反抗的決心更加堅定了。當時，三條溝公司派人去聯絡三發蘇丹和汶萊王國的反英份子，爭取這兩地馬來封建貴族的同情和援助，準備起事，推翻布洛克王朝，建立華人獨立國。恰好其時正當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夕。(13)英國政府忙着準備聯合法國，對中國發動一次侵略戰爭，很難有餘力兼顧砂勞越的政治局勢，中英國際緊張關係為石龍門華工的起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857年2月18日，石龍門華工公推首領王甲率領六百大漢，帶了武器，步行至短廊，改乘船，沿砂勞越河而下，半夜到古晉，分兵兩隊，分頭攻打政府機關和軍火庫，王府也被包圍，拉者在夢中驚醒，急忙持鎗而出。這時華工在在包圍另一官員尼古來特士（Nicholletts），未暇他顧，詹姆士乘機潛出浴室之門，跑到小河邊，跳進水裏，躲在一隻華工船隻的舷下，然後游過小河，逃到一個馬來官員家中。第二天，王甲高坐在白色拉者的王座上，召見馬來領袖拿督班達和英慕娘有限公司經理漢姆斯，令拿督班達管馬來人，漢姆斯管外國

人，兩人都在三條溝公司的管轄之下。第三天以後，端木達查爾斯召集達雅軍趕至，和白色拉者召集的馬來軍匯合，又有慕娘有限公司的輪船布洛克號，來自新加坡，軍容大盛，整個局勢急轉直下，白色拉者反攻古晉，華工退回石龍門，沿途被殺約一千人，在石龍門和烏梭兩地遺屍遍野，無人埋葬，臭氣冲天。3月28日，戰亂平定。

石龍門華工的起義，終告失敗。這一次起義，事先醞釀了相當久的時間，有着充分的準備，有組織，有計劃，也有打倒白色拉者政權而建立華人獨立國的政治目標，為什麼也會失敗呢？問題不那麼簡單。領導華工的三條溝公司首領，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以為只要控制了古晉的政府機關，奪取了軍火庫，或殺死了白色拉者，就是推翻了白色拉者的政權，以為只要不殺死拉者政府的官吏，而只殺害幾個英國商人和傳教士，就不會給予英國政府干涉的機會；只看到白色拉者表面上的勢力，沒有看到白色拉者背後的勢力，是端木達所控制的達雅軍隊，和古晉當地馬來封建貴族所控制的馬來軍隊，是英國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只看到白色拉者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的聯系，而沒有看到白色拉者政府與英國大工業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系，所以讓白色拉者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另一方面，這次石龍門華工起義爆發的導火線是華族商業資本家和英國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之間發生直接的利害衝突，是由於華族獨立自主的政權受到英殖民主義勢力代理人的壓迫而引起的，並非英國工業資本家和砂撈越省內馬來族，達雅族人民之間發生直接的利害衝突，所以，當時馬來族達雅族人民不可能自動自覺的支持華工起義，並肩作戰，捲進反殖鬥爭的浪潮里。加以三條溝公司沒有對砂撈越省內的馬來族和達雅族進行宣傳，從政治上徹底暴露白色拉者假仁假義的真面目，使他們認識到他們也同樣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積極爭取至少約有20萬的馬來人，和達雅人站在三條溝公司這一邊，從而孤立白色拉者為代表的英殖民主義勢力。因此在力量的對比上，由於沒有爭取20萬的馬來人達雅人過來，反而有些被白色拉者方面拉攏過去，只以四千華族人民的力量起義反抗，當然居於劣勢，失敗的收場，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然而，石龍門華工事件的偉大歷史意義，仍是不可抹煞的；雖然革命事件很快被鎮壓下去，前後不過一個多月的時間，不像砂托山之戰堅持八年之久。不過，這次華工起義，直搗白色拉者的老巢，迫得詹姆士躲在船舷下，狼狽而逃，喪失了政權，這是白色拉者生平最大的恥辱，是白色拉者政權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傾覆。第二，石龍門華工事件是砂撈越工人階級第一次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但一出現，就在反殖鬥爭中扮演了沖鋒陷陣的重要角色，這是因為早期的華工在富有反清復明革命傳統的天地會領導下，在三條溝公司獨立自主的政權統治下，比較能夠享有平等民主的權利，如公司的領袖是由公衆推舉的，任何人入會以後，所有會員都是手足，不分貧富，地位平等。第三，三條溝公司企圖在當時砂撈越地區內建立雛型華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在北婆三邦反殖鬥爭史上是空前的第一次，提出比較明確的政治目標，這是搶劫英國商船的海達雅族人民那種一搶

就走、一呼而散的反殖鬥爭形式，所不可能企及的；也是砂托山上的英雄仁達，據守一方，以內陸拉者的地位作號召，所不可能相提並論的。假如三條溝公司果然能够在砂撈越全省範圍內建立起雛型的華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那將是正在萌芽當中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巨大進展，但石龍門華工起義的失敗，說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萌芽時期中，便已受到英殖民主義勢力的摧殘打擊，以後必然發展得更緩慢，更曲折。

註(1)：見歐洲經濟史

註(2,3)：見汶萊史綱

註(4)：同上註

註(5)：同上註

註(6)：見羅斯威爾撰写的材料，「過去在有組織的政府成立之前，他們構成主要的武裝部隊，供酋長驅使作戰，和古代封建時代一樣。在和平時候，他們自動為酋長服役。」

註(8)：海達雅人在拉讓河流域獲得土地的代價是一個鉅額，或一枝銅砲，或者一對奴隸。有些地方因為原來的土著撤退了，或者併吞了，甚至還有一些被他們陰險的殺害了，這樣土地就落入他們手裏。（見砂撈越風土誌）

註(9)：詳見 P. 57.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註(10,11)：見Nineteenth-century Borneo.

見The White Rajahs P. 125. 「石龍門的公司成員日益增加，在1850年大批難民湧入砂撈越，他們主要是有勢力的蒙脫拉度公司（Montrado Kongsí）的成員，越過邊界而入境」「這是非常明顯的，三條溝公司從事走私鴉片，而鴉片是政府（指白色拉者政權）所壟斷的貿易與重要的收入。」

註(12)：據“The Chinese of Sarawak”的材料，砂撈越在歐人未控制金礦工與獲得當地蘇丹特許之前，採礦提供了更多投機的機會。一般富有企業心的個人或公司（通常是後者）由蘇丹處請得一地區開發，並被允許在該地區建立小型的獨立政權，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利，包括自行徵稅在內。

主要參考書目：

1. 汶萊史綱 劉強譯南洋學報二卷一輯
2. 砂撈越風土誌 黃耀明編著
3. 砂撈越史略 楊漢雨
4. 馬來羣島遊記 呂金錄譯 窩雷斯著
5. 蘭芳大總制考 羅香林
6. 天地會研究 澄清譯 施列格著
7.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傳著
8. 天地會文獻錄 羅爾綱編著
9. 馬來亞19世紀錫礦業的社會影响 戴淵著
10. 歐洲經濟史 Knight等著
11. Nineteenth-century Borneo; Graham Irwin
12. The white Rajah Steven Runciman
13.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S.Baring Gould & C.A.Bampfylde.
14. The Chinese of Sarawak; Jik An Tien

凱恩斯及其就業理論

—陳啟寧—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闡述的理論，在西方國家中，獲得了廣泛的傳播。目前西方經濟學界最爲流行的所謂「調節經濟」的理論，如Hanson等人所闡述的那樣，不外是凱恩斯理論的變種。西方國家壟斷統治集團在其國內所實施的經濟政策，也是以這種理論作爲其理論根據的。大家都想知道爲什麼和過去的一切俗流經濟理論比較起來，凱恩斯的理論在西方國家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如此廣泛的傳播和重視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應該而且也只有可能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情況中去尋找。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嚴重化，大量失業的存在所引起的社會集團矛盾的尖銳和社會局勢的動盪不安，是西方國家壟斷統治集團所深爲恐懼和困惱着的，但又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爲了抗拒日益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吸引力，在思想上，向人民廣泛地散佈種種資本主義萬世永存的幻想和神話，是有必要的。在經濟理論上，向人們散佈一種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原封不動地受到「改造」（企圖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存在，已經是枉然了）的神話，於是便被提到議事日程來。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闡述的理論，正適應了壟斷統治集團的這種需要。根據凱恩斯的理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完全有可能通過國家的積極干涉而獲得了緩和或解決的，在保障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同時，也有可能保證「充份就業」，也有可能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凱恩斯的這麼一套理論，是富於迷惑性的，它之所以會獲得如此廣泛的傳播，正因爲這理論本身的迷惑性符合了壟斷統治集團的需要。

在今天，對於凱恩斯的理論，依然存在着一些錯誤的觀念。我們不妨在此略爲一談。

最常見的錯誤觀念，是簡單地把凱恩斯當作一位普通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待，以爲在他的理論中並沒有什麼「新奇」或重要之處可言，從而必然輕易地忽視了凱恩斯理論在西方國家中所起的作用。這種簡單地忽視的態度，當然是錯誤的。其實凱恩斯是自亞當斯密和李加圖以來的一位重要的資產階級學家，我們知道，在西方經濟理論中，賽伊（Say）的所謂經濟市場「法則」和由此引伸而來的均衡原理，向來就是一切爲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俗流經濟理論的支柱。可是，按照凱恩斯的理論看來，無疑的，他是捨棄了這根理論的「支柱」而另起爐灶的，當然，作爲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依然沒有超脫俗流經濟的本質。

根據賽伊的所謂市場「法則」，資本主義制度是有着一種自動調節的力量的。因爲在賽伊看來，商品的出賣就是商品的交換，（或者說，生產品的交換，賽伊把這兩種交換視爲相等）因此，每一個出售者，同時也就是購買者，反之，每一個購買者同時也就是出售者。於是，供給便會自動地創造一相適應的需求出來，價格也就等於成本，出入口平衡，投資正好等於累積。賽伊就根據着這種「法則」和由此形成的「均衡觀」，創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生產不可能過剩的理論，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存在。遠在19世紀初，賽伊的這套理論便受到了科學理論的駁斥了。事實上，賽伊的理論無非是捨棄了資本主義的現實的抽象空談，賽伊錯誤地爲資本主義生產當作簡單商品生產看待，錯誤地把商品交換和生產品交換視爲一致，像其他一切俗流經濟理論一樣，賽伊這套謬論的本質也無非是企圖否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固有矛盾。和賽伊這種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舒服地通過「自動調節」的力量而向上發展的論調不同，凱恩斯是承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有存在着某種「不平衡」現象的。

凱恩斯在完成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此書在1936年出版）時，資本主義世界正經歷着一次極其深刻嚴重的經濟危機（1929—1933）。凱恩斯在理論上拋棄了賽伊這根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有經濟危機的理論「支柱」，在我們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資本主義制度災難深重的危機情況使凱恩斯不得不注意到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力的擴展和落後的資本主義市場之間的矛盾，不得不注意到周期性危機的襲擊和日益擴大的大量失業隊伍，於是，他得出了如此結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着一種基本上的不平衡。而且這個裂縫將會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而越趨惡化，什麼原因造成這裂縫存在呢？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它的原因，就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存在，使日益擴大的資本累積趨勢（用凱恩斯的語言來說，就是儲蓄）所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因而促使大量失業增加。這些經濟上的破壞將會繼續不斷地滋延，而越發潮繁、深入與嚴重。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和賽伊的資本主義可以「自動調節」和諧地發展的理論不同，在凱恩斯的理論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已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破壞力量了，當然，凱恩斯是認爲這種裂縫是完全可以填滿的。他以爲，只要通過國家機器的多種形式的干涉，刺激投資，是可以克服這種裂縫的。總之，凱恩斯爲資本主義制度可以永世存在提供了另一套「理論」根據。

談及經濟危機，我們還得指出另一種錯誤觀念，有人以爲凱恩斯理論的目的，無非是企圖使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獲得暫時的某種程度的緩和。持有這種觀念的人，

由於過低估計凱恩斯野心勃勃的企圖，因此，他們也就無法正確地認識凱恩斯理論正被西方壟斷統治集團當作「萬應靈藥」看待的事實。其實，凱恩斯理論的主要目的，不僅僅在於使經濟危機緩和，而是在於克服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維持資本主義制度，換句話說，凱恩斯是企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按照凱恩斯的看法，隨著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消失，隨着「充分就業」的到來，資本主義國家將不再去進行國際性的競爭，不再去掠奪國外市場和原料產地，不再去剝削人民。總之，一句話，帝國主義將因此而自動死亡，戰爭將因此而自動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將是世界上美好的，生氣勃勃的，進步的社會制度。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最後部分，就如此的寫道：

「有些政治家相信，假使一個富饒之國不注意于爭奪市場，則其繁榮即將衰退。這些人倒是有常識，對於事情有正確了解。不過假使各國能用國內政策提供充分就業，又能在人口趨勢方面維持均衡，則實在不至于有重大的經濟力量使得各國利害衝突……已經沒有迫切動機，要竭力向外推銷本國商品，或拒絕接受外國商品……國際貿易不再是一種鋌而走險的辦法……而是在互利條件之下，各國自己情願不加阻撓地把商品與勞役互相交換。」（見徐毓柵譯本 325 頁）

凱恩斯這段描繪他的「美妙」幻想的言語，實質上并不美妙。這段話，給我們揭露了，凱恩斯是存在着一種將資本主義制度從災難深重的危機中挽救出來的企圖，他荒謬地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可以克服它所必然帶來的產物——帝國主義與戰爭，因此，總危機也就不再存在了。

理解凱恩斯在形成其理論的時代特徵對於我們將會是有意義的。上面說過，凱恩斯在完成「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時，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歷着一次災難深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1929—1933）的時刻，顯然，凱恩斯的那套「美妙」說法，是和此有關。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具有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範圍內的周期性危機的性質，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工業危機和農業危機交織在一起，使到這一次經濟危機，異常深刻，異常尖銳。這次危機震驚了資本主義世界和它的經濟學家，他們已經為這個受危機襲擊而破碎不堪的經濟制度的前途擔心而遑遑不可終日了，他們絞盡腦汁，想為這個不可抗拒的問題尋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凱恩斯便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表面上似是而非的答案。就這一點來說，凱恩斯理論的出現與這種理論之形成為我們時代里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是完全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地方。凱恩斯不過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提供了一個答案而已。

從上述指出對於凱恩斯理論的錯誤觀念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凱恩斯的理論，極大部分都是和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有關的，實質上，這種理論不可能是別的，只可能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這種理論所提出的一切「調節」的措施（凱恩斯理論的變種，總愛套上「計劃經濟」的幌子）也不可能是別的，

只可能是資本主義制度臨死前的掙扎，只可能是向垂死的人身上注射強心劑。壟斷統治集團國家機器積極干涉與人為刺激的一切措施，不論是通貨膨脹、「公共投資」（包括一切用於擴軍備戰的非生產的開支）事實已證明，只可能在極小的範圍內，暫時地起擴大生產的作用，但這種措施又將進一步把人民的生活水準降低，使市場更加小，失業隊伍更加擴大。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之產物，不克服這矛盾出發，任何想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危機的企圖都是枉然的。

三

凱恩斯關於「充分就業」的理論，現在，不但已成爲許多主要的西方國家有關勞工立法的理論根據，而且也成爲許多所謂「自由」職工運動者所大事宣揚的旗號，在此，我們不妨談談：

從生產水準，從而就業水準，是取決於支出的方向和數量，這個論點出發，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如此寫道：

「就業量增加時，總真實所得也增加，但社會心理往往如斯：總真實所得增加時，總消費量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之大……欲維持其特定就業量，則當前（Current）投資量必須足以吸收在該就業量之下，總產量超過社會消費量之部分……由此，設社會之消費傾向不變，則就業量之均衡水準決定於當前投資量……當前投資量則又決定于投資引誘，投資引誘又決定于兩組勢力之相互關係，第一組爲資本之邊際效率表，第二組則爲各種期限不同，風險不同的貸款利率。」（見徐毓柵譯本第29頁）

按照凱恩斯的說法，失業便是消費支出往往低於所得以及增加的所得並沒有用到當前投資去的結果，因此支出的增加，將可以帶來「充分就業」。這種說法，在凱恩斯追隨者的言論中，屢見不鮮，如Beveridge在其所著「自由社會中的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一書中就有如此的說法：「就業取決於支出……當就業量減少，這就意味着某些人的支用減少，當就業量增加，這就意味着在總量上更多的被支用」。

在他們看來，支出有兩種形態，一爲消費支出，一爲投資支出，所得不用於消費的，便是儲蓄，如果將這種儲蓄用於投資便有助於增加就業量，總之投資的不穩定性是經濟危機和失業的主要原因，爲此，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來增加需求和投資，通過國家的干涉，刺激需求與投資，使投資有着適當的方向，則「充分就業」便能達到。

顯然，這套理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不妨從下列幾方面來觀察：

第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目的，并非像這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爲了消費，爲了保障全體人民的高度生活水平。事實上，追求最高限度的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只可能是以追求最高限度的利潤爲目的，不可能是以保障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爲目的；只可能將利潤用於資本家的奢侈浪費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聯合邦的民族教育問題

·程衆·

(一) 民族教育危機的產生

爲了鞏固并延續其統治，殖民地統治者總是想盡各種方法，通過各種手段去壓制、摧殘、消滅民族教育，并大力推行其灌輸效忠宗主國的思想意識，消滅民族自尊心的奴化教育，以利其愚民政策的實施。

早在1920年，英殖民統治者便頒佈了我國最早的學校註冊條例，作爲其控制、扼殺民族教育的工具。這個條例使得殖民地政府可以「合法」地以妨礙「公安」爲理由，隨時隨地吊銷任何學校和教員的註冊，對於這種限制，華人很表不滿，當即推派宋士林、余佩泉、莊希泉等六名代表，向當局交涉。豈料這些代表不但得不到一個圓滿答覆，反而被驅逐出境，同時還封閉了十多間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非各國先後醒悟起來，站立起來，紛紛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要求民族自決，要求獨立自主的呼喊，嚇得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胆顫心驚，失魂落魄。在國外這種有利的情況底下，配合着國內人民政治覺悟性的提高，我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有了長足的進步。從1945年起，我國各民族，各階層人士便匯合成一股洪流，展開如火如荼的憲制鬥爭。

面對這種狼狽的局面，爲挽救其統治壽命，英殖民統治者也加緊其文化侵略，進一步迫害民族教育。1950年，英殖民部特派殖民部長教育顧問十五人，分別前往各殖民地「考察教育」，「蒐集各地的意見，報告殖民部參考，以作實施殖民地教育之借鏡」。當時被派來我國視察星馬兩地民族教育及奴化教育狀況的是谷克斯爵士，他于該年十月蒞星。翌年九月十日，英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又在鳳凰園專員公署召開一個英東南亞各屬地提學司會議，討論如何在這一地帶「奠定一教育基本政策」。

就在英殖民統治者處心積累的迫害下，我國的民族教育陷于一種令人悲憤填膺的境遇。其中以巫、印文教育最可憐，它們始終處於半生不死的小學階段。根據1949年人口調查，巫族同胞，男性文盲高達74.7%，女性文

盲竟高達88%。而1957年，印校學生總數只有48,546人，這比1956年只多出廿四名而已！

這種悲慘，沈痛的情景，豈是任何愛國志士所應該加以衷心讚美，拍手喝采的?!豈是任何爭取人民利益者所應該加以延續推行，甚至助紂爲虐，越發促長其劣勢的?!

(二) 聯合邦的教育制度評述

a. 學校註冊、管制條例與六年計劃

英殖民統治者于1950年2月在立法議會通過新學校註冊法令。這個法令，可以說是1920年舊註冊法令的進一步發展。除賦予學校註冊官絕對的權力，在他認爲不滿意時，可以隨時封閉學校，吊銷教員註冊外，還特別規定欽差大臣有權力基于「學生及公眾的利益」，制定關於學校的性質與校舍的法律，以及警探有權向「認爲」未有註冊的學校加以搜查。

翌年1月9日又頒佈了1951年緊急（學校管制）條例。它是以新學校註冊法令爲基礎而制訂，進一步利便殖民者在「合法」的烟幕下，粗暴的進行其管制和摧殘民族教育的勾當。

就在這兩個法令通過以後，1951年11月30日，雪州教育局長不列明任何理由，下令巴生中華中學立即停辦，該校學生聞訊之餘，宛如晴天霹靂，「哀號慟哭，達一二小時」（見該校董事部文告）。隔月，開辦卅三載的台山學校，竟又以「限于教育衛生條件」被封。

此外，聯合邦教育部還于1950年擬定了一個與新加坡十年教育計劃大同小異的六年教育計劃，企圖通過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大力推展英文教育，打擊三大民族教育。

爲了推行這個計劃，英殖民統治者特地撥出四千五百五十八萬一千元，其中用於擴展學校與師資訓練的「基本開銷」是三千五百零一萬五千元，用于經常開銷是一千零五十六萬六千元。在這批不少的開支中，英校分得基本開銷費20,470,000元，經常開銷費5,743,000元，佔據總數的58.3%，遠遠超過其他三大民族教育所

和加強剝削上，不可能將利潤用來改善民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是無法獲得根本解決的。

第二，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決定了國民所得的最後分配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民所得的分配只能夠是利於大資本家，大財團，而不可能是利於廣大人民。任何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改變國民所得分配性質的企圖，只可能是一種欺人的幻想。

第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壟斷統治集團的國家機器

可以影响國民經濟，但只限於極其狹小的範圍。國家的性質，決定了這種對於國民經濟的影响，只可能有利於資本家而不利於廣大人民，國家從廣大的納稅人身上所課得的租稅，是以政府証券的利息形式，以國家向其訂貨的工業的利潤形式，再流進了資本家的腰包，廣大人民的相對貧困化與絕對貧困化，不是依靠壟斷統治國家的所謂「調節」作用所能夠克服的了。

第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口相對過剩的規律起着作用，失業現象永遠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制度里消失。

得的總和。

很明顯的，英殖民統治者是冀圖通過不斷供應英校師資，擴建校舍，使得英校足以大量容納新生，再加上學費低廉和政府部門職位等的特別開放給英校學生，來引誘家長「自願」的把子弟送進英校，而迫得各民族學校逐漸減退。

然而，事實并不如英殖民統治者所設想的那麼「美滿」，在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意識的人民堅決鬥爭底下，在聯邦政府開支捉襟見肘底下，這個計劃是失敗了，它並沒有帶來殖民主義者所夢想的文化侵略的嚇嚇成果。

b. 巴恩巫文報告書

眼看着民族獨立運動不斷的蓬勃發展，六年計劃又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英殖民統治者於是改變方針，圖謀用「鯨吞」的方法，將華、印民族教育立即消滅。巴恩巫文教育報告書的草擬，即標誌着這種政策的開始。

這一份報告書，就報上所已登載的看來，其重點在於第四章「初等教育」一段。茲摘要抄錄如下：

「吾人深信，初等教育應以造成一種共同之馬來國籍為目的，以收容各族適齡學童於國民學校，以代目前之各種方言學校。國民學校之辦法如下：

(1)國民學校專門容納6歲至12歲之學童，其課程為六年制。

(2)不收學費；

(3)於六年課程修畢後，學生應通曉英、巫兩種文字，其成績優良者，可直接進入英語教授之中學。

在原則上，吾人建議取消各民族之方言學校，而以一种適合於全體之小學代之。當然，方言學校之消滅，是逐漸實施者，但今後關於教育經費之撥發，國民學校應有優先權。

倘大部份非巫族人士，如華人、印人，依舊選擇其個別之初等教育，則吾人之計劃將受莫大影響，所以應設法使非巫族人士，如華人、印人共同參加此等教育計劃。至于國民學校，將擁有優良之師資、設備及校舍，自一年級起，即開始教授英文。

國民學校之全部課程均以羅馬化之巫文教授。

家長凡欲以馬來亞為其永久之家鄉，而全力效忠于馬來亞者，當送其子弟入國民學校學習英巫兩種文字，凡不願其子弟受到國民教育者，吾人認其為不願對馬來亞效忠之表示，誰願意放棄其本身與方言教育之聯系，而為統一社會利益着想者，當被熱烈歡迎。

表面上看來，它好像是發展巫文教育的建議書，它所要消滅的對象，只不過是華、印文教育而已。實際上，如果按照巴恩氏的作法，必然導致馬來民族教育的名存實亡而無疑。試想想，一個國民學校畢業的小學生，其升學途徑只有進入英文中學這一條路，則所謂的國民小學的課程將是怎麼一回事呢！所以，巴恩報告書的最大目的，是擴展英文教育。它的「馬來亞化」，毋寧謂之英語化！

在這裏，英殖民統治者是利用兩種不同的手法，分別對付我國三大民族的語文教育。對華、印文，牠採用的是直截了當的取締方式；對巫文，牠通過間接的改變

其實質的手段。這個計劃的背後，隱藏着英殖民統治者一大陰險而惡毒的計謀：藉此分裂和製造民族間的仇視和矛盾。

然而，巴恩氏却把人民擁護不擁護這種計劃當作是衡量人們效忠馬來亞的標準，這是個天大的笑話。由此也可看出「效忠馬來亞」對不同的人來說，是有不同的函義的，對英殖民統治者及其僕從來說，所謂效忠馬來亞，那便是保障并延長英殖民主義在我國的利益和統治。對於我國三大民族來說，所謂效忠馬來亞，在廣大人民仍未當家作主的情況下，它不過是用以迫害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的手段。

由于這份報告書的反動，所以，除了馬來封建貴族和少數英國僕從表示歡迎和接受外，廣大的各民族人民都加以抨擊和反對。

c. 方吳報告書

自從巴恩巫文教育報告書發表以後，華人深刻地認識到殖民統治者企圖消滅民族教育的狠毒心腸，故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無不奮然而起，加進維護民族文化的隊伍裏。當時華族各階層，無不高執維護民族教育的大纛，喊出驚天動地的保衛民族文化的口號。情緒之高，誠屬空前。

眼看情形有點不妙，英殖民統治者連忙從遙遠的美國，請來了方威廉和吳德耀兩位博士風塵撲撲趕來調查華文教育，企圖以「一位是中國人」，另一位「曾在中國渡過不止半生」並曾任「中國十餘家學府董事會的聯合行政秘書」的事實來博取華人的信任，緩和華人不滿的情緒，消除華人的戒備心，然後使得殖民地教育政策得以通行無阻。

果然，方吳是成功了。他們寫的報告書，居然受到許多華人的歡迎。其實，方吳報告書之陰險，比之巴恩報告書，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在他們抵達之前，聯合邦輔政署就道出這個調查團的性質與任務之一是「尋求由目前各民族各自為政的學校制度進至馬來亞教育基於不分種族的原則，而以英文或巫文為教學媒介語，以其他語文為選科的時代的過渡方式」，而赤裸地暴露了該團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由于其措辭的溫和，行文的委婉，竟得以瞞騙過大多人的眼睛，這個歷史教訓，我們得好好汲取。

方吳在了解聯邦政府沒有那麼龐大的經費來開辦國民學校，並且正面的直截了當的消滅華校必然導至華人更堅決的維護民族教育之後，為殖民統治者指出了另一條消滅華校的道路。那便是：改變華校的本質，讓華校教育慢慢步進名存實亡的境地。這樣，政府既不用付出鉅款，又可收得奴化教育之效。

方吳的方法，深受殖民地主義者的讚賞。所以，在後來的許多措施中，他們的建議便被靈活的採用了。

那麼，方吳是建議用什麼方法來使華校變質呢？

原來他們主張立即改編課本，由殖民地官員「監督其內容」。在過渡時期，「自小學三年級的課本開始，凡中文名字與述語應附註英文」，以便「將來改用純粹英文課本時比較容易」（皆見第四章）。

而在華校英文程度還未普遍提高以前，英校應開辦「特別華文班」，「俾造成（華校小學畢業生）轉入英校五號班」。這種特別班為期一年，「其目的縱非完全亦應是大部份通過主要課程，增加英文的知識，並使學生認識他們所已認識的事物和思想的英文術語」（皆見第六章）。

至於華文中學，則除一本華文外，其他各科應採用英文課本，在過渡時期，史地可以暫用華文本（見第四章）。

在這種教育的薰陶下，當然，學生們會逐漸喪失其民族自尊心與民族意識，而傾向於崇拜西方的物質文明，羨慕和遵從宗主國，蔑視本族人民和我國其他民族的廣大的貧苦人民。到了那個時候，民族教育不用人家來消滅也自己滅亡了。

所以，方吳兩位博士洋洋得意寫道：「華校將繼續屹立在馬來亞許多時，想要粉碎牠們的任何企圖，將使華人下更大的決心保守它們；這種趨勢在目前已可見到了。與其讓華校轉入地下，遠不若讓它們公開存在。它們絕不會被消滅，除非待至華人自己決定他們已不再有存在的需要，這唯有在充份與完善的變通辦法之時始能實現，（見第五章）。

然而，雖然課本改變了，假如教師是具有民族意識，反對異族統治思想的人，那還了得？因此，方吳建議殖民地政府應該「協助羅致並訓練較多純全合格的教師」，對華校教師的「質」訓練陶冶得符合殖民主義者的胃口。方吳對於當時華校教職員的「質」是大感不滿意，他們把這項工作當作是一個「基要的問題」，認為從這方面着手是一項「比較聰明的辦法」（皆見第五章）。

方吳主張，應該從外國聘任四五位專家，主持一個國民學院，專門培養和訓練在任的教師。對於這些專家的要求，「華文知識雖很有裨益，但非主要。過去在其本土以外的經驗很合理想；世界觀最主要」（第五章）。

至於未來的教師，則應設立訓練學院來造就。所有訓練學院該是不分種族而是真正馬來亞人的，它們不應純粹是華人的，或印人的，或巫人的，它們必須訓練各民族教師以供應所有各校，它們的教職員是必須取自全人口中的所有份子，教授的語文似無可避免地應用英文，供作共同了解的基層，以及開導在他們的職業上達到最大可能的進步。（第五章）。這種訓練學院的教員，當然也應該是世界觀和殖民統治者不相悖的人士。

必須說明的是，有正義感的人們所須揭穿的只是隱藏在這種建議背後的陰謀，而並不是無原則的反對由政府來訓練培養教師。假如政府是基於我國人民利益以平等發展四大源流教育為出發點來造就一批批教員，而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那麼任何人都只有舉起雙手贊成。

綜觀上述所說幾點，我們大致也可看出方吳報告書的狡猾與陰險之處了。大概他們也怕人識穿吧，所以又建議政府應給與華校「有限度但有實效的財政援助」，其數目應低於其他三大源流教育，以博取華人的好感。

d. 52年教育法令

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基本上是依據巴恩報告書的軌跡並參照方吳報告書的手法而擬就的，同樣是壓迫民族教育，摧殘民族教育的傑作。

在第廿一條「國民學校」項下，該法令這樣規定道：

（1）為達到本法令之目的起見，國民學校乃使六歲至十二歲學生修完六年免費初級教育之學校；國民學校將側重於馬來亞之背景，而以聯合邦官方語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以及根據本章條文之規定，加授華文及淡米爾文。

（2）國民學校將分為兩種：（A）以巫文為教學媒介語者，（B）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者。

（3）在以巫文為教學媒介語之國民學校，各年級學生將加習英文，此外，如經學生家長請求，將于普通之上課時間外加授華文及淡米爾文。

（4）在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之國民學校，由三年級起，各班級學生必須加習巫文，此外，如經學生家長請求，將于普通之上課時間外加授華文及淡米爾文。

（5）除非基於學生家長之請求，否則國民學校內，不必一定教授華文或淡米爾文。

由此，可見在對付巫族教育上，它和巴恩報告書是同出一轍，只不過它對巫文的歧見，有着更露骨的暴露吧了。

在對付華、印兩族的教育上，這個法令是汲取了方吳報告書委婉曲折的消滅方法的精神，所以，它除了允許在所謂國民教育教授華印文外，還認為應讓方言學校繼續存在，並且「對於方言學校中的「合標準之補助學校」或「特准同意之補助學校」繼續作經濟方面之補助」。

然而，該法令又規定，如果這些方言學校不準備使逐漸「具有與國民學校相符之條件」，則當「國民學校」在方言學校附近建立後，教育官員有權停止發給方言學校的津貼金或是撤銷其註冊証（第廿條），企圖以種種的威脅來迫使華印民族學校就範。

其實，允許在國民學校教授華印文，也不過「攏好看」而已。首先，教授時間的長短，「應該給教育部以具有相當彈性的權限」，教育部規定每天教半點鐘也可以，規定每個星期教半點鐘也未嘗不可以。其次，誰敢斷言，當局不會特意調整，使得各班之中，絕沒有十五名以上的華族或印族在一起呢！

另一方面，該法令第廿五條規定：「學校行政，欽差大臣得制訂有關任何學校或任何種類學校之管理條例，而學校之行政必須遵照此管理條例之規定」。第廿六條又規定，「在每間學校，除非學校管理條例另予規定之外，學生之永久性教學，將受教育部長之管制」。

明眼人當能看出，這無非是使殖民統治者的魔手，可以「合法」地扼住民族教育的喉嚨而民族教育既受窒息就無法培養出大批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識的青年之卑鄙目的。

這個狠毒的法令，並未逃過人民雪亮的眼睛，仍然遭受到所有熱愛民族教育人士的反對和痛擊；華人在教總的領導下，羣起抨擊，巫文報與都山阿曼著論改訂，

印人也紛紛的表示反對。

e. 小學新薪津制

1952年初，英殖民統治者提出教師新薪津制，並頒佈其六大條件，後又增到七大條件。

起初，各地的華文教師及學校都紛紛表示反對，認定那七個條件實足以削弱華校日後的發展，而且所規定的薪金也並不怎麼樣高，後來，經過當局的一再解釋及作若干限度的修改後，反對的聲音就逐漸消沉，大家相繼去申請接受了。

那七大條件就是：（一）教師的聘任、調職及辭退均須經教育部之批准；（二）各教師之開始薪金額及應在何級薪金標準，應由教育部批准；（三）在錄取新生時，所有來自他校之轉學生，必須呈繳正式的轉學証，方可錄取；（四）學校中的課程，上課時間表及採用的教科書，必須為教育部所批准；（五）非事先獲得教育部的批准，不得徵收任何額外費用；（六）學校董事部，或任何一個及一個以上的團體，非事先獲得教育部的批准，不得支付超過依照教育部規定的薪津標準所應得的薪金額；（七）校舍及操場應合視學官或學校監督滿意的標準。

這七個條件，顯然將給予殖民地統治者很大的方便，來限制華校的發展，並且諸如第四條還可能導致華校的變質，遺憾的是，由於殖民當局的威迫利誘，竟使華校墜入圈套。

新薪津制于1953年1月開始實施。不久，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便產生了，諸如下令翌年不准增加班級，不准添聘教職員，嚴格限制各教室學生人數，禁止董事部給予中文教師特別津貼金等等。

後來，在教總的極力爭取下，當局才答應讓華校在1954年增開班級，但却又不給予任何資助，是為「非津貼班級」。同時，又命令各校，如1955年，欲增聘教職員，須于54年2月1日以前具函當地教育局申請，否則概不考慮，冀圖藉此限制華校正常發展。

1955年2月2日，英殖民統治者復發令轄下各州或殖民地教育局執行「非津貼班六條例」，即：（1）新開非津貼班級，須另行申請註冊為非津貼學校，其監理員及董事可由津貼學校的監理員及董事兼任；（2）須另有教室以資開辦非津貼班級；（3）非津貼班級的賬目收支，須分別辦理；（4）非津貼班的收費，雖不為教育署所規定，但收支賬目將被審查，徵收學雜費的數額須明白公佈；（5）非津貼學校若課程完備的，須另委校長一名；（6）津貼學校的教員，不得在課程完備的上下午非津貼班兼課或兼職。

這六個條例一經公佈，華人社會無不譁然，羣起抨擊，教總更召開各華校代表大會，會議上一致議決：「堅決反對非津貼班六條例！」

當局于是進行威迫利誘，然而在人民大團結底下，也無可奈何，終于不了了之。這是民族教育鬥爭所取得的又一次勝利。

正由于華校接受「小學新薪津制」引起了這麼多的波折，所以，後來很有些人發出怨言，以為當日不該草率從事，魯莽接受小學新薪津制，否則，就不致招來如

許煩難、阻撓與迫害。

是的，提高警惕，避免墜入殖民統治者的圈套，固然是對的、必要的，然而這也只是消極的抵抗，根本的解救民族教育危機的辦法，便是把我國的殖民地勢力全面的、乾淨地、徹底的剷除掉，要不然，即使不接受小學新薪津制，殖民統治者也必制定各種法律條規，「合法」地摧殘甚至消滅民族教育。

f. 54年的教育白皮書

在通過1952年教育法令時，英殖民統治者還是想利用國家的財政收入，廣建國民學校，來和方言學校對敵，企圖以免費和出路等問題來引誘家長把自己的兒女送入國民學校，迫使方言學校即使不被吊銷註冊証也得自動關閉，所以，當時殖民地政府特地通過實施商業註冊禮申法令等，徵收商業註冊稅以撥充教育經費。但是，由于英殖民統治者在馬來亞發動戰爭，每年預算案中，所謂「戡亂」費佔去一大把，就如1954年修正預算案，赤字竟達一億餘元，而致「衛生教育等事業從緩發展」故這個計劃並不得逞。根據1954年聯合邦政府憲報，從52年至54年為止，國民學校只辦了兩間。

在這種情況之下，英殖民統治者就採用方吳報告書的原則，即利用現有的各民族學校原有的設備，將它們的性質改變，代之以奴化教育，積極的向民族教育猛攻。這便是1954年教育白皮書的陰謀。

那年十月六日，這份白皮書在立法議會提出，教育閣員拿督杜萊辛甘動議：立法議會在原則上同意其中的第五及第六兩節，並且利用聯合邦教育基金，優先實施該計劃。綜觀這兩節的要旨，無非是：（1）在民族學校開辦國民班，「將國民學校之特質引入方言學校」以達到最後將「方言學校改變為國民學校」的目的。（2）大量訓練教師，以應付國民班的需要。（3）積極設立英文中學及工藝學校。（4）在無學校的地點，建立新國民學校。

所謂「將方言學校改變成國民學校」的辦法，便是：在各民族學校中，每年抽取一班，吸收各民族學生，以英語為教學媒介，由經過訓練的教師教導，班中各民族學生的比例，由各州或殖民地教育當局，「按當地情形及各種族的差別而訂定」。每年增加一班，即增加教師一名。如是六年中，整間學校的性質及課程將為之改變，而「類似大間的初級英校，如吉隆坡沙律英校和檳城萊士蘭學校」（杜萊辛甘語）。國民學校的學生，六年畢業後，即可升入英校中學，故其校中的課程，將「類似大間的初級英校課程」（杜萊辛甘語）。

在這種「方言學校中的國民學校班」任職的教師，必須會受英校教師師範訓練或是畢業於師範學院，並且成為政府的公務員，其任命及調職，都由各州或殖民地教局長處理。

顯然的，要實施這種計劃，首先碰到的難題，便是缺乏大批「訓練有素」的英文教師，所以，英殖民統治者便安排了如下的步驟。

首先，白皮書建議，每年造就的英文教師，其數目應該是：

| 年份 | 師範班 | 哥比 (英) | 哥打 峇魯 | 班蘭 士福 | 檳城 | 總共 |
|------|-----|-----------|----------|----------|-----|------|
| 1955 | 500 | 150 | — | — | — | 650 |
| 1956 | 500 | 150 | 150 | — | — | 800 |
| 1957 | 500 | 150 | 150 | 150 | — | 950 |
| 1958 | 500 | 150 | 150 | 150 | 150 | 1100 |
| 1959 | 500 | 150 | 150 | 150 | 150 | 1100 |

(單位：名)

其次，白皮書也建議，將方言學校改變為國民學校的辦法應該是：

| 年份 | 小學入學人數 | 中學入學人數 | 每年訓練及格前往方言學校教授的英文之教師 |
|------|---------|--------|----------------------|
| 1955 | 594,000 | 16,000 | 300 |
| 1956 | 604,000 | 16,000 | 500 |
| 1957 | 619,000 | 16,000 | 650 |
| 1958 | 641,000 | 16,000 | 750 |
| 1959 | 660,000 | 16,000 | 750 |
| 1960 | 682,000 | 16,000 | 750 |

(單位：名)

根據白皮書的建議，這個計劃的實施，應該最注意于改變巫文學校。同時，對於願意改變為國民學校的華校或淡米爾學校，以容納其附近的兒童就讀者，當局亦應注意及之。

白皮書于九月公佈，十月七日在立法議會通過後，雪蘭莪、吉蘭丹、馬六甲、霹靂等州的教育局便發函給各校監理員，詢問翌年是否願意開設國民班，殖民地政府還特地從1955年預算案的九千多萬元之教育經費中，撥出一千多萬元，作為方言學校中開辦國民班二百五十班，收容學生一萬名的費用。

英殖民統治者的這一着，無疑是想用「蠶食」的方法，將我國各民族的教育消滅掉。雖然，白皮書中也規定，從三年級起，國民班將加授馬來文，而且，如有十五名家長請求，從一年級起，即可以教授華文或是淡米爾文，但是，這到底掩飾不了英殖民統治者的詭計陰謀。

所以，儘管當時的教育副員威菲氏在電台廣播，大言不虛地說這種國民學校將容納各民族兒童生活在一起，消除民族間的隔膜，欽差大臣也揚言「國民班的目的是教導各民族兒童建立一種共同的馬來國家觀念」，却禁不住廣大人民從心坎燃起熊熊的憤怒之火，爆發出如山洪般的反對聲音。

54年12月8日華校教育界人士主張召開羣衆大會，抗議當局歧視華文教育。14日，檳城舉行華人社團，學校代表大會，一致反對該教育白皮書，並通告各華校勿輕易接受開設國民班，同月，森美蘭及吡叻兩地，巫族

家長召開會議，一致通過反對在巫校開辦國民班，27日，印人教育公會舉行會議，對聯邦教育政策咸表不滿，認為開設國民班無異即在剝奪印籍兒童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翌年1月23日馬職工理事會雪州分會常年代表大會也通過反對教育的白皮書。憤怒的火焰，迅速在全馬蔓延着，燃燒着……。

然而，這並沒有使殖民統治死去消滅民族教育的用心，放棄其文化侵略的政策，而各色各樣的陰謀勾當仍會層出不窮，因為民族教育和殖民統治者的利益是絕對對立的。另一方面，除非殖民地勢力被徹底擊退，否則維護民族教育的鬥爭還是會百折不撓地堅持下去。

g. 拉昔教育報告書

1955年8月聯合邦大選，聯盟獲得政權，它于翌年9月成立一個委員會，對前此的教育政策作全盤的重新檢討，結果草成了「1956年聯合邦教育委員會教育報告書」(亦稱拉昔教育報告書)。

由于聯盟在競選時曾揚言對於本邦各民族的學校、語言及文化，不但不消滅，而且還將給予鼓勵，所以事前人民會寄予很高的期望。等到報告書一發表，大家才發覺原來民族教育的危機並未消失，遂表示了極大的忿懣。據報載，巫統新山分部曾抨擊政府並未使馬來語文在小學及中學具有最高地位，反而讓英語佔優勢；吡叻宗教學校教師公會致電教育部長，指責該報告書含有殖民地政策性質。華校在教總的領導下，也一致反對該報告書摧殘消滅民族教育的條文。

綜觀該報告書，毫無誠意解決英殖民統治者加諸馬來小學的種種不合理束縛與虐待，而且也無誠意於積極提高和普及馬來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却又企圖導致其他民族中學變質，以致最後達到消滅各民族教育的卑鄙目的。在該報告書的建議下，各民族中學應改制為「準國民中學」。據是年12月29日當時的教育司明恩所發的一則通告透露：這種「準國民中學」將獲得政府特別津貼，但必須履行下列20個條件：

(1) 依照1956年教育報告書所建議「管理法章」或「監理法章」及「管理規程」或「整理條例」並依照1952年教育法令中的規定及在該法令下或現在任何法律下的規定或條例而管理學校。

(2) 與有關當局簽定契約。

(3) 依照教育委員會報告書第121節所建議準備在部長指示的班級內教授宗教知識及本邦國語和英語；倘若有十五名家長要求教授華文或淡米爾文，同時該種語文也非學校的主要教學媒介語，則學校必須加授該種語文。

(4) 保證學校授課時間表及課程綱要係遵照欽差大臣在議會中規定的適合各種學校者。

(5) 凡是在馬來亞出生，或其父母是馬來亞公民而居住在馬來亞以外的地方，其教育程度適合其申請進入的班級，並且適齡的兒童，均不得僅因種族或宗教的關係而被拒絕插入仍存空額的班級。

(6) 依照部長所規定的學齡法則計算，凡超齡的兒

童各級不得收容或予以留級，惟法則所准許者，則為例外。

(7) 學校應依照契約所訂的教師額數給予具有部長所規定的資格的教師，并保證在未獲得有關當局同意之前，不得將合約所訂定的教職員額數、人事或等級加以變更。

(9) 學校入學登記簿上的學生額數不得超過契約中所訂的額數，同時在任何班級內的學生亦不得超過40名，除非學校獲得有關當局的書面許可。

(10) 未獲得有關當局的同意前，校內班級不得超過契約中所訂的最高額數。

(11) 部長作是項指定時，須收納有關當局所指派的免費學生進入適當的班級，如遇新校舍的建築乃有關當局津貼過半者，則此項免費生可佔新校舍學生總數的廿巴仙。

(12) 維持學生中的紀律，俾使學生能遵守學校理事會委員，監理員，校長或助理校長的合理命令。

(13) 向校中教師或其他職員徵收決定的任何公積金，或養老金制度下應繳納的款項，此款項可從該校職員的薪金中扣除，并遵照部長核准的法則向學生徵收學費。

(14) 依照部長的要求，在校內給予任何教師訓練制度下的見習教師以實習的便利。

(15) 維持總視學官認為滿意及適合學校和課程的教育水準。

(16) 設立具有馬來亞觀念，并適合12歲至19歲間的兒童的五年制中學教育，惟若有學生由一種語文作教學媒介的小學升至另一種語文作教學媒介的中學時，則該中學于普通中學課程開始前一年，不准開設稱為補習班的過渡班級。

(17) 非得到教育部長的書面許可，學校不得收容任何未在本部長規定的小學升中學考試獲選的學生。

(18) 學校課程的編排應係準備學生于中學生五年制的第三年能參加初級文憑考試。

(19) 在未獲得教育部長的書面許可之前，任何學生不得進入中學五年制的最後兩年，除非該生具有部長所規定的升學資格。

(20) 學校課程的編排應係準備學生在中學五年制的第五年將參加馬來亞聯邦及(或)劍橋海外學校文憑考試。

這些條例，很多都是汲取了小學新薪津制措施的「精華」，貿然接受，必成為人家俎上之肉而無疑，所以當時教總在林連玉先生的領導下，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籲各華文中學團結一致，劃一步驟拒絕接受。結果，除鍾靈中學，芙蓉振平中學及其他教會學校之外，大家都表現出凜然之正氣。那些只顧眼前小利，而置民族教育于不顧之徒，當時曾遭受該校師生及社會人士的嚴厲譴責和反對！

h. 達立教育報告書

獨立以後，聯盟政府又于1960年8月3日發表了一份教育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是由以當時的教育部長達立為

主席，成員全部是聯盟政要的一個「教育檢討委員會」草擬而成的，起草人為英籍教育官奧斯本。故名「教育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也叫「達立教育報告書」。

綜觀全書，對於扶助、發展各民族教育不但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議，反而安排了一大套摧殘、消滅民族教育的計劃。

首先，我們看到報告書完全忽視國語(馬來語)教育的發展，並且多方利用英語來壓制國語，阻礙國語的發展和取代國語的地位。

雖然，今天不論是憲法，教育法令，教育報告書以至聯盟的首要，無不一再申言要大力推展馬來語，使它在1967年或更早成為名符其實的國語，然而整份報告書對於馬來教育當前所存在之種種畸形狀態(諸如馬來教育基本上還停留在小學階段，教科書進度不相銜接，部份受訓教員不能以馬來語教授學生所學的東西)及其改善辦法，却絕口不提，也不涉及如何普遍設立以馬來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馬來中學及馬來大學等重要問題。

相反地，我們還看到報告書在第355節至395節竭力強調證明英語對國語的絕對優越性。

其次，在華印文教育方面，小學教育被允許暫時存在，但必需面對慢性的毒殺。根據報告書第127節明文規定，今後担任免費小學教師的資格是：「具有初級教育文憑基本資格，加上曾受教育部主辦師訓班三年訓練」，而初級文憑是用英文文出題作答，師訓班也是以英文文為教學及考試媒介，在這種措施底下，華印文水平必然不能得到提高，而且更陰險的是長此以往，很可能造成人們對自己民族語言文化的忽視，產生了對英國文化腐朽一面的迷戀與盲從，而實現了方吳報告書揭述的殖民統治者所希求的那種夢想，從而提供別有居心者以民族學校「已不再有存在的需要」的藉口，使民族教育再也無立足餘地。

華印文中學教育，則馬上面臨着變質和消滅的危機。根據報告書規定，從1962年起，「只有國民全津貼中學，獨立中學」的存在，「在全津貼中學，主要教育媒介語為其中一種官方語文」(皆見第62節)，「初級教育文憑考試及馬來亞聯邦教育文憑考試，應繼續舉行之，同時，只能採取本邦兩種官方語文」。所有全津貼中學領取津貼金的條件是：「必須使其學生準備參加此等考試」(第72節)，而對獨立中學，政府則不給予半分錢的資助，也不為其學生舉行任何考試，但是它們「要遵守法定條件，就與津貼學校的條件一樣，這些條件包括了有關批准的政府章程下組成之董事部，1957年教育法令的註冊條件，部長規定的共同課程表、時間表與學習課程，以及1956年教育(學校紀律)條例和法定衛生條件」(皆見第114節)。這種措施，完全不符平等對待、扶助與發展民族教育的原則，是極端錯誤的，而且顯然欲藉此將我國的中學教育全盤英枝化。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禁要問：如果有任何學校欲以巫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是否行得通呢？教科書在那裏？師資在那裏？

因此，報告書對巫語地位所作的這樣或那樣的規定，表面上雖然好看，但其本意并不是真心要發展馬來

馬來亞紗廠爲什麼會關閉？

—堅 毅—

創始于一九五二年的馬來亞紡織有限公司面臨危機而於今年五月八日正式宣佈收盤結束營業，從此以後，本邦唯一而僅有九年歷史的紡織工業，終告絕滅了。

紡織業的絕滅投射出一副陰暗的縮影，顯示了本邦民族工業，尚處在自生自滅風雨飄搖的命運線上，諸如，椰油業、肥皂業、碩莪業、火電鋸、黃梨業、印刷業、籐業、縫衣業、鞋業、漁業等，目前正遭遇着重重的困難和危機，這些困難和危機是多方面的。諸如，聯邦關稅壘壘繼續存在，有時還突然增加某些星洲產品的稅收率；大量的舶來品充塞傾銷本邦市場，外銷市場窄狹和不穩定；工業發展資金薄弱，迴轉不靈；營業管理技術設備粗拙簡劣；原料來源短絀，價格高漲。

迄今爲止，我們尚未覺察到有那些事實，證實政府確實在實際的行動方面，關照和資助這些窮途沒路的民族工業，從很大的程度上去克服解決這些困難和危機。

前些時候，星洲財政部曾就馬來亞紗廠關閉之事，向報界發表一項官方聲明：指斥工會蓄意製造勞資糾紛，採取工業行動，迫使馬來亞紗廠關閉。

這些言論與其說是解釋事情的真相，毋寧說是由於政治因素而掩蔽事實，以致混淆了視聽，除此之外，政府並沒有對紗廠關閉的真正因素，提出客觀具體的分析，從而給予挽救和資助，實屬可惜和令人深爲抱憾！

只有從實際方面去檢討分析紗廠關閉的前因後果，才會有意義。有了這一番的認識，我們再去看看政府如何對待發展本地工業的態度，就比較易於理解。

星洲紡織工業的一般概況

馬來亞紗廠是一間從事原料生產性質的加工工業，其主要的產品是棉紡和人造紗線，這兩種產品是供給織布廠，針織廠織造紡織品的一種工業原料。這些產品只有外銷市場，其中最大的主顧是印尼；其次是鄰近的泰國，菲律賓，錫蘭；也曾運銷至英國、澳國、紐西蘭、

東非等地。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是該廠在產量上達至最高漲的兩年，原因是接到了一批美棉加工，爲印尼代紡了二百八十多萬磅棉紗，一九六一年首季又再承接了一宗爲印尼代紡的一百八十多萬磅的棉紗。

織紡棉紗和人造紗綫的原料是棉花和人造纖維，其來源是美國、日本、巴西、非洲、丹麥、巴基斯坦等地。

該廠精紡部紗錠僅有一萬二千八百枚，生產支數從10支至最高42支，每日平均生產量一萬四千磅。

全部僱用職工人員總計有四百五十名左右，其中包括卅多名職員及指導技術人員，四百多名普通技術工人。僱主付給工資薪金計算辦法：職員及指導人員方面是以月薪計算，普通熟練技術工人方面是按件計算。

職員及指導人員每月最高薪金是三百五十元，最低薪金是一百廿元，普通技術人員佔全廠工人總數之五巴仙，每日最高工資是七元，一般工資是四元五角（佔全廠之八十巴仙），最低工資是三元五角，（佔全數之十五巴仙）初進廠受技術訓練之養成工，在三個月的訓練期間內，每日工資以一元三角三分計算。

星洲紡織工業基礎不堅固

從上列所概述的情況看來，我們發現幾項特點：

其一，這項紡織工業無論是在生產或工業化程度來看，還是處在幼稚階段，如單和東南亞不發達國家的紡織業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這說明了星洲紡織工業還是非常落後的。

完整的紡織工業應該達到自紡、自織、自染的程度，換言之，從自紡原料至成品一系列生產過程的組合工業，這些組合性的工業基礎，應該包括棉紗生產部門、織布生產部門、漂染生產部門、針織生產部門。

從合理的工業發展過程來說，像星洲這個地方，理

教育，而是冀圖藉此造成民族間的彼此猜忌、不滿，以破壞我國三大民族的團結與友誼。

總的說來，這本報告書的目標和巴恩巫文教育報告書等，是一模一樣的，即是徹底消滅各民族教育！只不過這本報告書的行文與措詞，比較以前的更爲巧妙罢了，特別是對待巫文教育方面。

（三）對於民族教育的意見和展望

我們應該指出，也正是各民族同胞所應該認識的，即是真正符合人民願望的教育制度，今天還未確立起來。

我們認爲，基于人民的利益，爲了保證馬來亞文化呈現出百花爭春的爛燦畫面，由人民選出的政府應立即停止通過政治、經濟手段對民族教育所施的壓迫與摧殘，反之，必須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源流，并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與提携。

當然，所謂平等，并非絕對的平均主義，那一個民族的教育源流有了迫切的需要，國家應及時給予充分的輔助。以目前的情況來說，馬來語文由于長期受殖民統治者的摧殘，要儘速成爲名符其實的國語，政府必須在不妨礙其他民族語文正常發展的原則下，優先考慮全面普及和提高馬來教育。

我們也認爲：英國語文雖然不是我國人民的民族語

應建立一項能夠供給本邦消費，同時還能向東南亞一帶爭取外銷市場的紡織工業。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其二，因為星洲還沒有織布廠、紡織廠的設立，所以紗廠的產品必需全部依賴海外市場，這就形成了星洲紡織業就像處於「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地位，外銷市場依賴的不穩定不安全是有歷史根源的。

當前星加坡的社會制度還是停留在半殖民地的歷史階段，我邦的經濟體系亦屬殖民地性質，以致我邦工業不能獲得迅速的發展，同時，本邦出產的工業品常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的打擊和威脅。

再者，我邦的政治主權、外交政策、經濟貿易政策都直接遭受宗主國的控制，並符合宗主國的經濟利益而行使，於是乎，外國壟斷資本家經常都通過政治上的有利條件，壓制民族資本的抬頭，因而本邦各項民族工業，尚處在自生自滅風雨飄搖的狀態中。

戰後東南亞一帶新興的獨立國，為發展他們本身的國家經濟，扶助其民族工業，採取了各種保護本國民族工業的措施，逐步擴大國內外市場，這些變動都是直接的、間接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我邦對外的貿易。

就以馬來亞紗廠來說，其主要市場是外銷至印尼、泰國、菲律賓、錫蘭等地，前面已分析過，隨着東南亞國家經濟貿易政策的變動，再加上國際棉紗市場的競爭日愈激烈，諸如日本、香港、印度、巴基斯坦都是馬來亞紗廠強大的勁敵對手。

在此種情況下，我邦紡織廠對外市場是極不穩定的。

其三，目前聯邦有一間織布廠（馬來亞織染有限公司），全廠僱用了八百多名職工人員，每日能夠出產三百磅以上的各級的顏色布疋，除供星馬兩地銷售外，亦遠銷售至東南亞各國。

雖然如此，但該廠織布的工業原料，並不向星加坡紗廠購買吸取，反而向遠道的香港、印度、巴基斯坦購買吸取。

雖說星洲出產之棉紗品質比不上香港、印度、巴基斯坦，但是亦符合一定的國際水準，對紡初級中級布疋仍然是適宜的。在價格方面來說，星洲紗價比上述各國低，有鑑于此，聯邦織布廠如能向星洲購取棉紗，對星馬兩地紡織工業的發展是有利無弊的。

文，但是，由於過去歷史造成的結果，已有一部分人民把它吸收為自己的應用語文，因此，片面地高喊完全排斥英文教育是不對的。不過，目前英文教育在我國教育制度中佔據着太上地位的不合理畸形現象應儘速的解決，并且任何欲利用英語來打擊民族語文和阻礙國語正常發展的陰謀必須受到制止。

我們贊同共同的課程綱領，但課程內容必須依據人民的利益來編纂。以當前的情況來說，為了促進三大民族之間的團結，共同建設一個獨立自主、自由幸福與和平繁榮的馬來亞，課程內容應該灌輸給學生以反殖，反種族主義的思想，並建立民族主義與大同主義的思想。離開這個原則，奢談建立容納各民族學童在一起的學校，那只是形式主義的作法；至於欲強硬從「一個國家，一

近二年來星馬共同市場之口號喊得够响亮，但是這些漂亮時髦的口號何時能實現還是一個大問題。

基於上述三項特點的分析，我們可得出結論：星洲紡織廠的工業基礎是不堅固和不健全的，除非政府能夠全面調查本地人口的紡織品消費需求，及其他各方面的條件，從而擬定一項綜合性的紡織業發展計劃。根據這項計劃政府是可以在技術方面、社會服務方面鼓勵和資助具有游資的本地資本家，投資創立完整的組合性的紡織工業。遺憾的是政府並沒有在這方面盡其職責。

紗廠關閉前的一段勞資糾紛

馬來亞紗廠在一九六一年的首季里接到了另一宗一百八十多萬磅為印尼代紡的棉紗協定，這宗協定規定紗廠四月開始生產，至九月底全部完工交貨。這之後該廠並未再接獲新的定單。為了改組了整個生產的計劃，並減少每週開工率，十月一日廠方開始宣佈實行輪工制。當時工會認識到廠方的營業處境，原則上接受了輪工制的實行，問題的爭執點是在於輪工的辦法和原則。

根據工會方面的統計所得的實際情形：在正常的時期，清花、梳棉等十一個部門每週工作日是六日，而輪工後，各部門之每週工作日則普遍減少。

各部門之工作日如下：

清花部（工人十三）梳棉部（工人十七）粗紗部（工人廿四），這三個部門每週工作日只有三天；併線部（工人十四）工作日乃為六日，保全部（工人廿四）有五天工作日，精紡部（一〇三人）筒子部（六十七人）雜工部（六十七人）各有工作日四天，併條部（十七人）工作日二天；而搖紗部（四五人）及成色部（十二人）各有一天之工作日。

輪工制實行後，全廠工人工資普遍的下降了，根據工會統計，每週工作由一日至二日者有七十四人，佔全廠工友之十八巴仙。他們每月的收入在卅元左右，計每月減少至每月收入七十五巴仙；每週工作日三至四日者有二百九十一人，佔全廠工人之七十二巴仙，平均每月收入為六十元左右，這是減少至每月收入的五十巴仙；而每週工作五日至六日者有卅八人，佔全廠人數之十巴仙，平均每月收入為一百元，這是減少至每月收入的廿五巴仙。

種文化，一種語言」出發，來達到什麼維護「國家的利益」、「促進民族團結」，那就是違反歷史進程的倒退措施了。

最後，我們願意指出，國語教育未能健全地發展，民族教育問題未能獲得合理解決，是和我國的政治、經濟結構有着密切的關聯。只要我國的人民能不斷奮鬥，總有一天真正當家作主，民族教育問題必將伴隨着其他問題迎刃而解。既然這樣，我們縱然看到今天民族教育仍然多災多難，我們也決不應氣餒。正相反，我們看到民族教育為祖國培養了無數人才，在我國的民族運動史上發射過不能磨滅的光芒，並且還會在未來的光明日子裡顯得更加燦爛，因而我們對民族教育的生命力充滿了信心。讓我們為她而讚美，為她而祝福吧！

由于輪工制的辦法原則未達致合理的解決，工潮終於在去年十月廿三日告爆發。

工潮發生後勞資雙方會再嘗試通過談判協商，謀求解決不遂。在這幾次談判中，資方提出一項：解決糾紛工潮的建議書，其中包括（一）無條件的實行減員；（二）全廠工人工資率重新修訂（即裁減全廠工人之工資率）；（三）增訂廠規。

工會方面爲了打破僵局，亦向資方提出五項復工建議：（一）復工後的三個月內，資方應維持全廠工人每週至少有三日至四日之工作，每日工資不低過基本工資；（二）裁退工人或恢復全廠工人每週六天之工作事項，應在復工後的三個月內，從長談判，謀求合理解決；（三）在復工後的三個月內展開談判解決有關拆卸機器問題；（四）年假，公共假期，女工分娩假期應在復工之前獲得解決；（五）有關改良品質及提高生產率事項，一概交由勞資委派代表組成一個勞資協議會去討論。

工會五項復工建議未獲得資方接受，工潮開始陷入另一個複雜的階段。

勞工部對待處理此宗工潮態度是必需提出檢討的。在這個時期，行動黨政府已改變了昔日的反殖政治路線，親勞工政策也變了質，政府對待所有左派工會採取敵對的態度，一切的國家機關，都被利用爲右派工會服務，處在此種政治局局面下無怪政府對待領導這次紗廠工潮鬥爭的有關工會的態度是敵視的，另一方面勞工部不再被工人認爲是一個維持中立的調解糾紛的機關了。

前此，行動黨政府的一貫政策是：任何僱主要實施裁員時，必需遵循合理的裁員程序原則、條件，但是隨着政治上的變化，勞工部在處理此項糾紛時，並未運用其權力公正執行上述職務來阻止僱主提出其「無條件的裁員」及「全廠裁減工資」。勞工部知道得很清楚，假如這二項主要的問題能夠獲得合理解決，其他問題亦可在預定期限內迎刃而解，在這項基礎下，工潮是可能解決的。然而，勞資糾紛終於不能解決；資方且宣佈將紗廠停辦，這實在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在此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政府在處理勞資糾紛和工潮時，顯然是受到政治上的變動所牽制和影响。

造成紗廠關閉的根本因素

五月八日，資方召開股東大會及債權人大會，正式宣佈收盤。

造成紗廠關閉的根本因素是可以通過實際調查而尋找出來的，虛張捏造的片面言論，除了或者可以作爲政治上的宣傳資料之外，它對勞資雙方及星洲人民並未有任何的價值。

上面我們經已很清楚說明了：星加坡的紡織工業本身的工業基礎是不健全不堅固。國際上棉紗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邦落後的紗織工廠未能與外國產品競爭，加以東南亞各新興獨立國的經濟貿易政策的轉變，更造成本邦紡織品所依賴的海外市場的不穩定，這種種客觀存在着的情形，是造成馬來亞紗廠關閉的外在因素。

造成馬來亞紗廠關閉的內在因素是什麼？

其一，紗廠自創辦以來是依賴有限度的流動資金，來維持和擴張營業，這一批流動資金的數目是非常微弱，它的蓄增率並不很高，這一來就形成管理技術設備，臻於現代化和機械化的程度，不可能很迅速的加以改良和提高，因而生產率和品質的提高也緩慢下來，這種營業制度和方法是跟不上其他東南亞各國紡織工業的發展。

其二，據說，今年初印尼織布商有意再向星洲簽訂一項代紡協定，但是，這次的協定不是現款交易了，因爲印商受到印尼政府施行外匯統制政策的牽制，加上日本、德國、印度爲了競爭印尼棉紗市場，紛紛提出延長貿易放賬期限協定，此次印商以放賬一年爲條件，方願意和星洲紗廠協定一項代紡協定，而星洲紗廠的流動資金已空缺，根本無法接受此項定單。

其三，依照政府保護發展本地工業的宗旨，理應通過經濟發展局貸款資助紗廠繼續維持營業。由于政府對此項工業採取冷淡的態度，因而馬來亞紗廠關閉已成定局。

事實上，近年來政府在工業活動方面所表現的態度，根本不能說是有真正誠意來關照資助本地民族工業的生存和發展，其實政府所擬定的工業發展四年的計劃，只是寄托在外國資本家的身上，（諸如英國，美國，澳洲，日本，歐洲等）

星洲發展紡織工業的可能性

前面已剖析過，建立一項能夠供應本國需要的紡織工業是迫切需要的，我們不妨翻開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〇年，星洲對外貿易的統計報告：

一九五九年從外地輸進本地布疋貨值爲八千一百六十九萬六千元，輸出貨值是八千九百九十七萬五千元。

人造纖維品輸進貨值八千五百卅二萬一千元；輸出貨值一千五百五十三萬七千元。

一九六〇年，從外地輸進本地布疋貨值爲二千二百四十八萬元；輸出貨值二千一百〇九萬一千元。

人造纖維品輸進貨值二千一百十八萬七千元；輸出貨值一千〇四十九萬三千元。

布內衣褲輸進貨值四百三十七萬三千元，輸出貨值是四百二十五萬二千元。

從這些數字看來，我們覺察到紡織品及布料成品的輸入和輸出，佔我邦對外貿易的重要地位。

假如我們再將上列三項貿易數字剖析，一九六〇年布疋，人造纖維品，布內衣褲三項輸入價值總和是四千八〇三萬元，再和這三項輸出貨值三千五百八十三萬六千元相對銷，我們就可以知道星洲一九六〇年紡織品布料成品的消費量總值是一千〇八十六萬一百六十五元。

星洲一百五十萬人口每日日常生活必需品，諸如，布疋、毛巾、針織、外套短襖、內衣褲、睡衣褲、恤衫、手套、花邊帶都是取之外地輸入。

一九五八年政府曾調查本邦私人企業狀況，據其統計報告：本邦所有四間紡織工廠僱用五百四十三名工人，每日生產值是四百八十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元。

但是很可惜的事情發生了，去年兩間手工織染的紗

歷史科學及其任務

—史丹青—

1. 歷史是一門實用的科學知識

歷史是一門實用的科學知識，它包含着無限豐富多彩的內容，提供了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知識，人類可以從自身的歷史進程中，找到科學真理和正義，使人們能够在當前的歷史事件中正確判明方向，了解自身在這些歷史事件中所擔負的歷史任務，看清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歷史的前景。

「歷史」之成爲一門科學，雖然僅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然而自從科學成爲先進的人民羣衆進行改革社會，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理論根據，它武裝了人們的思想，堅定了他們對社會進步事業的信念，特別是幾十年來，在一些社會階級矛盾極其尖銳的國家，被壓迫，被剝削的下層勞苦羣衆依循了歷史科學所指出的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對腐朽的舊社會制度展開猛烈的攻擊，爲爭取合理社會制度的實現，他們徹底摧毀了舊社會的一切支柱，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而成功地建立了新型的社會，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爲人類的美好明天開拓了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的面貌。

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正是說明了歷史科學在現實生活中能够實際應用來爲社會謀福利。

2. 歷史科學之實質

歷史決不是捏造的故事或神話，也決不是少數學者所搬弄的「高貴」知識。歷史是勞動人民「在其生活的長期鬥爭中所展開的社會經濟形態之發生、發展與更替的相續的諸過程。」社會的一切文明，都是勞動人民的血和汗創造的，人民羣衆進行社會物質生產的活動創造了歷史。換句話說，歷史決不是什麼「理性」、「自由意志」等神秘主義的東西所產生的，也不是「人類精神和平進化過程之幽雅的牧歌，而是人類生活鬥爭及其革命實踐，所推進社會發展之一貫的全面的總述。」

在中古神權思想控制一切的時代，人類歷史被解釋

爲「上帝」與「魔鬼」的衝突和爭鬥的歷史。「人類歷史的內容與價值，就用天堂、地獄的目的與衝突來決定。」「教會『聖人』奧古斯丁（St. Aurelius Augustine, 353—430 A. D.）認爲：「歷史是一部上天下地，賞善罰惡的說明書。」

封建時代的史家把人類社會歷史當作是帝王將相的改朝換代的「流水賬」，或某些傑出人物的活動記錄。

唯心主義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眼里，人類社會的歷史變成了一連串偶然的事件，變成了一堆錯誤、蠢動和謬舉。例如歐洲中世紀時代的歷史，被看成頭腦迷亂的結果、人們無知和迷信的結果或粗暴脾氣和惡劣立法的結果。唯心主義者認爲，不是社會存在，不是社會物質生活產生一定的社會意識，相反地，是一些意識、理性、概念等神秘主義的東西產生並決定社會生活，社會存在。從這一個錯誤的思想方法出發，唯心主義者不是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來說明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理論、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而是從人們的意識，從哲學、政治、道德、宗教等等的觀念的原則來說明社會的全部歷史，而一切歷史事件則決定於人、歷史人物、領袖、英雄、統帥、帝王的自覺活動和意志。

唯心主義對社會生活，對歷史的看法有三個根本的缺陷：

第一，唯心主義的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社會生活時，只考察人們活動的思想動機，而不管引起和決定這些動機的東西。因此，他們只停留在社會生活的表面現象，歷史過程的表面，他們不能深入現象的本質，揭示所研究的現象的深刻物質原因。

第二，唯心主義否定社會現象和自然界的現象一樣都要服從不從人們的意識和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的作用。他們只是看到和描述歷史事件，社會現象的偶然的外部的聯系。至多，他們也只能描述歷史過程的片面現象，或作一些史料的層疊堆積。

第三，唯心主義歷史學的特徵，是它們忽視或有意抹煞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把社會的歷史歸結

籠圍巾廠已經關閉了，今年馬來亞紗織廠也告關閉，這個慘痛的實事，並非顯露出紡織業沒有前途；而是說明了政府資助的不够，以致一路來星洲紡織工業都是自生自滅，處於風雨飄搖中作艱苦的掙扎。

雖說政府的四年工業發展計劃，曾計劃在裕廊工業區建立一間紡織廠，至今已兩年了，還是空雷無雨，看來它的實現是遙遙無期了。

今年馬來亞紗廠面臨關閉的時刻，政府是知道得很清楚，設若馬來亞紗廠關閉，不僅絕滅了星洲紡織工業，而且增加了失業的嚴重性。依照政府保護本地工業的宗

旨看來，對於一項面臨危機的工業是沒有理由袖手旁觀的，但是政府在處理紗廠事件的態度上既然是這樣的不明智和未盡責任却只知道一味從中尋求政治宣傳，這就必然不能爲政府帶來「工業的和平和正義」，因此政府日日在高喊着的「工業化」的口號，只是將星洲慘淡陰暗的現狀粉飾成另一副虛幻的繁榮幸福的景象而已。

星洲民辦紗織工業所遭的厄運，再度雄辯地爲我們証實了這樣一個真理：沒有在各方面堅決剷除殖民主義對我國的壓迫，就不可能有什麼「工業安寧」，從而也就不可能有什麼「經濟繁榮」。

為偉人、帝王、將相的歷史。

科學的新歷史觀未確立以前所存在的錯誤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是由於歷史學家的階級地位、階級局限性決定的。這些階級的思想家本着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用錯誤的唯心主義思想來迷惑人民羣衆。他們蓄意曲解社會生活現象、曲解歷史事件，企圖掩蓋由於他們所出身的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所造成的廣大勞苦羣衆的貧困和其他苦難，在他們杜撰的歷史中，從所謂「永恆不變的原則」出發，力圖証明他們所出身的上層階級所支配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最理想的」；是永恆不變的不可動搖的。他們企圖從歷史上尋找「根據」，不惜歪曲歷史，捏造歷史。對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作全面的、澈底的批判，是建立科學的新歷史觀的首要任務。

歷史是一門科學，它是研究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研究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歷史科學要解答的課題是：什麼因素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什麼決定社會的發展，決定一種社會制度向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過渡。

作為研究一切社會現象，研究個別民族和個別國家的全部歷史發展的最高指導原理的歷史哲學——科學的新歷史觀，它研究社會歷史過程的一般規律，它和通史、局部的社會科學（如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的任務不同，通史雖然也研究社會歷史的各方面，但它是按年代順序研究個別國家和個別時代的具體事件的；而歷史哲學（或歷史理論）是研究社會歷史的最一般的，最根本的理論和方法。弄不清楚歷史哲學，就不可能正確解釋整個社會生活現象的發展，不可能正確的說明紛紜複雜的全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

在複雜多樣、諸多矛盾衝突和矛盾統一的歷史事件更替中，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是存在着內在的必然聯繫呢，還是在社會生活中，和自然界不同，是一團混亂，偶然性和任意妄為統治着一切呢？這就是歷史科學所要探討的根本問題之一。

人類社會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發展過程：從原始公社制度，經過了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及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社會邁進。那末，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動力是什麼呢？

科學的新歷史觀給予這些問題以唯一正確的解答，它正確指出我們把社會歷史當做有機構聯系的整體，具有矛盾衝突和矛盾統一的合乎規律的過程來加以認識，使我們有可能正確認識現在和預見未來。新的歷史觀給歷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使歷史研究者不至於為複雜的歷史事件所迷惑，而能夠自覺地探索前進。

跟一切用社會意識來說明社會存在的唯心主義學說相反，科學的新歷史觀用社會存在、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來說明社會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是科學的新歷史觀的基本原理，用科學的新哲學觀的方法研究社會，可以了解社會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相互制約，了解它們的矛盾運動和發展。應用辯證法的新哲學觀的原理推廣去認識社會，應用這些原理去說明社會歷史，從而創立了科學的新歷史觀。科學的新歷史觀使人們能夠把人類歷史正確了解為低級社會形態通過矛盾的產生和解決，

通過新的先進的社會力量反對舊的反動的衰朽的社會力量的鬥爭，通過社會革命而走向高級社會形態的一往直前發展的過程。

科學的新歷史觀給了新歷史觀的實質、基本原理一個明確的說明。他們的基本論點可以概述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要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合就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種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人們所藉以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揣度為根據一樣，我們評判這樣一個變革時代時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恰恰相反，這種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份發展餘地的那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們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會提出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我們仔細去看時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藉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

3. 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與人的自覺活動

唯心主義的歷史學家把思想的或「精神的」變化和某些杰出人物的活動看做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他們自欺欺人的對歷史給予錯誤的解釋，對他們來說，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是永遠不會被發現的，因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的發現和揭露顯然是不利於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害怕嚴酷的歷史必然性，害怕看到本身階級趨向沒落和滅亡的不可避免的到來，因而極力否認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反之却將歷史塗上了神秘色彩和編造了什麼永世不變的「法則」以便消滅人剝削人現象的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的信心，動搖他們對於預見事變進程和自覺地改造社會的可能性的信念。

中國唯心論史學家梁啟超在否認「歷史」成為社會科學之可能性時，這樣說：

「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云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駁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中國歷史研究法P. 167）

梁啟超既認為歷史為「心力」所造成，「意志的創造品」，他對於歷史發展的決定原因，提出了所謂「民族意力」，甚而走到個別歷史人物決定歷史命運的結論上去。

持科學的新史觀的史學家，對社會歷史怎樣成為科學這一問題給予唯心主義者以有力的駁斥，他們認為：科學的新史觀當然不否認人們在歷史活動中的思想動機，但是決不能滿足於用思想動機來解釋歷史發展過程。……需要知道的是：為什麼某種思想動機在一定時期會成為千百萬人的集中意志，並使千百萬人行動起來；為什麼這一種思想動機在歷史發展中能夠起顯著的作用，那一種思想動機則並不起什麼作用；為什麼在社會生活中，雖然有無數的互相抵觸，互相沖突的思想動機；但是歷史發展的總的趨勢仍然循着確定的軌道前進；為什麼某些歷史人物的個性，雖然能夠對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個別面貌起一定影響，但是他們永遠不能決定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等等，只能做這樣深入的分析才有可能對歷史作出正確的也就是科學的解釋。

在人類的實踐生活及其發展中表現為極其複雜的現象，社會發展規律即是從這些複雜的具體的歷史事實中探求出來的。它是從許多民族和國家的全部歷史事實中，加以綜合、比較、分析出來的，它是全部人類具體歷史之抽象的說明。人類全部具體的歷史，都經過一貫的相續的諸發展階段而合乎規律性，然而由於個別民族和個別國家的條件不同，也呈現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必須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中 and 其特殊性的統一的探究中，才能復現各民族與各時代的歷史之具體內容。

把歷史當作無數偶然事件的表現，是唯心主義者的特徵之一。「科學的任務就是在無數現實的偶然事件和似乎是偶然的事件背後，揭露現象的內在必然聯系的規律性。」

新史觀教導我們，任何社會現象都必須聯系着產生這個現象的那些條件去加以考察，一切事物都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

只有從具體的歷史條件來探究社會現象，才能認識社會發展的內在必然聯系的規律性。顯然的，如果沒有這種對社會現象底歷史的態度，那麼歷史科學的存在與發展是不可能，也只有這種態度，才能使歷史的科學不致成為偶然性混亂與盲目的錯誤的堆積。

某些反科學的新史觀的人有意曲解說，承認社會發展有客觀的規律性，承認歷史的必然性，就必然要導致宿命論，導致否定人的自覺活動，把社會中人的有意識活動認為完全依循機械的規律而活動着。恰恰相反，科學的新史觀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同時，也正正確識到人的自覺活動對歷史發展的作用。人們可以掌握客觀規律，可以預見發展的趨勢，可以順利地進行自覺的

活動來實踐歷史的必然性。

承認歷史的必然性，承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決不會導致無為的看法，導致人們消極地等待這種歷史必然性的到來。相反地，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和變展，使人們感到腐朽的社會制度必須要消滅，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社會制度必然要代替，這種意識普遍為羣眾所有時，就成了物質力量，發揮了組織、動員，和有創造的自覺的革命活動，加速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科學的新史觀一方面用科學的冷靜態度來分析客觀情勢和客觀進化進程，一方面毫不置疑的肯定人民羣眾的歷史創造的自覺活動。

以上所談到的，就是歷史科學的一般課題。現在讓我們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闡明歷史科學的具體的任務。

4. 歷史科學的具體任務

現在提出歷史科學的任務問題來探討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的。關於歷史科學的任務問題，早已為先進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解答了，具有詳盡的指示，指導着人們的實踐活動，理論與實踐也有了正確的印証。現只就我國歷史學界的情況來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

為什麼我們要提出歷史科學的任務問題，提出這問題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們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論述。即（1）對祖國歷史之整理和編纂方面；（2）歷史理論結合實踐之應用方面。

1. 對祖國歷史之整理和編纂——歷史科學

在先進的國家已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並取得了正確結論，對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也作了系統地整理和總結。歷史科學成為人們必需的知識，它培養人民具有愛祖國、愛大眾、愛勞動、愛和平的思想意識，從而成為新社會的積極建設者。然而，在我國這一項迫切的歷史研究工作不知落後得多遠，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一切還沒有真正開始。固然在我國的歷史研究工作還存在着許多客觀上的困難，但主觀上努力不夠確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目前，我們能夠在市面上、圖書館里找到的有關我國歷史的著述，或在大學講堂上所教授的馬來亞歷史的教科書，幾乎全都是外國學者撰寫的，其中以英國的學者撰寫的為數最多。這些著述都是站在西方殖民地宗主國的立場，以非馬來亞民族的觀點來編撰的。他們抱着明顯的偏見一味對殖民統治者歌功頌德，把馬來亞今天的「繁榮」說成是殖民統治者的「苦心開發」和經營的結果，把馬來亞人民在這一百多年來展開不屈不撓的鬥爭所取得的政治進步，硬說成是殖民主義者的「扶助」和「引導」的結果。

我國長期被殖民主義奴役統治的結果，不但在經濟上遭受到慘重的掠奪和剝削，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遭受到嚴重的壓制和破壞，這就是造成我國經濟與文化落後的真實原因。近一百四十多年的馬來亞史，就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馬來亞的資源進行貪婪榨取的經濟侵略史；把馬來亞變成了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國家，這同時，也就是馬來亞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的統治壓迫的民族運動史。

然而，西方學者所寫的馬來亞史，却是極力掩蓋這些血和淚、愛和憎分明的史實：抹煞我國人民的勞動精神和創造能力。他們硬說：對落後殖民地國家的「扶助」是白種人的「負擔」和「責任」，他們將西方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殖民地國家落後與貧困的結果，還說成是「人道主義」的目標。他們歌功頌德地製造所謂「西方國家把文明和文化帶到殖民地并開發殖民地」的神話。

他們甚至把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對殖民統治的極大憤懣和不斷的反抗、鬥爭的真相掩蓋掉，把殖民地人民描寫成一羣馴服的和滿於現狀的、對殖民主義者的高壓統治「感恩」不已的人民。讓我們引出下面兩段文字便可以看出他們厚顏無恥的嘴臉：

「他們（指殖民地人民）在現行的殖民地行政之下很是快樂。他們非常尊重英籍官員的效能和公正，并懷着極大的希望能在現政府之下獲得進步。他們主要的願望是在現時生活方式——殖民統治下的生活方式——之下不應有任何急劇的變更。他們確實害怕任何的改變可能會使情形更壞。」（見葛波德委員會報告書）

在同書的另一段文字又有這樣的胡說：

「這些民族——指殖民統治下的各民族——向我們（殖民地官僚）表示的意見是他們不要獨立而要依賴英國繼續給他們以幫助和指導，因為他們感覺到極需要這些幫助和指導。」

這是多麼「漂亮」的謊言！這種掩蓋歷史事實，歪曲歷史事實，顛倒是非，用謊言來蒙騙殖民地人民的做法，是殖民主義者及其御用學者所慣用的手法。另一方面，他們極力壓制言論自由，阻撓民族主義者、愛國人民對馬來亞史的整理編纂工作，不願馬來亞人民認識祖國歷史的真象，這就是馬來亞史的編纂工作面對的客觀困難。

殖民主義者的御用學者所杜撰的馬來亞史，極力灌輸上面所指出的那種奴才意識，企圖培養大批的對宗主國非常崇拜效忠的奴僕，藉此維持殖民地有效之統治。在奴化教育影響下的青年，受毒尤深，致使他們喪失了民族尊嚴和民族意識，成為對不合理現象完全麻木而絲毫沒有反對意志的人。這就是殖民主義者在歷史學方面對殖民地人民進行奴化教育的情形。

這些惡劣的情況，只要有些微愛國民族意識的人都不能容忍的，在今天，對祖國馬來亞的歷史進行科學的系統的事理，揭示歷史事實的本質，站在人民的立場來論述自己民族的奮鬥史，是一項義不容辭的迫切任務。儘管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會遭到許多人為的阻撓和困難，我們仍然要突破一切困難，堅持這項具有深刻意義的工作。

隨着我國人民反殖鬥爭的節節邁進，民族解放運動也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鬥爭中的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祖國的歷史，特別是要了解這一百四十多年來的民族運動的歷史進程；他們迫切要求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中，尋求行動的理論和制定鬥爭策略。當前的一切實際的政治鬥爭問題，只有聯系歷史才能作出正確的解答，判明鬥爭的方向，所以在目前，對歷史科學的研究，對本國歷史的科學研究是迫切需要的。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催促了覺悟了的愛國知識份子向歷史科學進軍，對祖國歷史開始點滴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對個別的歷史事件作了初步的總結，如魯貴先生著馬來亞的民主憲制運動，范京先生著作了馬來亞的歷史道路，李晚先生寫馬來亞史（原始社會到印度化時代），還有南大史地學會對有關馬來亞民族運動所作的編纂工作，都是良好的開端。儘管這些歷史編纂工作還處在開創與幼稚階段，所整理出來的歷史篇章儘管難免是粗略的，但這些工作肯定是必要的，我們應給予實際鼓勵和盡一切可能加以維護。我們也堅信，只要站在正確的立場，依循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我國的歷史科學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令人欣慰的成就的。

我們在此懇切希望所有愛好歷史科學并準備獻身歷史科學研究工作的朋友們，能對祖國歷史之整理和編纂問題，發抒各自寶貴意見，進行熱烈的討論，以便尋求出一個正確的努力方向，給馬來亞史的研究工作以實際的指導。

2. 歷史理論結合實踐之應用問題——歷史理論就是指歷史方法論，怎樣應用科學的歷史方法來處理我國的歷史問題，即歷史理論如何結合具體實踐之應用問題，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所深切關注的問題。

無論何種研究，除了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去研究外還必須依循正確的方法論，而後才能把握和理解其精神實質，而得出正確的結論。歷史方法論的任務，就是從千頭萬緒的矛盾複雜的歷史事實中，找出那貫通於他們之中的規律性，使一切歷史的事實，都從這種規律性中，得到具體的正確的說明。這樣，任何交錯複雜的歷史事實，在我們面前，就不再是混亂一團，而是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所表現出來的應有的現象。因此，我們也就可以認識任何具體歷史事實，「怎麼樣」發生、發展，而且也可知道他「為甚麼」要發生和發展。

我們認為：只有用新的科學歷史觀的方法來研究我國具體的歷史，才是唯一正確的方法。

然而，過去和現在的情況都是錯誤的唯心史觀一直都深刻的影響着我們歷史科學的探討。在我國歷史科學的領域中，對一切錯誤見解和方法進行不調和的批判，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排擠出去，徹底掃除反動的史觀與史法，給科學的歷史研究工作鋪平道路，是歷史理論的任務。

近年來，已有不少的年青朋友在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我國的個別歷史事件，這是可喜的現象。但由於對科學歷史觀理解得還不够透澈，科學的方法掌握不够好，在處理個別歷史事件并嘗試給予解釋時，顯得有點公式化和一般概念的敘述，有時甚至將具體的歷史事實不顧及其條件之不同，硬套入歷史的一般法則中。這些都是有待糾正的缺點。

為了糾正上述的一些錯誤的處理方法，為了引導歷史研究工作的正常開展，并編作出一部正確的馬來亞通史，或幾個分期史，作為歷史研究指導的歷史理論之探討，已經成為目前確切的需要。歷史理論探討工作的開展，是促進我國歷史科學研究向前發展的必要的工作，是建立我國歷史完整的體系的輔導工作，讓我們以嚴肅

包工制度在建築業

· 陳 彬 ·

前 言

有着不同立場、觀點的人，就說着不同的話。因此，觀察任何事物或對任何問題的看法，都必然帶着自己的立場。什麼是我們取決的標準呢？意思就是什麼才是對的呢？很明顯的這必須是以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做爲衡量了！

如果大家都宣稱是站在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一道可將如何了呢？這就要看看怎樣行？行得怎樣了？我們知道，那些爲少數人服務的人也會高喊爲廣大人民羣衆服務，那就更加要看他們怎樣行，行得怎樣了？就以對包工制度的看法來說：有的人贊成包工制度應存在，因爲它對國家經濟繁榮有利。有的人主張應該廢除，因爲它是殖民地經濟的衣冠，留不得，對廣大人民羣衆有害。有的人不表示贊成也不表示反對，因爲他們在靜觀事態，反正權力掌握在他們手上，要龍就龍，要虎就虎。諸如此種種，我們應該怎樣來了解又怎樣來批判呢？有一個極現實的例子是值得引証的。當局不是曾經設立了一個調查包工制度委員會，提出了一份相當正確的報告書？它的確對廣大勞動羣衆有利，可是，當政者却把它束之高閣，並不立法將它實行，因爲他知道如果一旦實行，少數人就吃虧了。這已經充份地說明了，誰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誰是真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

我們的批判觀點應該是以前面所說的觀點爲根據。

單就以建築業的包工制情形，就大體可以觀其包工制的全貌了。原因是建築行業的包工制是極其普遍及複雜。我試圖從一般到具體來說明這個問題。

包工制度的產生及其發展

要知道包工制度的發展情況，那麼，首先就必須探討產生包工制度的經濟基礎，以及它在怎樣的環境中被加以推廣，以至成爲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社會不可少的制度。

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私有制做爲基礎的，一切的經濟

行爲都被鼓勵爲自由競爭，以便發展大壟斷寡頭組織，它容許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行爲存在，並鼓勵這種行爲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社會階層經濟能力懸殊，因而掌握政權者就必然要依靠少數壟斷寡頭，這樣使廣大的勞苦階級與資產階級產生了深刻的矛盾，并日益尖銳化下去。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特質是自由競爭和發展大壟斷獨佔，因而只要被認爲能夠導致致富，一切的手段將被採用，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個大對壘：一個是無產階級，一個是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在被剝削被壓迫的情況下，加緊組織與團結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工人運動并展開維護本階級的利益鬥爭；那麼，在資產階級方面也必然要應付這種工人運動日益強大的局面，除了憑藉政權合法來束縛及鎮壓外，他必然還要更加設法採取各種壓迫與剝削工人的手段或方式，分化工人之團結及組織，加緊控制工人之可行的辦法將必被採用。包工制度之被利用正是爲了應付強大的工人階級團結的壓力，并以此來緩和工人與資本家對立的局面。它有三個顯著的作用：一個是改變工人對資本家的對立局面，也即改變鬥爭對象；一個是加緊控制工人和分化工人的團結；一個是準備利用包工制的作用來加緊壓迫和剝削工人，準備有利的剝削條件，這三個作用都已經在工廠、工場被充份利用了。

第一個作用是改變工人與資本家的尖銳對立關係的問題。工人運動的產生及發展壯大，它必然會與資本家展開鬥爭，要求改變生活待遇。一旦資本家利用政權與工人敵對，則工人將要求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要求改變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因而執政的資產階級或任何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各類型的資本家必然要應付這兩種局面。尤其是改善生活待遇及工作條件的要求，如果有了包工制的存在，一切歸給包工頭，包工頭就承擔了一切，資本家可以在後座好像操縱司機一樣，看風轉舵隨機應變，緩和了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而且還有妙用：一旦包工頭與工人關係吃緊時，資本家還可以充當好人，無形中模糊了工人的視線，緩和了階級與階級對立的關係。因此，往往在工廠或工場的工人在包工制度的

認真的態度來對待歷史理論之探討并積極地開展我們的研究工作吧！

結 語

歷史既是一門能實際應用的科學，讓我們樹立明確的研究歷史的目的，掌握科學的歷史方法，爲實踐歷史科學的任務而努力。

最後讓我引著名史學家呂振羽先生的一段文字來結束本文：

「歷史研究的任務，在究明歷史自身的運動和發展過程的規律性，把握其現實的動向，以及構成歷史動力的諸契機與其主導從屬的關係，去指導人類社會生活之現實奮鬥的方向，提高對歷史創造的作用——加強指導原則和實踐動力；同時，適應現實的要求，科學地批判地繼承過去人類文化的優良成果——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的承襲，世界文化的優良成果的吸取。所以歷史是科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是人類生活奮鬥的武器。」

27—12—62

風行下，難以改善待遇，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同時，一些包工頭由於面對廣大的工人，因此，他就必然要設法同不良勢力結伴以期對付工人，工人往往在包工頭的政治勢力與黑社會勢力的壓迫下，致使鬥爭失敗，這也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第二個作用是加緊控制與分化工人的問題。資本家把生產工作及營業工作及勞工管理一概交給包工頭處理，因此包工頭必須滿足資本家的慾望，首先是如何把勞工管理好，不要使工人輕舉妄動，尤其是改善待遇，因此，包工頭必然要採取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控制工人，使資本家也就能夠間接通過這方面來控制工人。不但如此，包工頭尚且可以利用它分化工人的團結。由於包工頭長久與工人在一起，他對工人的內部情況較為了解，很容易在包工頭的親信的活動下，工人中分幫分派，使工人形成各種集團，以期分散了工人的團結。許多的事實可以說明包工制度是資本家利用以控制工人及分化工人團結的一種必要制度。

第三個作用是利用包工制的作用來加緊壓迫與剝削工人。已經指出過，資本家把生產管理及完成權力交給包工頭，那麼，包工頭必須盡責去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有加強勞動強度，增加生產，或者增加工作時速，或者減少工資等等事件發生。而在自由競爭下，受犧牲的是工人，勞動待遇必然日趨低微。在這種包工制度下，壓迫與剝削必然加劇，資本家可以有一定的固定利潤收入，致富的機會就愈多。

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包工制是一種剝削的手段，是為資本家增加利潤收入而服務的方式。

那麼，在殖民地社會里包工制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孿生兄弟，很明顯的，包工制必定在殖民地社會里盛行，而且是更複雜和畸形的發展了。

殖民地宗主國為了掠奪殖民地更多的原料，增加更多的利潤收入，除了掌握政權外，整個殖民經濟完全操縱在壟斷資本家手里。因此，它必然要加劇壓迫與剝削勞工，因而形成了廣大勞動階級與殖民地宗主國勢不相互，勞動階級的反抗也會日益強大起來；另一方面壟斷資本家又要增加原料的長期掠奪及增加利潤的收入，因而如何控制工人就成為他們日思夜想的重要課題了。在這種情況下，包工制度必然被普遍利用，一方面成為資本家的盾牌，一方面成為分化工人團結的刀劍。它隨着殖民地經濟的畸形發展而複雜化起來，成為了殖民地社會資本家剝削工人不可少的剝削手段！

在半殖民地社會里的本邦，包工制是被普遍的利用，幾乎各行業里都有包工制度的存在。它無孔不入，被利用來迴避工人及工會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及增加工資的擋箭牌。它被利用來迴避執行勞工法令及增加工人的福利，諸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給予公共假期、年假及病假、年俸及養老金、繳付公積金等等；它被利用來破壞工人的合法合理的鬥爭。根據了解，本邦許多工會都面對包工制問題。這的確是本邦在經濟發展上的一個嚴重問題。當行動黨政府上台時，曾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來

調查包工制度存在各行業的情況。當時各團體紛紛提出意見，就可知一般了。更何況當時政府高喊給予重視，就更加引人注目。可惜的是當調查委員會擬成了報告書呈給政府，結果石沉大海，杳無音訊，不免使人感慨萬千。人們當還憶記當年林有福及殖民地政府也慣於採用種種花言巧語來欺騙百姓。憶往昔，察當今，當政者之流又何異呢？

本邦的包工制的發展非常複雜及畸形；各行業有各行業的包工制的特點，剝削及壓迫工人的方法千變萬化，但我們在這里可概括地歸為下列幾種形式：

第一種是平分制的包工制。在這種形式下，包工頭可以不必工作而領得一定的工資，且可以獲得各項工作收入的若干巴仙。

第二種是日薪制的包工制。這種形式是由包工直接僱請工人，從中漁利。

第三種是件工制的包工制，這種形式是以計件算工制。包工頭從資本家方面承包了工作過來後，以件工計薪給工友，比如包工頭以每件六角承包了某項工作，再轉給工友做時，只付三角，這一來，包工頭就淨賺了三角。

第四種是層層的包工制。這種形式是建築業中最普遍的。比如建築商把工程承包給二手包工頭，再給三手包工頭，再給四手包工頭，形成一層剝削一層，一層壓迫一層。如建築工程總數是二十萬元，二手包工頭承包來做時是八萬元，再給三手包工頭承包時，是七萬元，到了四手包工頭時，只剩下三幾萬而已。所以其中所經的好幾手的包工頭是可以穩賺的。

第五種是集體包工制。這種形式往往是許多人合股承包工作，除了自己領取工資外，有賺時就平分，這是一種，另一種是抽巴仙。

第六種是承標制的包工制。這種形式是以最低價格競爭某項工程，承包者再設法剝削工人，從中獲益。

這幾種可說是包工制度下最普遍的類型。由此可見，包工制度盤踞在各行業裏是多麼的牢固，它處處影響着本邦的經濟發展，是不得不引起廣泛注意的。

建築業的發展與包工制情況

本邦的建築業歷年來都沒有過真正穩定的時期，有旺盛繁榮時期，也有萎縮不振時期，這和本邦經濟的不穩定息息相關。最近一二年來，本邦政府專心致力於大興土木，美化市容，本邦的面貌好像為之一新。根據報導，一些政治圈內人士說：政府如果是真心建屋給人民住，這是好事；可是往往它的目的並不是如此。興建住屋單位在近一二年相當多，從中也可以取得了一批可觀的收入，另一方面政府是存有政治作用，有人說為什麼在興建住屋時，却把那兒長期定居的鄉民趕到很遠的地方去，難於謀生，因此，內中定有問題存在。

我們試就這些意見的反映加以剖析，讓我們來引証歷年來的建屋數字：

| 年份 | 私人建屋業 | 信託局 | 其他公共事業 | 總共 |
|------|-------|------|--------|------|
| 1952 | 1486 | 1886 | 690 | 4062 |
| 1953 | 2054 | 2041 | 851 | 4946 |
| 1954 | 2161 | 1872 | 954 | 4917 |
| 1955 | 3202 | 2795 | 737 | 6734 |
| 1956 | 2000 | 1275 | 1091 | 4365 |
| 1957 | 1851 | 1300 | 218 | 3369 |
| 1958 | 1833 | 3841 | 352 | 6026 |
| 1959 | 1604 | 1821 | 242 | 3667 |

到了一九六〇年建築業幾乎停頓了，大批勞工失業了，這是相當嚴重的情況。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情況又告好轉了。引証了以上的數字，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九五八年本邦政治氣氛緊張，林有福政權反動，爲了挽救其垂危的命運，便大興土木，企圖討好人民，因而在建築業方面呈現了興旺的現象。但這一來，又造成國庫空虛，財政周轉不來，政治局勢又起變化，乃有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間建築業停滯，致使建築工人及建築商唉聲嘆氣；看看如今，政府的建屋業數字也是根據在其執政期間逐年增加的，到一九六四年又是大事興建土木，以期作爲政治資本，目前的政權愈來愈反動，所以許多人在預測建築業到底能繁榮多久呢？會不會在這個政府有朝一日倒台後又要面對建築業的危機呢？這樣的疑問也是不無道理的。

很明顯地，建築業的繁榮時期，實際上正是各行業潛伏着危機的時期，也是說明本邦經濟的畸形發展及不穩定的不可辯駁的事實。

如果說建築業繁榮了，從表面上看，是一時的好現象，雖然建築工人不會再愁失業了，可是建築工人的生活至今並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這確實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可是又可以給大家去研究建築業的實在狀況了。

所以，建築業爲什麼會出現旺盛繁榮時期和萎縮不振時期，如此地此起彼伏，波浪翻滾的狀態。雖然尚有其他許多原因，但是，前面所指出的應該是個大因素，它牽制着其他小因素，致使建築業發展經常呈現不穩定性。

建築業的發展是與包工制度密切相關的。有人主張建築業的發展是不能脫離包工制度，否則就不易發展。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應該承認，包工制之存在於建築業已相當久了，長久以來，它一直在演變着，以致變成了很複雜及不斷向畸形方面發展。

我們懂得，在所謂自由競爭下，各建築商在承標工程時都在進行着激烈的競爭，因而拚命壓低標價，以期獲得承包某項工程。而且爲了賺取更多的收入來積累雄厚的資本，以便進行更激烈的競爭，這一來勢必要將建築工程的成本減低，建築的質地方面也就變了樣，這是建築業方面極其平常的現象，所以人家說：「一頭出，必要有幾頭進」才可以的，這說明了建築業承標競爭後的結果。

當建築商承標了工程後，他必要考慮到各方面。俗語說：「虧本生意沒人做」。必須計算到材料方面，勞工工資方面都可以賺到一定的數目。當然先得看看市面的

勞工行情，如果一座住屋所需的勞工費用（不計其建築材料）需要二萬元，但市面行情是二手包工可以一萬八千元承包，那麼，這工程就會交給二手包工頭，如果有好幾個二手包工頭互相搶包，其中有的開價低至一萬六千元，則他就標到了這項工程。

在建築行業里要做一個包工頭不是一件難的事情，只要有熟練或者半熟練的技術就可以包工了。固然，要做二手包工或全盤包工必須要有一定的建築工程知識及經驗，能有一定的把握，可是現在全盤承包的情形比較少了，主要部份（如木部、鐵部、泥水部及打樁部）給二手包工承包。因此，只要具有以上各別部門的知識及經驗，并取得建築商的信託，就可以承包某些建築事項。所以在建築業里，包工頭的數目相當可觀。「人人可以包工，人人有機會包工」這是實在的情況。

一項工程給二手包工承包後，二手包工頭又估計好了各部門應賺的利潤數額。比如整座工程需要二十萬元（不包料），各部門如木工部工資須五萬元，扎鐵部工資須五萬元，泥水部工資須五萬元，其他工資五萬元，可是二手包工頭必定先估計好各部門各須若干工資後才再承包出去。比如它估計出木工只須三萬五千元；扎鐵部工資只須三萬元，泥水部工資只須四萬元，以這樣的數目做爲基本的價格後，在二手包工頭的搶包下，承標價格被壓低了，最後工程便交給出價最低者。當然吃虧的是工人。因此，「層層包工，層層剝削」。這是建築業里包工制度的特點。

情況是很明顯的，各部門工程交給三手包工或四手包工手里，價格一定是很低的，那當然只有從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今天建築工人生活痛苦萬分，無法改善，以及建築工場所出現的各種不合理現象，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即在此。

在建築業里，由於層層包工，層層剝削，激烈的競爭，承標價格不斷壓低，這種情況下，又出現了變相包工，俗語叫「硬腳跟」，也叫做集體包工（人數沒有限定）。用腳跟硬硬來頂，其中味道如何，大家可想而知。

這種互相競爭的現象，歷年來都如此，不論建築業興旺也好，萎縮也好，競爭每年都在進行，並且日益激烈。雖說在建築業繁榮時期，工程多了，照理競爭應較和緩，實際上則并不如此，只是較諸萎縮時期的殘酷競爭較不激烈而已。

在建築業繁榮時期，由於互相競爭的結果，承標價格一旦減低了，就很難回升。一方面是建築商不斷互相競爭，包工頭之間互相競爭，以致在繁榮期間，一般上只能維持穩定的價格而已，在萎縮時期，價格就會很快地降低了。大家都要搶包工作，工程又少，競爭就激烈非常，唯一辦法就是盡量壓低價格。所以搞建築行業的人都大大嘆息着今不如昔了。的確，建築方面的價格是逐年降低了。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前，一方丈的壁是五，六元，可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一方丈的壁才得四，五元左右，到了一九六一年建築業繁榮了，價格還是大體上照舊維持。他們認爲，既然過去減低價格還是可以完成工程，現在也應可以完成才是。

在這種互相競爭，搶標工程，層層包工，層層剝削

的情況下，價格是一定低廉了。建築商要營利，包工頭又要營利，就出現了偷工減料及貪污現象。建築商減料，包工偷工，稽查員貪污，因而造成了建築物質地不堅固、粗糙。過去信託局的一些屋子真的像紙糊的一樣，住屋設備及空氣都很差，另一方面經常發生設備倒塌，以致發生了工人白白掉了生命的慘劇。

實際情況顯示了建築業的價格是逐年下降的，它并不因繁榮期到來而提高價格，所以這種自由競爭，互相搶包的現象，及層層包工，層層剝削不消除，工人生活就無從改善；但可悲的是，這些現象却正是目前的半殖民地經濟結構的必然產物。

批判包工制度的論據

闡述了包工制度在建築業里的情況後，那麼，這個制度是否對建築業發展及勞動者確實有利呢？本邦一些與建築業有關的團體及人士都曾經發表了他們的見解。

認為包工制度應該保留的論據是這樣的：

(一) 在建築業里聘請工人時，建築商不內行，不懂得那些工人適合那一部門的技術崗位而包工者則是一班具有積年累月的豐富知識的幹練行家，他們經常擁有一羣自己深為賞識而精於某項特殊工程的熟練幹練的在行工人。

(二) 包工者在建築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估計全部工程工作價值，可以節省大家之時間與費用。

(三) 工友工資直接由包工頭付給，工友之有關問題皆由包工頭負責，包工與工友能保持互相信賴及信心；而且在包工制度下之工友之工資往往比普通工廠工友之工資來得高。

(四) 由於包工制度的存在，包工頭經常有一個以上之工作，可以供給工友工作，以致不必繳付公積金等。

(五) 只有通過包工并由包工自由聘請其所需之工人，否則建築業將呈現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

(六) 這項制度是長期以來都存在的，而且經過了實驗，證明是一項好的制度。

主張應該廢除包工制度的人士論據是這樣的。

(一) 包工制度是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的產物，是一項剝削制度，它妨礙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無形中影響了工人建設國家的熱情。這種制度不可能帶來經濟繁榮而是帶來少數人的利益而已。對於建築業來說，是阻礙了它的發展，這就對廣大人民不利。

(二) 包工制對於工人的組織與團結有極大的妨害。他們指出，資本家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發展更雄厚的資本，必然會不顧工人的死活，加緊壓迫與剝削工人，使到廣大工人陷於水深火熱中，迫使工人更趨於貧困，必然引起工人的不滿，迫使工人要團結與組織起來。現實教育了他們，只有依靠工人自身的團結與組織，才能發揮強大的鬥爭力量，從而迫使資本家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

可是，作為資本家盾牌的包工制是對工人的組織與團結極為不利的。包工制的存在使包工頭成為執行這種

剝削制度的工具，他們替資本家想盡辦法來控制工人，從威迫利誘乃至感情作用控制工友，以失業嚇工友；包工頭利用這些手段是想對付工友，以「下馬威」來阻止工友的團結與組織，造成工友在心理上怕被開除或被對付，不敢參加工會，以致被長期奴役；通常被包工頭僱用的工友多數是互相認識的或有親戚關係或同住在一個甘榜（鄉村）里，有些是互相依靠，「我有包工時，你來做；你有包工時，我去做」。因此，在表面上，都以感情作祟，對於任何壓迫與剝削的現象只好忍氣吞聲，任由宰割，不敢反抗，逐漸消失了工人的鬥志。

在多層包工制度下的建築業，一個大工場里就有許許多多包工頭，各部門又有分包工頭，層層包工又各自僱請工人。這樣，在工友中形成了許多派系，各派系間互不往來。而且在工場里，如果包工頭是個福建人，他請的工人也是福建人，如果工頭是客人，工友也是客人。這種分幫分派的現象在以前是極普遍的，現在這種現象是漸漸減少了。這種分幫分派造成了工友間的隔閡，在工作中不和乃至衝突，隨時都會因他人挑剔而鬧糾紛，工友的團結大受影響。尤其是在與資本家進行鬥爭時，更易因幫派而為資本家所趁而削弱了鬥爭力量。

(三) 包工制度危害工友的生活利益。在近幾年來，由於世界性周期經濟危機，經常影響星馬，以至市面發生不景氣。殖民地宗主國大事掠奪下，本邦財富不斷落到外人手上，加上一路來反動政權的腐化無能，造成國庫空虛，人民生活乃日益貧困，工廠倒閉，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化，工人走投無路時只好湧進建築業方面來謀生，這又使建築工人數目不斷增大，也使建築工人的工作更加不穩定。廣大建築工人既然處在半失業狀態下，當然談不上有合理的工作條件及待遇了。

在這種情況下，加以建築商互相競爭，互相搶標工程，於是各自提出自認為最低的價格來承標。可是這種下標的數目往往只足以平衡正常定工所需的費用，至多也不過超過一點。他們（包工頭）既然要賺錢累積資本，就必然要採取不正常的剝削方法。上述層層包工層層剝削的現象乃告出現。由全盤承包轉到二手包工頭，再轉到三手，四手以至最後到「硬腳跟」時，工頭必須自參加工作才能取得一些工資，甚至有時還要做拿不到工資的工呢！「硬腳跟」的工友的收入更不用說了。

這樣一來，影響工友的生活是非常大的，產生了對工人的各種不利情況：

(甲) 由於層層的包工，層層的剝削，包工頭以低價承包了工程後只好向工人打主意，無理拖延工作時間，使工友每天都要做九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等到天昏地暗才摸黑回家。同時，還由於工作中包工頭拚命加強工友的勞動強度，因而更使工友操勞過度，損壞了健康。

在一個工場裏經常有許多包工頭，你拖，他拖，我也拖，大家都拖，結果愈拖工友的工作時間愈長。在建築業萎縮不振時，這種情況更是可怕。

實際情況告訴我們，建築商通過包工頭迴避實施勞工法令，不實行八小時制，這種情況下，建築商必將責任推給包工頭，包工頭又推給分包工頭，再推回給建築

商，推來推去，「勞工法令」對工友的「保障」也就成了泡影。

(乙)包工頭拖欠工友工錢而逃跑的事件層出不窮。往往當工程開始時工作較多而進度較慢。而建築商却以工程完成的程度來計算工資，付給包工頭。有時由於工程進行太慢或受阻，就很難悉數付清工友的工資，有時包工頭自己先把錢花了，還不清工資，這一來，每期都要拖欠工友的工資，因為包工頭經常藉口建築商給不夠錢，只好拖欠工友，這樣，工友被拖欠的數目越積越大，如果遇到工頭不負責任，這樣白白地拿不到分文。這種情況不論在建築業繁榮時是這樣，在萎縮不振時，也是這樣。

如果呈報到勞工法庭，等到開庭審判，時間就不知拉了多久，有時由於沒有工牌，口供不大對，工友可就要喝西北風了！如果在這時包工頭將責任推給建築商，建築商推給包工頭，日子就要拖得更久。雖然勞工法令里頭有規定，一旦法庭宣判必須清還工友工資時，建築商或包工頭須在判決後十四天內照辦。但事實上，包工頭或建築商往往故意推三推四不肯照辦。

非但如此，由於包工頭之間的互相競爭，搶標工程，不負責的包工亂包工程，一旦在工作中沒法賺錢或支付工錢時，他就專等在工作中糧期到來時，一起將工友的工資捲逃去。按勞工法令規定，如超過了六十天則包工頭必須負責一切，但是如果包工頭逃了無法找到，案件就無法審理了。這個法律上的漏洞正是包工頭的安全保障。

有些工程是建築商與包工頭協定必須在完成了某階段工程後才發工資，完成某段工程起碼需幾個月時間，這樣工友工資也就要等了好幾個月才能得到，如果超過了十天，建築商就不必負責，往往因包工頭不還而被吞吃掉了。

(丙)包工頭可以隨意割減工資、隨時開除工友致使工友工作完全沒有保障，由於在建築業里工友工資是沒有一定的標準，這叫做「看工打價」，包工頭往往根據自己的認為打工資；包工頭往往藉口承包工價低廉，任意割減工資，如果工友在工作中沒有好好地替包工頭拚命地做，即使是一個技術熟練的工人也得不到大工工資；我們經常聽到所謂「老師父賺沒吃」，原因是包工頭要手脚快工作賣力，又不必怎樣講究技術的中工，無形中工友工資就不斷壓低下來。

另一方面包工頭也操縱了工友的飯碗，如果包工頭對工友有不滿意時，斯文點就是把工資打得低低，或者說聲沒有「着路」，工友就得自動收拾工具回老家了，粗野的包工頭就會馬上把工友開除掉，所以說工友工作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丁)由於競爭激烈，標價低廉，建築工場設備簡陋，建築商偷工減料，同時命令工友在危險中工作，致經常發生意外與死亡事件，因此，使工友生命沒有保障。而且在領取保險時也發生種種問題，建築商推給包工頭，包工頭推給建築商，往往不能領到勞工賠償，比如姜成工友及胡金工友都是這樣的情況。建築業的意外事件及死亡，除了在勞工部勞工撫恤處登記外，尚有許

多沒有呈報的，這是非常可怕的數目，由此可見，建築業里工人的生命是多麼沒有保障。

(戊)建築商利用了包工頭迴避了給予工友享有公共假期，年假，病假以及繳付公積金等等，同時在工作中遇下雨時還要扣點鐘，這影响了工友的生活福利。

收集了兩種包工制的看法後，我們不免可以看出要批判一個制度的好與壞，如果是以私利及營利的觀點去評價，結果必淪為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如果只是單從技術上去看，就未免太過可笑了！所以前一種的看法，實在是值得商榷的。

實際上只是為了容易聘請工人及安插工友到熟練的工作崗位上，實不一定要層層包工，只要建築商把這些技術熟練及經驗豐富的家聘為管理員或督工，豈不是可以在技術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包工頭是的確有能力去完成建築工程的，但是如果只單單以為只是包工頭才能完成，或者才能節省時間及費用，如果是這樣，建築商必須只連起碼的建築工程的知識都沒有了，又有何能力去承標工程呢？實際上，建築商自己皆擁有繪測師及書記，他們都有可能計算工程完成的時間及費用。如果說沒有經驗，則也不一定需要層層的包工吧！如果把這些包工僱為管理員，或督工，那麼，這些人豈不是今後更有機會學到更豐富的建築工程知識及經驗了嗎？所以這些技術問題只要有了合理的，技術的改進將完全不成問題了！

至於包工經常能夠承包上幾個以上的工作，供工友工作，這樣就可以迴避法令的約束，那麼，政府的法令就變成廢紙了。何況包工頭實際上很少有可能承包一個以上的工程，否則又為什麼建築工人是半失業及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另一方面，若說建築工人的工資是比其他工廠來得高，豈不忽視了工友被延長工作時間，沒有享有公共假期，年假及病假花紅等以及工作的粗重嗎？這是不合理的說法。試比較說明之：

| 工廠工人 | 建築工人 |
|--------------|--------------|
| 平均每日工資\$5.00 | 平均每日工資\$7.00 |
| 每日工作 8小時 | 每日工作 9小時 |
| 每月工作 26日 | 每月平均工作 20日 |
| 享有公共假期 11日 | |
| 享有年假 7日 | |
| 享有病假實得 11日 | |

如果以每日九小時為標準，則工廠工人每月收入\$155，而建築工人約\$124。所以說工友工資高的論據是不能成立的。

探討了建築業包工制的利弊後，認為包工制是一種不好的制度，及應該加以廢除而所提出的論據是完全可以立住腳的，因為它有許多事實足以說明這個制度的不好，另外一方面，過去政府設立了一個調查包工制委員會，也曾經進行了各行業的調查，却一致同意基本上應該廢除包工制，因為它認為要合理改進建築業，也必須重視建築工人的生活情況，他們發出了許多事實證明這個制度是不好的。

我國民族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特徵

— 小 川 —

我國民族問題存在着許多特殊而又複雜的情況，一向來都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特別是到了聯合邦取得政治上獨立和星加坡取得部分自治以後，即在我國各民族的外來壓迫者英殖民主義者進行政治上撤退而將政權交給國內各民族的上層右派份子以後，即在以馬來封建貴族為首、同時聯合華印兩族的大資產階級結合而成的聯盟政權以「自己民族的政府」的地位出面統治國內各民族以後，同時還在人為的製造下，民族問題在國內被尖銳地提了出來。殖民主義者，反動派和狹隘種族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不斷製造緊張宣揚歪論，在民族情緒上煽風點火，而一些心地善良的愛國者不斷針對有關我國的民族問題，有關如何正確處理我國的民族問題，有關如何搞好我國各民族間的團結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同時還介紹了一些有關民族和民族運動的問題的理論。其中有一些朋友，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往往在一些概念上和某些重要問題上，弄糊塗了或者混淆不清，甚至有一些還修改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的某些重要原則來「適應」我國民族問題的情況，至於對我國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和具體的特徵，還少有人在這方面作較完整的探討。

本文就是想同大家談談關於我國的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具體的特徵。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希望大家能在這方面熱烈提供更寶貴的意見；對於本文可能存在的一些缺點或錯誤，也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我國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具體的特徵

要探討我國的民族問題和正確處理我國的民族問題，首先就必須研究我國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和具體的特徵。只有研究了我國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和具體的特徵，研究了我國的現實，才能正確認識和了解我國的民族問題并從而得出正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實際辦法。有些人不是這樣，他們不想也不願意認真研究馬來亞的實際情況，就企圖來論述馬來亞的民族問題，其結果不是把非主要的東西拿出來當主要的東西談，就是對不存在的問題大叫大嚷而對重要的問題却只一筆帶過甚至隻字不提；也會因此作出許多不切合實際的比喻，把星馬的華族比作在巴勒斯坦處於阿拉伯世界中的以色列，把印尼

華族的處境來同我國的華族相比。把中國過去為了清除漢族腦子里存在的大漢沙文主義思想而提出的「反對大漢沙文主義」的口號，硬搬硬套地拿來對付我國的華族。當然，要他們提出正確處理我國民族問題的辦法，那是更不用說了。

那麼，我國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具體的特殊情況是什麼呢？依我們的淺見，可以歸為如下幾點：

第一，我國幾百年來一直都處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下。從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入侵，十七世紀荷蘭人對葡萄牙人的取代，和接着英國人侵入和逐漸霸佔了整個半島和星加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法西斯的鐵蹄又蹂躪了祖國三年八個月，直至戰後英殖民主義者又以武力重新佔領我國，這樣，我國近幾百年來一直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這就是說，幾百年來馬來亞國內各民族人民一直就是受各帝國主義國家所統治和壓迫的民族。這些外來的統治民族——殖民主義者佔我國人口的不到一巴仙，而廣大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國內各民族人民却佔全國人口的九十九巴仙以上。這一路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外來的統治民族——殖民主義者和被統治被壓迫的馬來亞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矛盾。這矛盾決定了我國的社會性質，也決定了我國的社會發展及其方向。這矛盾同時也決定和影響了我國各種社會問題。這矛盾也正是我國民族問題的主要矛盾，而且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造成了我國三大民族必須團結起來，一致對抗外來的統治民族——殖民主義者，否則就不能得到自己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如果某一個別民族企圖通過依靠自己民族的單獨努力而取得自己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將不可能得到成功。因我國各民族遭受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這一事實，決定國內各民族要取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須團結一致對抗共同的壓迫者——殖民主義者。

第二，我國國內各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是佔人口的絕對多數。我國人口是由馬、華、印三大民族和少數其他民族以及一些土著所構成。其中馬來民族和華族的人數幾乎相等。根據聯合邦一九五七年人口調查報告：聯合邦總人口為六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一十五人，馬來人佔三百零四萬八千八百九十九人，華人佔二百三十六萬

從以上各個方面的探討中，我們卻一樣得出這樣的結論。

結 語

在建築行業裏，一些實際的情況必須是給予照顧，這是誰也沒有反對的。首先是層層包工，層層剝削問題及更有利與更好地使建築業繁榮，其次是失業的問題以及

建築工人的生活待遇問題，同時如何改變建築工人的命運問題。以上所剖析的情況却跟包工制有着密切的關係，首先就必須廢除多層包工，解除層層剝削，層層壓迫的現象，並且逐步改進工人的生活待遇及工作條件，以加強工人的組織，發展工人的力量。如果要完全根絕包工制度，那麼就必須首先消滅殖民地體系的經濟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這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

六千六百五十六人，印人佔七十四萬零四百三十六人，其他佔九萬五千六百五十八人。又據星加坡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戶口調查：星加坡總人口為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餘人，華人佔一百一十四萬一千八百人，馬來人佔二十萬七千三百人，印人佔十二萬九千五百人，其他佔三萬六千三百人。從這個人口數字上可看出華人和馬來人是佔最多數。假如兩地合計，華人的便佔三百五十八萬八千四百五十六人，馬來人則佔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九人。

第三，構成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馬、華、印三大民族無論是在人種上、在語言上、或者是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心理素質、民族性格各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這就造成了各民族交往不易，接觸困難的問題，因此產生了一定的隔閡和不相瞭解，並且在各民族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民族自大心理和民族猜疑的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這就妨礙了民族團結。因此，學習國語，掌握傳達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工具，以便克服接觸上的困難，消除存在着的隔閡，猜疑和不了解，克服民族自大心理和狹隘民族主義意識，促進和加強各民族間的友好團結，在我國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第四，我國國內各民族人民都是混合雜居的。無論是北馬的城市和市鎮，或者是南馬的城市和市鎮，我們到處都可見到馬、華、印各族人民和睦相處，混合雜居，我國的情況不同于別的一些國家，在那些國家里，民族居住地域可以顯著劃分，例如在中國、漢族居住在中原及沿海一帶，藏族居住在西藏，蒙族則在內蒙一帶，在我國根本不可能劃分那一民族居住在那一區域。我們只能說某一州或某一地或某一民族比較多，但却不能絕然劃分出民族的居住地域，這一特點決定了「民族自治區」或「民族自治州」等處理民族問題的方法，在我國是行不通的。

第五，我國社會階級的劃分和民族的分佈有這樣的特殊情況：即馬來人多數是農民和漁民，華人多數是城市中、小資產階級和各行業工人，印人也多數是大園坵工人和小商人；因此，馬來人多數是居住在甘榜地區、而華人和印人則多數是居住在城市和城市附近的新村或園坵里。這也就是說，在我國，華人和印人所處的社會生產關係是屬於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馬來人所處的社會生產關係則是屬於封建主義的自然經濟的生產關係。因此，造成了華人和印人的政治覺悟性較高，對新事物的感覺較靈敏，而且團結性和鬥爭性也較強，而馬來人的政治覺悟則是比較低，對新事物的感覺也較遲鈍，並且也是比較散漫，落後。而且在馬來民族方面的封建勢力，封建關係和體系也比較堅固地保存着（雖然這一點同外來殖民統治者對它的保護和培育是分不開的）；而在華、印族方面，這種封建勢力和關係則受到比較大的削弱和破壞。

表現在經濟生活上則是華人和印人一般的生活水平比馬來農民和漁民高，這就是說，一般上，多數華人和印人生活雖然窮苦，但是馬來農民和漁民的生活則更悲慘。

表現在剝削關係上，華族工人和印族工人是直接的

受到歐人大園坵主、工廠主、商行主和華族或印族園主、工廠主和商店老闆的剝削；而馬來農民除了受到馬來封建貴族地主的剝削外，又受到華族和印族小商人和中間人的直接剝削，馬來漁民也同樣受到華族和印族小商人和中間人的直接剝削。由於各民族關係存在着這些特點，因而使到殖民主義者有機可乘，極盡其挑撥離間的能事，破壞我國各族人民底團結。這些特點，也使到一些人產生錯覺。有的說，華族和印族是靠剝削馬來族而過得比較好。（不過，說這種話的人，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別有居心者所發出作為煽動民族情緒的論調，另一種則是看不清事實的人的錯覺。）有的人又說馬來民族生來就是落後和難覺悟。講這種話的人看不到馬來民族所處的階級關係，和不以階級觀點去看待問題，因而也產生這種錯覺。

第六，我國的文明民族，也就是佔我國人口絕大部份的馬、華、印三大民族，都是外來移民。其中，馬來民族是移居馬來亞最久，而且人數也是較多，對我國社會影響最深的一個民族。馬來語也被大家接受為我國國語。華族和印族大規模移入馬來亞則是比較後期，即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事；而且在移入的初期，他們同中國和印度還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聯繫，在思想上還不能擺脫思戀中國和印度，還把中國和印度當為他們的祖國和故鄉，同時，將自己視為僑民。這就是說，由於歷史的關係，在他們腦子里認馬來亞為永久家鄉和祖國的國家觀念還很薄弱。再加上殖民統治當局不鼓勵建立馬來亞國家意識的政策，更使到國家觀念難於建立起來。華族和印族大多數人民的馬來亞國家觀念比較穩固和明確地建立起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近十年來的事情。由於我國民族問題上有着這樣一個特點，因此，也影响到各民族間的意見之一致和緊密團結，也使到別有居心者有機可乘。

第七，由於馬、華、印三大民族都是外來移民，因此，在國外他們都有他們的親屬民族。而且，他們與這些親屬民族還保持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和時時給他們巨大的影響。由於他們和他們的親屬民族都是出於同一源頭，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誰如果不了解印尼民族，中國漢族，印度淡米爾族，那麼，他就不可能完全了解我國的馬來族，華族和印族了。由於我國的這種特殊情況，因此，我國的馬來族向印尼民族，華族向中國漢族，印族向印度淡米爾族吸取他們的優良傳統，揚棄他們的不適合於馬來亞的特殊情況的東西，那就是很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事情了。至於那些叫人放棄作為一個民族，叫人忘宗忘本，和叫嚷各民族和它們的親屬民族的接觸，將會造成不良後果的人，如果不是別懷惡心，就是看不到民族的發展規律。

第八，在它們鄰近的這些親屬民族，長久以來也同它們一樣，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但是，在它們的親屬民族里，比它們更早地興起了民族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比它們更早地展開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大規模羣眾性鬥爭。正是這些大規模的羣眾性英勇鬥爭，不斷地影响着和沖擊着我國的三大民族；而且我國的三大民族也正是在這些鬥爭中的影響下和沖擊下，加上自己的被統治、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日益造成它們

回教改革運動在馬來亞(註一)

——陳蒙鶴——

(一)回教的興起

我們知道，回教的發源地是中東的阿拉伯，因此，在還沒有談到馬來亞的回教改革運動之前，我想先把回教興起的歷史略述一下。

約在公元六世紀末，在阿拉伯半島的西部紅海沿岸，由於當時阿拉伯的民族、社會、政治、經濟的因素，產生了一個適應阿拉伯人要求的新宗教——伊斯蘭（Islam，即完全獻身給真神之義。信仰伊斯蘭的人自稱為穆斯林Muslim，即跟隨真神的人。在本文中，我們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仍然釋Islam為回教，而Muslim為回教徒）。回教的創始人是穆罕默德（Muhammad），他自稱是真神阿拉（Allah）的使者。回教徒的聖經——可蘭經便是真神借穆罕默德之口傳給世人的訓言。最初穆罕默德的教義被麥加城裏的長老認為大逆不道。穆罕默德和他的使徒們甚至被趕出麥加，到麥加地那去避難。可是信仰回教的人後來越來越多，到了公元六三〇年，麥加城裏的長老看形勢不對，終於與穆罕默德妥協。穆罕默德於是凱旋回麥加，此後，麥加便成了回教徒的宗教和政治的重心。回教教義裏一項主要的規定是每一個回教徒一生中至少必須設法到麥加朝聖一次，做得到的話，則越多越好。在公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逝世。因為他沒有立嗣，在他的使徒中最有威望的亞布巴加（Abu Bakr）便成為回教徒的領袖，自稱為哈里發（Caliph即（穆的）代理人之義）。在幾個哈里發的領導下，阿拉伯變成一個統一又強大的國家，回教便隨着哈里發國家的擴張而迅速向阿拉伯以外的地區發展。

阿拉伯民族崛起的時期，正當是他們的強鄰如拜占庭（Byzantium，即東羅馬帝國的承繼者），埃及和伊朗（波斯）逐漸衰亡的時期，這給了哈里發向外擴張的有利條件。到九世紀左右，哈里發國的版圖東起葱嶺，西至大西洋，成為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國。

生活不下去，日益激起他們的憤怒，因此，他們也開始覺醒了，他們也起來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鬥爭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法西斯對他們的親屬民族，以及對他們本身進行的慘無人道的蹂躪和迫害，更加激起他們的憤怒，促使他們的覺醒和團結，使到他們也展開堅決的鬥爭。因此，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英帝國主義企圖重新在馬來亞恢復其舊殖民統治時，馬來亞三大民族就不再像戰前那樣順從了，它們已經懂得團結，懂得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鬥爭了。與這同時，居住在鄰國的它們的親屬民族在

回教發展的迅速，給了後來的人們一種模糊又幼稚的觀念，以為回教徒一手拿了劍，另一手拿了可蘭經，以武力逼當地人信仰回教。事實上，阿拉伯人在征伐的初期，還給予當地人相當平等的地位和信教的自由呢。回教後來成了當地人的宗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回教是統治者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也因為回教當時所代表的是一種較高的文化。

在哈里發國全盛時期（即九、十、十一世紀），歐洲文化還停留在「黑暗時代」，回教文化却光芒四射。當時的回教徒一方面向那些文明古國如埃及、伊朗和希臘學習許多寶貴的知識，一方面依據他們自己的發明和發現，把學來的東西加以補充修正，發揚光大。在哈里發國的大都市裏如伊拉克的巴格達（Baghdad）、西班牙的哥爾多瓦（Cordova）、埃及的開羅（Cairo）都開辦了高等學院，其中以開羅的Al-Azhar大學最出名，它是在公元969年成立的。由於可蘭經的影響，各民族學者不但能讀寫阿拉伯文，并把他們本國的語言也加以阿拉伯化，伊朗的新波斯語（New Persian）如東南亞的爪威文（Jawi）就是很好的例子。除了促進文字和文學的發展外，回教對數學、天文、地理、物理、化學、醫學和歷史都有很傑出的貢獻。

在政治上，哈里發國經過多次內亂和外侵的影響，逐漸瓦解，終於在十三世紀被蒙古人消滅了。哈里發國雖然不再存在，可是各地的蘇丹王朝却繼續不斷，到了十六世紀，當土耳其人在地中海周圍建起了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時，它的蘇丹承繼回教的傳統，自稱為哈里發。但是，這時期的回教已經失去了它的進步性，而土耳其統治者的高壓政策，不但使它失去了國內回教徒的支持，并引起國內外回教徒強烈的反抗。

除了土耳其外，印度也出過一個有名的回教王朝，它便是後來被英人所滅的蒙兀兒帝國（Mughul Empire）。

回教如何傳入東南亞，還是近代史學家不能解答的謎。一個有趣的事實是：雖然東南亞目前約有七千三百

鬥爭中不斷取得勝利，而且比它們（我國三大民族）更早地取得了自由和獨立。這一切勝利，實在給我國三大民族太大的鼓舞了。這一切勝利成了它們鬥爭中很好的學習榜樣，更加强了它們鬥爭的決心和信心，使到它們在往後的鬥爭中更堅決，更勇敢，并且也節節取得了勝利。

第九，我國的民族運動大約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期間，而大規模羣衆性的民族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則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展開。這就是說，我國民族運動是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遭到空前損傷和削

萬的回教徒，可是沒有一個是在阿拉伯人的劍下接受可蘭經的。當回教在東南亞興起時，正是它在中東逐漸沒落的時候。一般人相信：東南亞回教的傳播者，除了少數的阿拉伯商人外，主要的是印度的回教徒。（註二）我們從馬來紀年中，也只略為知道馬六甲的統治者如何在蘇島北部幾個回教國的影響下，接受了回教教義，并在它的南征北討中，把回教帶給其他的居民。十五世紀以來，除了馬六甲王朝外，先後興起的還有蘇島的亞齊王朝，爪哇的日惹王朝，婆羅洲的汶萊王朝和菲律賓的蘇祿王朝等，這些王朝一直到歐人勢力東侵後才逐漸衰亡。

（二）歐人的東來和回教國的反應

十九世紀以來，西歐各國相繼興起并向外擴張，首當其衝的是亞、非的回教國家。土耳其帝國在列強的瓜分下變成「歐洲的病夫」；北非的埃及、阿爾及里亞和利比亞先後落入英、法、意手中；中東的阿拉伯、敘利亞、伊拉克成了列強的保護國；伊朗和阿富汗是英、俄相爭的咀肉；印度、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成了英、荷的殖民地。

歐人的侵略，很自然地激起了回教國家的民族覺悟和民族運動。十九世紀中期，中東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回教學者和民族領袖叫着加馬路丁·阿夫汗尼（Jamaluddin Afghani 1838—1897），他認為擊退歐人的進攻必需從兩方面來着手。在政治上，他號召全世界的回教徒團結起來，團結在土耳其哈里發的周圍。他這種泛回主義的主張，由于土耳其哈里發政權太腐敗，終于不能成功。然而，泛回主義的思想始終吸引各地的回教徒，給于他們一種共同命運，共同道路的感覺。

在宗教上，他認為回教徒應該回顧他們過去光榮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而不要沮喪。他相信目前回教徒之所以追不上西方國家的發展，是因為回教教義存着許多本來沒有的，非科學的，不合時代的東西，只要把這些東西掃出去，回教便有希望，回教徒便也得救了。他所提出的許多回教改革的主張，往往是以恢復回教過去的「純潔」為根據，因此，他的回教改革運動也被人稱為回教復興運動。

阿夫汗尼的同志和學生，穆罕默德·阿杜（Muhammad Abduh 1849—1905）和阿夫汗尼一樣地出名，他是埃及回教復興運動的先驅者，後來做了埃及的大法官。在他當法官的期間，他發出許多富有改革性的判詞（Fatwa）。譬如：他認為回教徒可以在銀行存款生

利；回教徒可以穿洋服，吃西餐等。他對回教教育的改革，特別關心，雖然他出身於 AL-Azhar 大學，可是他是最早要求改革，AL-Azhar 制度的人。當他發覺他要改革 AL-Azhar 的計劃行不通時，他毅然決定要重建一間近代化的大學。在他的推動下，埃及大學（Egyptian University）終於在1905年成立了。

阿夫汗尼和阿杜逝世後，繼續回教復興運動的有一派人叫做 AL-Manar 派，這名稱是由他們所編的雜誌 AL-Manar（燈塔）那兒來的。這雜誌在1898年年創刊，幾年後就風行整個中東，它是一個很激進的阿拉伯文刊物，不但對中東的回教改革運動有直接的影響，而且間接推動了中東以外的回教改革運動，馬來亞也沒有例外。

（三）馬來亞的回教改革運動

在還沒有談到馬來亞的回教改革運動之前，我們必須重溫一下十九世紀末馬來亞的狀況。在1867年，新嘉坡、馬六甲、檳城三地正式脫離英東印度公司而成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在1874年英人決定全面干預半島事務，并在各州實行參政司制度（Residential System），從此，馬來亞各土邦逐漸淪為英國的保護國（Protectorate）。在各土邦和英國所簽訂的條約中，有一項很突出的地方，那就是：「除了有關馬來宗教與風俗習慣外，馬來蘇丹必需接受英參政司對其他一切事務的意見」。在這種情形下，馬來蘇丹以及其上層統治者自然而然更加集中精神去處理有關馬來宗教和風俗習慣的事務，他們不但把以前對這方面的無政府狀態完全掃除，并且對每一個回教徒的日常宗教活動加以正軌化和規律化。各州的回教活動，甚至回教徒的一舉一動，都有州內的以蘇丹為主的宗教事務部（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監視和管理。宗教既然和馬來人的社會活動發生這麼密切的關係，馬來社會中的新舊派的衝突，也就先在宗教問題上爆發了。

值得注意的是：馬來亞的回教改革運動的發源地是新嘉坡而不是任何一個馬來州。1906年7月23日，在新嘉坡出現了第一本主張回教改革的刊物，它的名稱叫做 Al-Imam（領袖）。這月刊的宗旨是：提醒那些健忘的，喚起那些瞌睡的，指引那些迷路的，和教導那些無知的（回教弟兄們），很明顯的，Al-Imam 的宗旨是喚醒那些迷了路的回教徒，要他們重新做一個像穆罕默德當時一般的好回教徒。

這個刊物的主編是大喜·加拉魯丁（Shaykh Ta-

弱，世界上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一系列新型民主國家，在亞洲古老的東方民族的民族運動蓬勃發展和節節取得勝利的偉大時代里蓬勃展開的。但是，另一方面，這也表示着我國民族運動和民族獨立鬥爭底歷史是很短促的。因此，我國各民族人民在鬥爭中的團結和鬥爭經驗，各民族人民的鬥爭傳統，還是比較缺乏和不堅固。并且，由於我國的這種特殊情況，因此，我國的民族運動初期，是在華、馬、印各民族內部各自萌芽、展開和發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段時期，這種發展更加高漲了，最後，便與其他民族運動在為了爭取共同

利益的基礎上，進行聯合的鬥爭。這種先在各個民族內部發展，聯合和統一，進而擴展到和其他民族進行聯合和統一，以求一齊發展，爭取共同的勝利，也是我國民族運動和鬥爭的一個規律。

以上這些，就是我國民族問題的特殊條件和特殊情況。這些特殊條件和特殊情況，不管我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它們是客觀存在着的。誰希望正確認識我國的民族問題，誰希望正確處理我國的民族問題，誰希望搞好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團結，那麼，他就必須好好掌握和考慮我國民族問題的這些特點。

hin Jalaluddin)，他是蘇島人，不過曾經去過中東，是麥加的一間神學院的畢業生。其他寫稿人有：阿巴士·穆·大哈(Abbas M. Taha)，馬來亞最早的 Al-Azhar 大學畢業生之一；賽·雪克·阿哈地 (Sayyid Shaykh Al-Hadi)，廖內過來的商人；和兩個阿拉伯人。

從這些主持人的略歷，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刊物是受中東和印尼回教復興運動的影響。我們知道，歐人的東來促進了東西交通的方便，汽輪的發明和海上交通技術的改進更把東南亞的回教徒直接帶到麥加聖地，使他們親身受到中東回教復興運動的薰陶，Al-Imam 這個刊物便是在中東回教復興運動影響下的產物。在這個月刊里，這些回教改革人物一方面攻擊當地流行的教義和儀式中許多「不純潔」的地方，譬如：他們認為在馬來亞各地盛行的 Tarigat (即回教里的「道」派) 是完全沒有可蘭經和先知的口碑 (Quran 和 Hadith) 為根據的。另一方面他們也勸回教徒們學習近代科學知識和經商技能，他們舉出中古時代的回教徒為例子，強調學習這些「俗學」完全是符合回教教義的。

他們認為，除了可蘭經和先知的口碑外，回教徒不必，也不應該隨便接受任何教裏的長老的法規，這樣一來，他們引起各州的宗教教師，Kathi(低級的法官)，Mufti (高級的法官) 和 Ulama (回教學者) 的不滿。在馬來社會裏，因為 Al-Imam 的出版，第一次出現了兩個明顯的對立陣營，人們把那些主張回教改革的人叫做 Kaum Muda (新派；年青派)；把那些主張保留現狀的叫做 Kaum Tua (老派；古舊派)。

代表 Kaum Muda 的見解的 Al-Imam，由於人、錢兩方面都缺乏，不到二年就停刊了。一般說來，它對馬來社會的影響可能不大，一來因為它是在新嘉坡發行的刊物而新嘉坡的馬來人不但少，而且流動性很大；二來因為它的主持人多數是在馬來社會以外的人物 (註三)，不容易打入馬來社會。

雖然 Al-Imam 這雜誌是失敗了，可是主張回教改革的人並不氣餒。在1911年，阿巴士·大哈在新嘉坡再出版一份與 Al-Imam 同樣性質的宗教雜誌，叫做 Neracha (天平)。它起初是十日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適應讀者對中東戰訊 (尤其是土耳其方面的戰訊，因為土耳其是回教徒所尊崇的哈里發的象徵) 的要求，Neracha 還出過三日刊。

由於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馬來亞的回教徒對以土耳其為主的泛回主義漸漸感到失望。他們雖然對中東的回教復興運動仍然感到很大的興趣，可是，他們所關注的是各回教國的民族運動，而不是泛回運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Kaum Muda，除了受 Al-Imam 和 Neracha 影響的一些讀者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青年，第一種是從中東近代化的學校裏出來的畢業生，他們在那兒 (尤其是埃及) 吸收了不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看到土耳其的革命和埃及的獨立運動，回來後，對馬來社會的保守和落後當然感到不滿，因此對回教改革運動也很熱心。

還有一種是馬來亞英語教育的產物，這些接受英語教育的馬來人，對回教改革運動雖然同情，可是並不像前者那麼積極。主觀上，他們受了西方科學教育的影響，認為科學和回教沒有衝突；認為回教徒不應該盲信，不應該落伍。可是客觀上，由於他們絕大多數出身於統治階層，他們終於擺脫不了舊派的影响，只有極少數屬於自由職業者或中間階級的受英語教育的馬來人，才敢公開為 Kaum Muda 的主張辯護。

面對着 Kaum Muda 的挑戰，吉蘭丹州的回教事務委員會在1918年出了一份期刊，叫做 Pengasoh (教育者)。這是一個完全代表 Kaum Tua 說話的雜誌，它從1918年起一直到1937年止，每星期出一期，全無間斷，Kaum Tua 的勢力，由此可見。

然而，Kaum Muda 派也不肯示弱，在1926年，賽·雪克，以前 Al-Imam 的寫稿人之一，在檳城出版了一份 Al-Ikhwan (同志) 月刊；兩年後，他又出版一份報紙，叫做 Saudara (弟兄)。

隨着馬來社會的分化，Kaum Muda 和 Kaum Tua 之間的論爭也日益白熱化。他們起初還爭論回教教義上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例如：Kadza 和 Kadar (回教中的「命運論」和「自由意志論」) 有沒有矛盾；銀行裏的利息是不是高利貸等。後來，由於意氣用事，兩派之間往往對一些渺小的問題也爭得不亦樂乎，例如：回教徒結婚時可以帶金器嗎？沒有四十個人能不能做禮拜等？這種爭論不但對問題沒有幫助，反而使讀者越看越糊塗！

我們說過，Al-Imam 和 Al-Ikhwan 是在新加坡和檳城出版的，可是 Pengasoh 却是在吉蘭丹出版。馬來亞的回教改革運動彷彿是側重於幾個英人直轄的城市，廣大的農村却是 Kaum Tua 的大本營，為了消除 Al-Ikhwan 和 Saudara 可能帶來的壞影響，吉蘭丹州議會曾有意完全禁止 Al-Ikhwan 和 Saudara 進入吉蘭丹州。

(四) 總 結

一般說來，馬來亞的回教改革運動並沒有達到改革者的目標。他們失敗主要的原因，根據 William Roff (註四) 的分析，有下列幾點：

(一) 回教改革家把回教改革的目標放在宗教上和教育上而不是政治上。他們以為只要做到使六世紀的可蘭經適應二十世紀的社會，便能解決回教徒的一切問題，事實上，這是誰也做不到的事。

(二) 回教改革運動在馬來亞只是限於一些城市，接受回教改革的主張是一些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的環境和他們個人主義的思想正是和正統回教思想格格不入的，可是在廣大的鄉村裏，農民的保守性和嚴密的宗教組織使他們接受不了任何新的東西。

(三) 英政府的政策是使馬來民族永遠滿足於他們那種原有的經濟活動和生產方式，凡是需要近代化的生產方式時，他們儘量僱用大批的印工和華工。馬來社會既然不會受到二十世紀經濟變化的影響，又怎麼會急于接受任何改革的主張呢？

1938—1957年馬來亞 對外貿易概況與特徵

范小秋

前 言

本文旨在對馬來亞自1938年至1957年的對外貿易情況，作個完整然而膚淺的探討。我們企圖將這廿年來的對外貿易情況，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特別是它們之間的國際經濟關係聯系在一起，同宗主國的一些旨在加強它在殖民地與自治領市場地位的措施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給予剖析。因此，在這裏，我們也就將馬來亞對外貿易中的一些轉口貿易的性質，捨棄不談，也就將星加坡的對外貿易情況，割裂不論。我們以為，這固然是對馬來亞對外貿易整體認識的一項缺陷，却也有助於我們研討過程的利便與簡化。

在這廿年中的馬來亞，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因此，也就沒有什麼貿易政策問題可言。雖然馬來亞也有過諸如錫砂出口稅之類規定，但却全是為了英國壟斷組織的利益，是英國政策在馬來亞的延長。

談對外貿易，而不言國際支付，這是一項嚴重的缺點。馬來亞的國際支付問題，和英鎊集團有關，問題千絲萬縷，盤根錯節，非本文所能涉及。這類問題只好存而不論。

我們將廿年來的對外貿易，分為三大階段，即：1938—1940年，1946—1952年，1953—1957年，而其中，存在着一段淪陷時期的空白。1938—1940年是法西斯國家到處燃起戰火的時期。1946—1952年是馬來亞恢復生產與英殖民主義者向馬來亞實行軍事鎮壓時期，而其間的韓戰，只不過是一種暫時因素。1953—1957年是隨着

韓戰的結束，膠錫價格暴跌所帶來的不景氣的時期。這三大階段各自獨立，各自區分，但又統一成為總的歷史階段，那就是：在這廿年間，對外貿易的基本特徵並沒有任何質的改變。這些基本特徵，我們以為，就是本文結論中所揭示的那些。

1938年以前的一般概述

在歷史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準備時期，即在16世紀、17世紀與18世紀的一部份——這一階段的時間里，殖民地一直是歐洲先後相繼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之爭奪侵佔的對象。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貫串了這一時期的全部過程。在這個時期，對殖民地豐富資源的強征豪奪，構成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積累的極大部份。這種日益加緊的對殖民地的掠奪，反映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間的貿易關係上，首先便呈現着一種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特點。單就老牌殖民主義的英國來看，這特點一清二楚。在1698年至1701年間，英國與當時的美洲間的貿易額，為170萬英鎊，在1802年，這項數字便上升到2330萬英鎊，約增14倍。英國對亞洲，首先是同印度的貿易，則由80萬英鎊，增加到870萬英鎊，約增11倍。在17世紀末，英國與歐洲間的貿易約佔英國全部對外貿易額中的80%，到了18世紀末，便降為55%。在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上，同樣明顯地呈現着作為一個殖民主義宗主國在貿易上所固有的特徵。18世紀末，在英國進口商品中，有一半以上經已是諸如糖、大米、烟草、木材等原料與食品，在出口商品中，則全為工業製成品，首先是紡織品。這種貿易情況，從英國這一方面來看，是它的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它對殖民

(四) 在英國人的支持下，各馬來州的教階組織是空前的完備和鞏固，各州的統治者除了法律外更享有宗教上的權威。這一座很厚的保守性和傳統性的圍牆那裏是幾個宗教改革家所能够動搖它的？

(五) 1930年後，馬來社會中新起的領袖（一些受英語教育的，及受馬來高等教育的馬來智識份子）已經不把回教改革當作解決問題的辦法了。

(六) 1930年後，馬來亞的其他民族，如華族、印族人口激增，引起馬來社會的走向狹隘民族主義運動的道路，這時，Kaum muda 和 Kaum Tua 之間的矛盾變得緩和了。

Roff 的分析，是史學家第一次對回教改革運動做一種有系統的研究結果，雖然不儘正確，但也不失精闢的見解。我把他的結論介紹出來，目的是給大家作為參考，并提供一個研究的基礎。只有大家對馬來亞社會的

各種現象，各種活動能用科學的方式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對他的結論給予客觀的批評，并在這一基礎上做出全面而正確的總結。

註一：回教改革運動 (Islamic Reformism) 也叫做回教復興運動 (Islamic Revival)，因為這些改革家的目的是要恢復回教過去的純潔和光榮。

註二：也有回教學者如 Professor Fatimi，認為東南亞回教的傳播和中國回教徒有很密切的關係。

註三：所有的主持人中，只有阿巴士·穆·大哈 (Abbas M. Taha) 是新嘉坡出生的馬來人。

註四：Roff, William: "Kaum Muda — Kaum Tua: Innovation & Reaction Amongst The Malays, 1900—1941" in Papers on Malayan History (Ed) K. G. Tregonning.

地掠奪加緊的反映；從殖民地這一方面來看，則是它們原有的城鄉手工業遭受破產，日益淪為英國原料供應地與商品銷售市場的經濟附庸地位的反映。

便是在這個時期，馬來亞的國土受到了外來殖民主義者的侵佔。英國對馬來亞國土的侵佔，是從1786年他們在檳榔嶼取得了第一個立足點開始的。到了1914年英國取得柔佛之統治權後，這個對馬來亞國土的侵略過程，基本上，便告一段落。當然，馬來亞在這個時期的對外貿易，也是像英國的其他殖民地一樣，反映着一種逐步走上宗主國原料供應地與商品銷售市場的經濟附庸地位的特徵。隨着英國壟斷資本對馬來亞採掘工業與原料生產部門的經濟侵略，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裏，馬來亞的對外貿易狀況，呈現着一種出口商品日趨片面化與對宗主國之依賴日益加深的特點。一兩種專供輸出的原料產品在馬來亞的出口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日益提高。總之，一句話，相應着英國在馬來亞的統治，在馬來亞的對外貿易上，也只能是英國的「一家天下」，雖然，在19世紀後半期面對着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的強烈競爭，已經逐漸喪失了它在工業中的壟斷地位與在世界市場上的統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之後，開始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相應着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空前未有的加強，相應着資本主義國家一切經濟生活方面的極端衰落與破壞，相應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資本主義世界各國間的國際經濟關係逐漸趨於混亂。對外貿易萎縮，對外貿易的寄生性與剝削性增大，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市場日益尖銳化，是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對外貿易的特徵。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階段，是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之後，而終結於第二次大戰期間，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陣營成立之後。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階段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是取決於英美的競爭與德、日等法西斯國家的日益加劇的擴張。儘管在第一次大戰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英國仍然保持着它在世界市場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數年期間，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問題的進一步尖銳化，英國的「不落太陽」開始走上它的沒落道路了。只要看看在這時期里，英國是如何竭盡所能地為了保持自己在世界市場的地位，而將自由貿易的政策一股腦兒，徹底乾淨地拋棄的情形，便可一目了然。1931年金本位取消後，那些與英國在貿易上和政財上有密切關係的國家，首先是英帝國，都使自己的貨幣對英鎊保持一定的比例。至1932年，便正式形成所謂英鎊集團。這種措施，有助於英國在世界市場地位的加強。同一年，在渥大華召開的英帝國會議上，英國又制定了特惠稅制度，加強宗主國，殖民地與自治領間的貿易以及嚴格地限制別的帝國主義進入帝國的市場。對於殖民地來說，這些措施反映了宗主國對殖民地掠奪的加緊，反映了宗主國對殖民地經濟統治的加強。這可從下面表1看出：

表1. 殖民地與自治領在英國對外貿易中所佔比重

（佔總額的百分比）

| 年份 | 進口 | 出口 |
|------|------|------|
| 1929 | 29.4 | 44.4 |
| 1938 | 40.4 | 49.4 |

1938—1940年馬來亞對外貿易情況與特徵

在這一階段裏，就國際範圍來看，有幾件事情，對馬來亞的對外貿易，具有重大影響。這就是：

第一、1937—1938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於資本主義國家遭受1929—1933年的嚴重經濟危機打擊後，在特種蕭條和資本主義工業稍許復蘇期間，國際貿易的增長並沒有達到危機前的水平（1937年按實物計算的貿易額只有788億美元，只及1929年水平的94%），而接着又面臨1937—1938年的危機侵襲，國際貿易於是更加急劇地縮減下去了，1938年的國際貿易，按價值計算只達1929年的40%，按實物計算則為1929年的86%。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自1938年起，法西斯國家便已到處燃起烽火，第二次世界大戰實已在1939年期間爆發，只不過馬來亞尚未被燃及而已。

第三、由於英國在外交上實行緩靖政策，馬來亞與日、德等法西斯國家間仍然存在貿易關係。

經濟危機，戰爭及其所引起的對戰略物質的需求等因素，交互地影响着馬來亞在1938—1940年淪陷前夕的對外貿易，使馬來亞對外貿易出現了一些特點。現在，我們分開幾方面來敘述。

（一）1937—1938年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影響，很快地便被消除。在發生經濟危機的1938年，馬來亞的進口貿易貨值為546.6百萬元，只及1937年的78%，而出口貿易貨值為569.3百萬元，只及1937年的62.8%，但是，和1936年比較起來，在進口貨值方面，却是稍有增長。1940年，馬來亞的對外貿易貨值便告不僅回復1937年的水平，並有增長。1940年，馬來亞的進口貨值為830.3百萬元，為1937年的119%，出口貨值則為1128.2百萬元，為1937年的176%。詳細情況可以看下面表2：

表2. 1936—1938年馬來亞對外貿易貨值
（單位：百萬叻元）

| 年份 | 進口 | 出口 |
|------|-------|--------|
| 1936 | 512.9 | 638.8 |
| 37 | 698.5 | 905.1 |
| 38 | 546.6 | 569.3 |
| 39 | 628.1 | 750.2 |
| 40 | 830.3 | 1128.2 |

仔細地看來，這種貿易的迅速回復與增大，是與戰爭有關的。由於在馬來亞的輸出商品中，膠錫是佔了極大的比重，而這兩種商品又是所謂戰略物質，正是那些擴軍備戰國家所殷切需求的。這樣，一來，必然造成資本

主義國家對膠錫吸胃的增大，二來，必然造成膠錫價格的上升。1938年馬來亞樹膠輸出量為871千噸，至1940年，這數字便上升到1395千噸，比1937年尚增加229千噸。錫的情況亦然。1939年的錫輸出量為82089長噸，1940年則增長為130935長噸。關於膠錫價格上漲的形勢，我們尚可從下面表3看出：

表3. 1936—1940年膠錫之倫敦平均價格

| 年份 | 樹膠 pence/lb | 錫 £/Ton |
|------|-------------|---------|
| 1936 | 7.7 | 204.6 |
| 37 | 9.5 | 242.3 |
| 38 | 7.2 | 189.6 |
| 39 | 9.0 | 226.3 |
| 40 | 12.1 | 256.6 |

★樹膠價格乃是指 Ribbed Smoke Sheet 之價格總之，馬來亞在這階段的對外貿易貨值，經歷過經濟危機的侵襲後，仍然可以在一年期間，便迅速回復與增加。這是依靠了上述兩項因素的作用。

(二) 儘管在這期間，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經已是炮火連天，馬來亞對日、德等法西斯國家仍然維持着

貿易關係。日、德法西斯國家在馬來亞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並沒有多大的變更，而且馬來亞對日、德的輸出的絕對量，却在逐步地增加。馬來亞輸出商品中的膠錫，正是這些戰爭瘟神所迫切需要的戰略物質，而馬來亞却在不斷地向其輸出這類戰略物質，這無疑是助人為惡。馬來亞在1939年向德國輸出的貨值為42.53百萬元，比1936年增加了27.605百萬元。在1939年向日本輸出貨值為64.25百萬元，較1937年增加3.54百萬元。由此，我們也可看出，在戰爭期間，英國政府所施行的緩靖政策，是如何地助長法西斯燃起戰火的氣焰。

(三) 戰爭要求擴大軍事生產，需要大量的原料與物質。這就迫使英國不得不縮減它對馬來亞的出口。在1939年，英國對馬來亞雖還維持着出超的情況，但其絕對額已經大大縮減了，只有9.75百萬元。到了1940年，却是入超了50.42百萬元。這入超增加的情況也是戰後英國對殖民地與自治領形成了英鎊債務主要原因。

(四) 尚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美國在1940年向馬來亞輸出的貨值為38.03百萬元，較1936年增加28.67百萬元，在短短的四年間，約增大四倍。而且其對馬來亞的入超情況，却不斷地在縮減。

這個時期馬來亞對外貿易的國別情況，可從下面表4看出：

表4. 1936—1940馬來亞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貿易貨值(單位：百萬元)

| 國別 | 1936 | | 1937 | | 1938 | | 1939 | | 1940 | |
|----|-------|--------|--------|--------|--------|--------|-------|-------|--------|--------|
|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 英國 | 76.99 | 56.34 | 108.17 | 100.22 | 58.046 | 46.136 | 90.89 | 81.14 | 113.29 | 163.71 |
| 日本 | — | — | 40.48 | 60.71 | 7.073 | 30.673 | 12.48 | 64.25 | 14.38 | 59.93 |
| 德國 | 9.015 | 14.925 | 13.294 | 29.43 | 6.364 | 10.366 | 8.18 | 42.53 | — | — |
| 美國 | 9.36 | 295.60 | 15.944 | 398.85 | 9.752 | 9.733 | 18.30 | 32.19 | 38.03 | — |

★1938年數字貨幣單位為百萬美元

1946—1952馬來亞對外貿易情況與特徵

1941年馬來亞為日本法西斯所侵佔，一切生產皆為日本法西斯所掠奪，這段時間，馬來亞有的只可能是同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再也沒有什麼對「外」貿易可言。

光復後，馬來亞的對外貿易逐漸回復。

自1946年至1952年間，馬來亞的對外貿易，基本上可再分為兩個小階段，即：自1946年至1949年為第一小階段，在這階段裏，馬來亞的對外貿易的基本特徵是：對外貿易的逐步的回復與稍許的回升。自1950年至1952年為第二小階段，在這階段裏，馬來亞對外貿易的基本特徵是：韓戰的爆發帶來了對外貿易在貨值上的一種暫時的擴大現象。這兩個小階段又構成了自1946年至1952年的總的大階段，因為這個總階段，基本上，是反映着英殖民主義戰後對馬來亞人民實行軍事鎮壓從而生產不可能迅速回復的特徵。

從整個階段，即從1946年至1952年的整個過程來看，單就出口貿易看，馬來亞在這期間的出口貿易的回

復與上漲並不是很快的，其情況可看下面表5：

表5. 1948與1950年主要出口商品實物量(單位：千噸)

| 商品 | 1948 | 1950 |
|------|------|------|
| 樹膠 | 732 | 780 |
| 錫與錫砂 | 42 | 104 |
| 鐵砂 | 71 | 521 |
| 木材 | 86 | 127 |
| 棕油 | 48 | 52 |

這種出口貿易實物量之不能迅速上漲，就國內的生產情形看，固然是馬來亞戰後生產不能迅速回復與上漲情況的反映，就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情況看，亦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不能迅速回復生產的情況的反映。光復後的馬來亞，由於遭受戰火的洗禮，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園坵礦場都不能馬上恢復生產，再加上戰後馬來亞人民羣眾運動的高漲，英殖民主義者實行了殘酷的軍事鎮壓，在馬來亞重燃戰火，挑起森林戰爭。自1948年頒布緊急法令後，樹膠產量便從未達至1948年的生產水平，錫產量也從未恢復戰前1940年的生產水平。

馬來亞的對外貿易是包含着對資本主義國家極大的依賴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行情，嚴重地影响着馬來亞的對外貿易。戰後幾年內，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雖有所增長，但都依靠着經濟軍事化的措施，那速度也是緩慢的。在國際經濟上，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展開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階段，更加趨於混亂了。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打破了資本主義無所不包的統一市場。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與四分之一的土地，脫離了資本主義的統治，大大地縮小了資本主義的市場。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更加尖銳化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支付能力削弱了，它們的黃金和外匯儲備急劇減少，因此，它們都在竭力地削減進口，擴大出口。那些佔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也都在加強着自己的陣地。就拿英國同自治領與殖民地間的貿易來說，佔英國對外貿易總額之比重日益在加強：1950年，這種比重，在進口方面為42.8%，在出口方面為48.5%，在1952年，進口為47.0%，出口為69.4%，1953年，進口為49.2%，出口為49.3%。

上述種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予馬來亞對外貿易以重大影響。在出口貿易上，於是便呈現着出口貿易不能很快擴大的現象，在進口貿易上，於是便呈現着進口貿易，首先在貨值上迅速增長的現象。前者，我們已在上面敘述過了，後者，我們可從下面表6看出：

表7. 1947—1952年馬來亞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貨值
(單位：百萬元)

| 國別 | 1947 | | 1948 | | 1949 | | 1950 | | 1951 | | 1952 | |
|----|-------|--------|--------|--------|--------|-------|--------|--------|--------|--------|--------|--------|
|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 英國 | 92.21 | 90.79 | 104.00 | 92.02 | 169.99 | 39.92 | 227.38 | 278.55 | 335.13 | 609.34 | 376.90 | 424.95 |
| 美國 | 22.65 | 217.64 | 22.82 | 208.83 | — | — | 14.87 | 501.78 | 28.58 | 403.19 | 31.46 | 292.59 |
| 日本 | 1.73 | 2.46 | — | — | 2.67 | 20.01 | 12.91 | 43.11 | 35.71 | 48.38 | 42.20 | 52.25 |
| 德國 | — | — | 0.16 | 17.40 | 2.91 | 23.67 | 7.34 | 80.48 | 21.99 | 79.49 | 19.18 | 52.92 |

在研討這一階段的馬來亞對外貿易情況時，我們有必要將注意力放在韓戰所引起的馬來亞對外貿易的暫時性擴大的特徵上。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這階段里，由於緊急狀態的頒佈，許多膠園與錫礦都不能投入生產，膠錫的生產並沒有很大的增長。我們也說過，在這階段里，馬來亞對外輸出商品的實物量也沒有多大的增長。因此，在韓期間，即1950—1952年，馬來亞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的極大膨脹，其實是一種暫時的，虛假的擴大。這種膨脹，基本上，是因戰爭刺激而上漲的膠錫價格所造成的。只要看下述所列的膠錫價格情況，我們便可一目瞭然：1948年錫之倫敦平均價格為每噸551.5英鎊，1950年為744.6英鎊，1951年為1077.3英鎊，1952年964.4英鎊。樹膠之星加坡平均價格，在1949年為每磅38.19分，1950年為108.18分。1951年為169.19分，1952年為96.07分。膠錫價格在1952年的下落，乃是受1951年5月聯合國大會在美國壓力下通過對

表. 1948與1950年進口貨值及其比較

(單位：百萬元)

| | 1948 | 1950 |
|-------|------|------|
| 總貨值 | 847 | 1311 |
| 其中：食品 | 350 | 404 |
| 其他 | 497 | 907 |
| 貨值指數 | 100 | 154 |

從整個階段看，就馬來亞對外貿易中的國別情況來說，這期間的馬來亞對外貿易在國別中，呈現着一些特殊現象。這些現象就是：(1)大多數時期對馬來亞保持着出超的英國，在這階段的後期出現了入超的現象，這是和馬來亞膠錫價格與遭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強烈競爭有關的。(2)日本與德國在戰後，一度在馬來亞的對外貿易中陷入微不足道的地位。可是在這階段的後期，即韓戰期間，却有着迅速增大的現象。儘管這種增大，無論在絕數量上，在比重上都是微小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日益縮小，市場問題日益尖銳化的情況下，這種微小的增長，却有着重大的意義。這和美國對日、德壟斷集團的大力扶持有關。(3)美國在這階段的馬來亞的對外貿易中，也曾經一度縮減，後來才逐漸增長。這是和美國在194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有關。當時，從1948年10月至1949年10月，美國工業生產縮減322%，比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第一年縮減得還多。這階段國別貿易情況可看下面表7：

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的影響。隨着韓戰的結束，禁運的影響，膠錫的價格便也日趨下落。當然，建築在戰爭因素上的馬來亞對外貿易的一度膨脹，也消失了。

我們還得將注意力放在這階段的進口貿易的結構上。這階段進口貿易的結構的特徵在於：糧食進口量的增長與機器與交通器材的增長。糧食的進口貨值，在1947年為286百萬元，至1952年便增長至683百萬元。這種情況，反映在這階段的國別貿易中，便是緬、泰在馬來亞進口貿易貨值中貿易額的增長。一般地說，這是和馬來亞戰後稻米生產不能有很大的增大(例如：1951年與1952年的稻米耕種面積反而比1949年與1950年為小)與戰後馬來亞人口的增長有關(1952年馬來亞人口估計數為5529000人，1947年則為4908000人)。機器與交通器材的進口貨值，在1950年為106.4百萬元，1951年為174.0百萬元，1952年為195.2百萬元。1952年較1950年增長78.8百萬元，平均每年增長26.26百萬元。這種

機器與交通器材絕對量的增長，雖然不很大，但對馬來亞這麼一個處在殖民地的國家來說，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方面，固然是反映了戰後幾年來馬來亞民族工業的略有成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些戰後重新回到馬來亞的外國壟斷組織，都在積極地進行設備的更新。

1953—1957馬來亞 對外貿易情況與特徵

在這階段，就東南亞地區來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為爭奪東南亞國家原料產地與銷售市場鬥爭的極端尖銳化，是這個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在東南亞地區對外貿易關係中的基本特徵。戰後以來，美國便大力扶持日本壟斷組織，力圖利用它們來奪取東南亞國家的原料產地與銷售市場。美國這種擴張當然會遭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英國的日益增長的反抗。在這個問題上，英美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國家間最深刻的矛盾。一向來，特惠稅制度與英鎊集團，是英國抵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進入英帝國市場，保持自己在英帝國市場中工業品主要供應者地位的兩大支柱。隨着美國擴張的加緊，隨着美國要求廢除特惠稅制度與取消英鎊集團壓力的增強，英國力圖利用其本國的壟斷組織，在英帝國間擴大原料與戰略物質的生產。1950年通過的「科倫坡計劃」，便是為了實現這目的。「科倫坡計劃」目的在於進一步加強東南亞國家經濟的殖民地性質。1952年，美國便打進這機構來，成為「科倫坡計劃」諮詢委員會的正式會員。看看下列數字是有益的：1937年美國向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出口，佔其出口總額的24.4%，1952年這

數字便增至32.4%。英國向東南亞與東南亞地區的出口，在1937年佔其總出口額的36.9%，1952年便下降為32.5%。在同時期里，西德與日本都在下降。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原料產地與銷售市場而各自互相扭打，互相傾軋的現象，反映到馬來亞這期間的對外貿易裏來，便出現了種種特徵。

第一、從1954年至1957年，英國對馬來亞的出口貨值，在絕對量上，基本的趨勢是上漲，但是，在馬來亞進口貿易貨值的比重上，却是逐漸下跌。1954年，英國對馬來亞的出口為335.1百萬元，佔馬來亞總進口貨值之25.4%，1957年，英國對馬來亞的出口為427.8百萬元，只佔總額之23.4%。不過，無論如何，英國以它在政治上，財政上的統治地位，依然保持着在馬來亞進口貿易上的優勢地位。

第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是：美國自1954年至1957年對馬來亞的出口貨值，基本的趨勢是增長，在比重上，却是保持穩定。1954年，美國對馬來亞出口貨值為45.2百萬元，佔馬來亞進口貨值總額之3.4%，1957年美國對馬來亞的出口貨值為56.6百萬元，佔3.1%。西德與日本，不但在對馬來亞出口的絕對量上有很大的進展，而且在比重上，日趨上升。1954年，西德對馬來亞的出口貨值為21.0百萬元，佔馬來亞進口貨值總額之1.6%，1957年，這數字增加至52.9百萬元，佔2.9%。日本於1954年對馬來亞的出口貨值為53.0百萬元，佔4.0%，1957年，這數字上升至92.2百萬元，佔5.1%。這種情況反映了美國，日本與西德在馬來亞市場上的極力擴張，和英國在貿易上的衰退。

關於國別的貿易情況，可看下面表8：

表8. 1954—1957馬來亞進口貨值國別與比重

(單位：百萬元)

| 國別 | 1954 | | 1955 | | 1956 | | 1957 | |
|----|-------|------|-------|------|-------|------|-------|------|
| | 貨值 | % | 貨值 | % | 貨值 | % | 貨值 | % |
| 英國 | 335.1 | 25.4 | 376.2 | 24.4 | 427.8 | 24.4 | 424.3 | 23.4 |
| 西德 | 21.0 | 1.6 | 30.3 | 2.0 | 43.5 | 2.5 | 52.9 | 2.9 |
| 美國 | 45.2 | 3.4 | 44.7 | 2.9 | 59.5 | 3.4 | 56.6 | 3.1 |
| 日本 | 53.0 | 4.0 | 83.7 | 5.4 | 93.6 | 5.3 | 92.2 | 5.1 |

第三、由於膠錫價格的暴跌，造成馬來亞在這時期的出口貿易無法恢復韓戰時期的1951年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在1953與1954年間，由於膠錫價格的下跌，出口貨值僅維持在1700百萬元之下的水平。以1954年的倫敦錫平均價來說，較韓戰期間1951年的每噸1077.3鎊，每噸下跌357.9鎊，以1954年6月份的星加坡膠平均價來說，較1951年的每鎊169.19分，下跌103.68分。這種跌勢之猛，自然造成了馬來亞出口貨值之急劇縮小。膠錫價格下跌的原因，上面已經提過，和禁運有關。由於禁運，使馬來亞生產的膠錫不能向社會主義集團輸出，人為地造成膠錫生產的過剩。人造膠的生產也是造成膠錫價格下跌原因之一。但是，這種「兩種膠」的競爭，其實是英國壟斷組織為壟斷樹膠市場與美國壟斷組織為打

破這種壟斷局面、奪取樹膠原料與盡力削減膠價鬥爭的反映。這種出口貨值的急劇縮減，給馬來亞帶來了1953與1954年的入超現象。1955與1956年雖是出超，但我們從出口貿易的實物量來看，這種出超是膠錫價格暫時的回升帶來的。1955年（這是兩年中出超量最大的一年）的出口實物量，如以1953年為100，則為110，但其貨值，如以1953年為100，則為148。

第四、從1954年至1957年的進口商品中，機器與交通器材的進口，不論在絕對量上，或在比重上，都有進展。1954年，機器與交通器材的進口為112.6百萬元，佔總進口貨值之8.5%，1957年這數字則為188.7百萬元，佔總進口貨值之10.4%。其情況可從下面表9看出：

關於商業利潤

·易書源·

為什麼會有商業利潤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大致上可分為三大類：即產業資本、商業資本與借貸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業資本與借貸資本，雖然是獨立存在着，但其作用已與資本主義之前的作用大有區別，它是服從于產業資本的需要，為產業資本服務的。原來在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商品的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基本上是分開的。在這時期與以往的混合在一起有不同，由于產業資本家，本身要照顧其生產企業的生產工作之進行，就不能同時經營商品的銷售。如果要同時照顧兩方面，那就不但要預付大量的工業資本以從事其商品生產的工作，同時還得預付大量的商業資本，以從事商品的轉售工作。因此為了利于產業資本家，將其大量資金集中于生產上，使資本周轉速度不至于下降，利潤不至于下降。就有須將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分開。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更向前發展，商品用于流通過程的費用也就增加。支付大量的流通費用，勢必使產業資本家利潤率下降，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存在是完全有必要。產業資本家將一部分剩餘價值，分給商業資本家，不但對商業資本家有利，同時對產業資本家來說，也是得益不少。

商業資本是投于流通領域中。商品在流通領域中是不會產生任何價值與剩餘價值，它只能是通過中介的關係使商品的價值得以體現出來而已。那麼，人們要問：商業利潤又從何而產生呢？在表面上看來，商業利潤是表現在預付的資本與售價的差額。也就是說在一特定的期間，商業資本家所投於流通領域中的資本所增殖的數額。但是究竟商業利潤是由於商人以高於生產價格出售商品或者是由於商人以低於生產價格購入而以生產價格售出而來的呢？例如：某種商品的生產價格為10元，商人究竟以10元購入而以11元售出，從中取得1元利潤；或者是以9元購入而以10元售出，從中取得1元的利潤？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明如下：

在資本主義制度以前的生產方式下，商品的生產還是處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商品的流通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所以在這期間，商人往往通過欺詐的方式，以賤價購入而以高價售出。同時很多的剝削者也通過商人去購買其所需的奢侈品與出售農產品。商人也通過這樣的

方法取得額外利潤。因此在這時候商人的利潤是以高於商品價值售出商品而來。由於這時的商業利潤的取得是通過許多不正常的手段，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此時間的商業利潤往往高於其他行業的利潤。

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商人不是自生產者手中購得商品，而是由非生產者資本家手中購得。產業資本家不願意，也不可能支付出一大筆資本從事商品流通之用；商業資本家則為許多產業資本家銷售其商品，使其商品的價值得以體現，同時又可方便產業資本家，使他們不必將資本投於流通領域而致生產領域中的資本減少，并可避免資本周轉速度下降而減少了產業資本家的利潤。

在這種情形下，商業資本已成為產業資本以外的獨立部份，而商業資本家的利潤則由產業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中分得。所以我們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業利潤不是從商品按高于生產價格而出售中得到，而是商人按低于生產價格購入商品而依生產價格出售取得也就是商業資本家分到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商業利潤怎樣計算

商業利潤率是以其所得的商業利潤與其預付資本的比率而求得的。商業利潤如同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其他利潤因競爭的結果，利潤率皆趨于平均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被視為可自由轉移的，雖然在今天有許多因素，阻礙資本的轉移。在這樣的條件下，假如商業利潤率高于平均利潤率，則必使產業資本，農業資本等，轉入到此部門來。由于這樣競爭的結果使商業利潤率，逐漸降低而使之受平均利潤率所決定。若商業利潤率低于平均利潤率，則商業資本家，將不願意將其等量的資本投入流通領域中，則勢必使商業資本流入工農業的生產方面去。總的說來，利潤率在短暫的時期內是會存在着某種的差異，但若不受到其他的因素從中阻撓的話，則必使資本主義的一切利潤率取決于平均利潤率。所以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管等投資的形式是怎樣變化，但是其利潤率都是一樣的。

前面已說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業利潤。是由剩餘價值的分割而來，而商業利潤率與其他形態的資本利潤率一樣，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與計算商業利潤

表9. 1953—1957機器與交通器材之進口貨值與比重

| | 1953 | 1954 | 1955 | 1956 | 1957 |
|----------|-------|-------|-------|-------|-------|
| 貨 值 | 133.7 | 112.6 | 133.8 | 182.8 | 188.7 |
| 佔總進口貨值 % | 9.2 | 8.5 | 8.6 | 10.4 | 10.4 |

這種機器進口貨值的擴大，反映了戰後受緊急法令影响的部份礦場重新投入生產所帶來的對新設備的需求。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了壟斷組織為了竭力保持其對馬來亞市場的壟斷與控制，不得不加緊資本輸出，擴大在殖民地的原料生產，首先是採掘工業的生產。

小 結

研討至此，對於馬來亞自1938至1957年間的對外貿

了。在商業資本還沒有參與剩餘價值的分割時，生產價格的構成是非常簡單的，它是包括生產費用與產業利潤兩部份。但是自從商業資本參加剩餘價值的分割以來，生產價格則由生產費用、產業利潤、商業利潤構成。吾人早已說明過，商業資本的參與，這只能說明剩餘價值的分配狀況而已，雖然在流通費用中有許多是能產生價值的，但這是屬於生產的延續費用。而商業資本却不能產生任何價值與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計算與剩餘價值的分割情況，可以以下列說明：

產業資本家預付的生產費用如為 400 這是由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二部份構成。設不變資本為 300，可變資本為 100。若此不變資本 300 一期內能完全消耗掉，而剩餘價值率設為 100% 則此時期所得的剩餘價值為 100，在這時若商業資本家不參與剩餘價值的分割，於是此 100 的剩餘價值全由產業資本家佔為己有，而生產價格為：

$400(\text{生產費用}) + 100(\text{產業利潤}) = 500(\text{生產價格})$

利潤率的計算法為： $\frac{\text{利潤}}{\text{預付資本}} \times \frac{100}{100}$ 。在此時期的利潤率則為 $\frac{100}{400} \times \frac{100}{100} = 25\%$ 。但當商業資本也參與剩餘價值的分割，這時的利潤計算就不會如上所述的簡單；其計算如下：

設：預付的生產費用：400

所創造的剩餘價值：100

商業資本家預付的資本：100

在此時期，生產價格還是與上面所述一樣，預付的資本就由原來的 400 增至 500（即生產費用與商業資本）所預付的資本是增多了，但其所增的資本並不能產生任何價值而剩餘價值還是照舊的 100，由於商業資本家也按平均利潤率，來分割剩餘價值，則在此時期的利潤率便成為 $\frac{100}{400} + \frac{100}{100} = 20\%$ 。則在此時的剩餘價值分割

之情況如下：產業資本家佔有 $400 \times 20\% = 80$ ，而商業資本家則得 $400 \times 20\% = 20$ ，這時的生產價格雖然還是一樣，但是產業家是不能按照生產價格出售給商業資本家，而是按照低於生產價格的： $400 + 80 = 480$ 出售，而商業資本家則按生產價格 500 轉售于消費者，20 的商業利潤也就得到了。

以上的例子中，吾人可以清楚的看出，商業資本家

參與剝削工人的情況。

商業資本家得到利潤的方式

（一）通過剝削產業工人與商店僱員而得到：商業利潤的形式較產業利潤的形式，更難察覺，這是由於商業資本本身不參與生產領域的活動所造成。這也就容易使人模糊以為商業資本家，是因其工作而得到的報酬，而非來自於剝削，在上面，吾人已清楚的說明了，產業資本家將商品售於商業資本家時，已將一部份的剩餘價值轉移至商業資本家手中。雖然在表面上看來他是無直接剝削工人，但他却佔有工人勞動成果的一部份。由於這樣，產業資本家則須進一步剝削工人，這是毫無疑義的。

另一方面，商業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實現是靠商店僱員的作用，但是商店僱員的勞動並不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他們只是體現商品價值而已，那麼對商業資本家剝削商店僱員又作何解呢？

商店僱員與其他的工人一樣，是社會中屬於剝削的一羣，資本家為取得更多的利潤，則採取一切所能施行的手段，以削低僱員的工資。商業資本家的利潤，因其受平均利潤率的影响之故，所以商業資本家所取得利潤的大小，則視其支付於購買商品所預付的資本額大小而定，因此，延長商店僱員的時間（即除必要勞動時間之外，另加剩餘勞動時間）則其所付的工資可以相對的減少。例如原來須有三個店員工作八小時，而現在他僅用兩個店員各工作十二小時，像這樣，商業資本家則可少付工資而將大部份的資本投於商業流通上，則其所獲利潤必加大。更進一步說商業利潤是要依靠商品的買賣才能獲得，商業資本家延長商店僱員的無償勞動時間，在這些時間也能替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價值，帶來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延長僱員的勞動時間與增加勞動強度就成為他採用的手段來殘酷的剝削僱員。商業僱員雖然本身不直接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但是他們受剝削的程度與其他行業工人是無所不同的。

（二）通過詐欺的手段：商業資本家雖然是以低於生產價格的代價購入商品，但是他們不一定是按照生產價格出售，他們不但希望獲得平均利潤，同時他們更希望獲得附加利潤，在許多特定的地點與時間，商人却超過生產價格而出售其商品，同時通過其他的詐欺方式例如：買假貨，不足斤兩，在尺寸上欺騙，諸如此類都是司空見慣了的，而所謂附加利潤也就是利用這種手段而得到了。像這種欺詐手段雖然是屬於不正常的現象，但

易情況，應該可以作一些結論了。這就是：

（1）膠、錫在馬來亞出口貿易結構中佔主要地位的基本特徵，廿年來，沒有改變。

（2）英國在馬來亞進口貿易中的優勢地位，最近雖受強烈的競爭，但廿年來基本形勢依然沒變。

（3）馬來亞的對外貿易是和資本主義的對外貿易聯系在一起，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一部份。實質上，它是宗主國對馬來亞原料與財富掠奪的手段。作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二階段的最大特徵的民主市場之互惠互利的

貿易原則，在這里沒有立足之地，有的只可能是損人利己手段之運用。廿年來，馬來亞一直扮演著被損害者的角色。

資料來源

- （1）Report of The 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Rubber Industry of Malaya 1954.
- （2）Federation of Malaya Annual Report.
- （3）Official Year Book, 1961.

農業國家工業化的若干問題

Maurice Dobb 作 · 碧華譯

Maurice Dobb氏為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師。他曾於1951年到印度，擔任德里大學經濟學院的訪問教授，並在那里作了一系列有關落後國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的公開演講。本文是其中的一講。

工業化問題是今日所有新興獨立國家所共同面對的極端重要問題。作者以他所理解的東歐與東南歐農業國家成功實現工業化的一般經驗，從各個方面來論述落後國家進行工業化所面對的問題。他在文中着重駁斥一般西方經濟學者所謂落後國家工業化或資本累積本質上是一個金融問題、是如何增加「國民儲蓄」以及導引儲蓄入工業建設問題的謬論；指出工業化問題根本是一個經濟制度(Economic Organisation)的問題，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或非計劃經濟的道路問題。在比較了這兩種經濟制度對工業發展的作用後，作者就把非計劃經濟比喻為只有反射作用的狗所選擇的道路而計劃經濟則為有理智的人所追隨的道路；真是別饒風趣。

不可避免地，作者的觀點仍然逃脫不了西方傳統經濟的窠臼，且文中的論述也有很多缺點與不正確的地方，然而一般上來講，本文仍值得關心此問題的讀者參考的。

——譯者——

我這篇演講目的，是要粗略地探討農業國家在進行資本累積與工業化的過程中所面對的一些問題。要這樣做，我必須把我所知道的，有關歐洲國家的經驗，特別是發生於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里的蘇聯經驗概括起來。我明白，這些經驗要應用到亞洲國家之前，必須先作若干能適應亞洲環境的調整。可是我却缺乏專門的亞洲知識。我甚至準備聽你們說那些經驗對印度只有些微、或者完全沒有用處。在往下聽時，此弱點必須牢記心中。無論如何，我相信這些經驗與你們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多少有關，至少也有相似的地方。或許這些相似點對你們來講是老調重彈，十分熟習的東西也說不定。

你們也許會記得，在上一次的演講中我曾說過資本累積的過程與工業化的過程在實際上是是一致的。這是因為農業生產所採用的機械化技術即資本設備是比工業來得有限。再者，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經常是依賴於一定程度的工業發展。例如：工業供應機器、肥料、電力與運輸工具等給農業。基於此，農業佔優勢的國家的每人平均生產率，平均生活水平一般上都比工業佔優勢的國家來得低（當然有一些例外）；從事工業的勞工比例若比

從事農業的勞工比例來得大，則平均每人生產率便會提高。換句話說，要實行工業化的理由，主要是它能帶來更高平均每人生產率，從而為提高農業國家的平均生活水準開闢了道路。然而要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須要大量的投資；因為在工業生產方面每個工人所需的資本配備是比農民所需要的高得多。

過去討論工業化問題的學者都把它看成是一個金融的問題(financial problem)。他們認為：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主要障礙是缺乏可利用的金融資源以作為大規模投資的基礎。他們都是單純從金融的觀點來看待資本累積與投資的問題。金融資源最終只能由總產量與必須消費之間的剩餘得到；對貧窮國家來講，這個剩餘是微不足道。尤有進者，落後國家中所存有的潛在儲蓄資金也不能被充分利用，因為該等國家缺少了鼓勵與引導儲蓄資金納入投資洪流的金融機構與金融制度。根據這種看法（我將稱它們為傳統的看法），一個國家的可利用「儲蓄資金」是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的主要因素。我相信，在討論印度的工業化問題時，曾有人以印度總生產量與必須消費之間的剩餘非常微小為理

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場上是根本無所謂道德的。

（三）剝削小商品生產者：在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商人往往通過許多手段，以迫使農民或小生產者，以較低的價格將產品賣給他，這就使他得到他人所不能得到的額外利潤，同時更由於小商品生產者或農民對商人往往存在着經濟上的依賴（最明顯的是表現在借貸關係上）因此商人不但能迫使小生產者以較低價售出，同時又可強迫農民或小生產者向其購買較生產價格還要高的農具或原料，像這樣商業上的額外利潤又得到了。

總之，商業利潤是由工人的剩餘價值中分割出來，而不是在流動領域中產生出來，但是商業資本家不僅得到剩餘價值的分額，而且還通過其他手段使商業利潤大

大的超過其所分割的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與流通費用

商品在流通的過程，是須要一定的費用，但是這種費用，則因其性質的不同而有別。有些費用是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例如運輸，包裝等費用。但是有些費用只是純粹流通中的消耗，而對商品的價值卻不會因其費用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廣告費，簿記費，僱員工資等。隨着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加劇，商業資本家為打跨其競爭者，則不惜消費大筆的廣告費，以及侈奢的包裝費，利用種種手段以欺騙顧客，從而達到其銷售商品取得利潤的目的。所以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用於這方面的費用也越來越多。

由來解釋何以印度不可能達致更高的投資率與更迅速的工業化以及何以推行工業化時，會發生嚴重的膨脹壓力——在缺少大量外貸時。

我們沒有理由否認上述的說法是符合印度經濟的基本特點。食糧生產的勞動力所佔的比例越大的話，其他情形若均相同，則供應工業建設的勞動力所佔的比例便越小。這也是事實。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早期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潛在的企業家缺乏僱傭勞工的流動資金以及缺少彌補此種資金短缺的信用機構是投資的阻礙因素之一。但是，只有在假定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剩餘的增大只能通過消費減少來達到，而增加總生產量無助於增大剩餘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為基本「儲蓄資金」大小所限制的說法才有意義的。一旦這個假定不成立，而且增加總生產量的可能性存在時，所謂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便喪失了其絕對性，甚至變成毫無意義了。在這篇演講裏，我欲提給大家考慮的一個論點便是：工業化問題根本不是一個金融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制度的問題。如果這個論點假定是正確，則接着要提的問題便是比較各種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經濟制度，特別是比較無計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看看那者較適合於我們所要進行的經濟革命。

落後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農村長期存在着人口大量過剩，即農村中的人口除了從事生產的部份外，還有大批無法從事生產的過剩勞力。根據調查資料，這種人口過剩，在一些國家已達到驚人的程度。例如：東歐與東南歐七個主要國家（除開蘇聯）的農村過剩人口估計約等於農村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或一千六百萬（見Doreen Warriner：東歐的革命）。另外一種估計則認為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等國的農村過剩人口約佔農村人口三分之一、（見H. Seton-Watson：「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即1918—1941年的東歐」與Chatham House：「東南歐」）。在捷克斯拉夫克，此比例高達二分之一（見Doreen Warriner：「東歐的革命」）。印度方面的有關數字，我不大清楚。但是根據各方面的資料看來，印度農村過剩人口的比例數字至少與東歐相差不遠。除了採用原始的生產方法外，這些國家的農村就業量也時常呈現急劇的波動。農忙季節裏的勞動力需求的峯度與衰退季節里的勞動力需求波谷相差甚巨。而依賴土地為生的人口不但比平均勞動力需求

量高，甚至比農忙季節的最高需求量更高。

從這個真實的或潛伏在的候補勞動力的存在事實本身，產生了一個簡單的，然而對工業化問題的分析極端重要的結論：這就是經濟發展的阻力肯定不是勞動力的問題；而且工業生產或建設工程所需之勞動力不會與食糧生產上所需的勞動力發生競爭。因此，所謂投資速度基本上由先存在的「實際流動資金」所決定的傳統看法是不正確的。所謂工業、或運輸業、或電力發展等的投資要有事前的「儲蓄」為前提才有可能實現的說法，也是不正確的。（這裡「儲蓄」的意義是指一些人削減他們對食糧與消費品的消費、所節制下來的食糧與消費品則供應新增的工業勞動力。）經濟理論上的很多傳統看法在閒置着的、或非生產性僱傭的勞工隊伍的現實面前，已喪失了立腳點；在今日，這已是司空見慣。我現在所說的，只不過是把這個現代平凡之事特別應用到含有大量剩餘農村人口的農業國家。所謂人口剩餘，就是指超過現存技術資源及生產方法所能容納的人口。

如果對太明顯的事實不會過度強調的話，我將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看法。假定一個農業國家要實行建築鐵路或一系列電力站的計劃；也假定農業是該國的唯一生產活動方式。如果該國的勞工皆已生產地在田地上工作，則要把勞工轉移到鐵路或電力站的建設工程上，就只能以降低農業生產量為犧牲。如此一來，該國的每人平均生產率也降低了。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社會上某些人的儲蓄，無論是強迫性或自願性，將構成該建設工程的投資的必要條件。可是，如果該國已有過剩的農業勞工（在田地上無工可做，或非生產地被僱用）轉移勞工到鐵道或電力站的建設去便不會有降低農業生產量的後果（或者至多是稍微的降低），每人的消費量也必須削減。農村中的勞工轉移到建設工地去，農村的消費人口減少了，食糧有可能輸出，供應新增的工人的需要；留在農村的人口也無須削減消費。當然，在實際上，勞工并非能隨時地由農村轉移到建設工地去，或者食糧也并非能隨勞工的轉移起反應（這在後面我們將談到）。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涉及不同的問題，更有不同的意義。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那種情況下，工業投資不但不與農業競爭，且在相當短時間內，兩者反而相輔相成。於是，工業，在其可能成長的程度上，成為改進農

然而在流通過程中所消耗的這一筆純粹流通費用，是從何而得到補償呢？

有許多人就這樣的認為，這些流通費用則是由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中得到補償。這種看法是不能苟同的。其實用於純粹流通的費用，是由商業資本家將它加入商品的附加價格上去，從而將這些負擔轉由消費者（主要是勞動者）承當，因此對商業資本家的利潤是無所損失的。雖然表現出來是由消費者承當，但歸根到底，是由剩餘價值中的一部分作為補償。商品的價格因加入了流通費用而增加，而工人的實際工資便因而減少，也就意味着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他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增加了，而這增多的部分也就用到補償純粹的流通運費上去了。

隨着資本主義社會銷售商品競爭的白熱化，純粹流通費用日增，而廣大的勞動者的負擔日益加重，這就是資本主義寄生性加強的一個顯著特徵。

× × × ×

由于資本主義制度上的經濟危機與投機等原因，致使商品的流轉過程更加緩慢，而商業資本家也就需要更大筆的資本投到流通領域中來。同時許多代理商行、批發商行都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建立起來，這使商品的流通時間更加延長，而利潤的爭奪也就更加複雜化。這些都表現出資本主義腐蝕性與寄生性加強。

平均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從避免的歷史命運。商業資本的利潤率當然也不能避免其下降的厄運。

業技術與生產力的手段。

我上述所提的看法，或許會使工業化問題的整個討論方面發生急速的轉變。我相信，它一定遠離了對此問題的一般經濟分析的方向。我想它也同經濟學者與經濟史者對過去的、現在的與將來的工業革命所作的解釋發生影響。但是，在提出我所堅認為對實際經濟政策問題的正確理解與正確態度有極端重要的論點時，不可避免地，我把它過於簡單化了。現在我欲再作若干重要的補正。

首先，雖然我以為在農業國家里一般是沒有所謂勞工缺乏的現象，它們却可能有技術勞工（Skilled labour）的短缺現象。這種短缺可能變成工業發展的障礙。可是，克服這種障礙的辦法倒不是鼓勵儲蓄的金融措施，而是舉辦適當的技術訓練計劃。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只有工業發展本身才能有效地克服技術勞工短缺的問題。唯有在累積了工業生產的經驗以及工業生產技術後，才能培養出大批能掌握工業技術的勞工隊伍。

其次，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若干只能由外地輸入的工業設備（諸如電力站，鼓風熔鐵爐，動力機，卡車與機器等）的缺乏，也能阻延工業的發展。如果沒有外國貸款，則這些工業設備的輸入，只能靠增加農產品或輕工業消費品的輸出才能達到（或者削減其它的入口數量，也有同樣的效果）。在這點上，國內的消費的確要削減了，也在這點上，傳統的看法才包含有若干真理。可是，若農業國家有過剩勞工，就有可能轉移到生產輸出品產業去（例如，那些只須少量資本的輕工業與手工業）。只要能如此做，傳統看法甚至在這個問題上也要作重大的修改了。除此以外，如果我們又記住，這裡的問題是特殊設備的缺乏，即重工業設備的缺乏，而非一般生產資源的缺乏的話，則傳統看法的一系列其它結論也全要變形了。（傳統的理論有時以這樣的形式出現：落後國家勞工雖多，但資本稀少，於是需要「儲蓄」來解脫對現存資本設備的壓力。投資率的確為重工業的資本設備數量所限制。但是「儲蓄」可能會使專門生產消費品的機器設備變成閒置無用而完全沒有提高重工業的生產能力。）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金融措施可能不適用。蓋在那種情況下，落後國家所需要輸入的並非一般產品，而是特殊產品。增加儲蓄與節制消費的措施只是對那些能在海外找到市場的國內產品有間接的有利效果；對其它不適合出口的生產，則反而使它們的專門機器閒置無用，浪費掉經濟資源。

第三，必須強調，即使工業建設所需的勞工是由農村剩餘勞工來補充，這也並不意味着農村供給城市與工業區域的糧食會相應地增加起來。適當的工業投資並不能保證食糧生產一定會自動增加。農村的消費人口雖減少而有了多餘的農產品，但這可能被留在鄉村的人口所消費掉。留在鄉村的勞工，可能由於責任減輕了，便鬆懈了勞動強度，而趨向於享樂（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便是：農民對所得的需求是無彈性，結果農產品供給曲線向後傾斜。）在面對着無彈性的農產品市場供應，工業人口的工資與消費支出的增加，徒使農產品價格膨脹。乍然看來，農產品價格上漲似乎可以通過刺激更高的農產品供應本身來解決。其實，如果工業製造品的供應不

同時增加，農民無法使用他們的增加所得，這唯有驅使他們去尋求更大的享樂，或者驅使他們消費更多的農產品。

現在，若有任何工業發展的基本障礙存在的話，那麼我便要指出它即是這個市場上農產品的剩餘了，而非一般的農業總產量或生產率。這種市場上農產品剩餘在蘇維埃工業化的早期階段會起過嚴重的阻礙作用。基於此種市場上農產品剩餘的說法，我們可以重建一種類似「儲蓄資金」（Saving fund）的理論。但這種重建的「儲蓄資金」理論在基本上是與傳統的儲蓄資金理論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個工業發展阻礙因素在性質上是屬於經濟制度的問題，而且是必然的，自發的因素。這就是說：市場上的農產品交易數量在不同類型的農村社會經濟制度是有不同的比例（例如：大規模農場與專門化的小型農場或兩種混合農場的不同；集體農場與個體家庭農莊的不同等）。克服這種障礙也就不是提供適當的金融政策與金融機構的問題，而是對農村的社會經濟生活，對農業生產與城鄉交易作適當的調整與改組的問題。這裡有一個附帶的很重要的問題須要指出。工業投資計劃在實踐上不但將涉及到國民所得隨着工業人口就業量的增加的問題，也將在任何情況下涉及到人民的可支用國民所得的增加。市場上農產品的供應量增加，但若農產品交易量也增加，則農民與工人的貨幣所得也一樣增加（除非農產品價格絕對的削減，以及削減的比例高於市場上供應量增加的比例）。於是農民將能購入更多的工業製造品（或購買農具等）。另一方面轉移到工廠去的勞工將獲得比他們在農村工作時更高的所得，不論他們在農村是為家庭工作，受僱於富農，或靠乞食過日。這種所得的增加，在暫時消費品總供給無彈性的情況下，將刺激食糧，或製造品或兩者的價格往上漲。（上漲的程度根據消費品的供應與所得的狀況——即需求性大小來決定。）後來，由於工業投資的果實成熟了，生產量大增，消費品（至少是工業製造品）的價格便降回。必須重視的乃是這種暫時性的膨脹壓力并非是強迫儲蓄有否需要或已發生的象徵。即使是在每人平均消費量沒有減少的情況下，強迫儲蓄也會發生（當然，它對某部分人有利，對其它部分的人不利）。如果採取發行儲蓄公債或增加租稅的措施來應付投資支出的增加（也就是人民可支用所得的增加），這種暫時膨脹壓力當然可以避免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這是吸收生產活動所引起的利潤增加的有效辦法，雖然其有效程度是依賴於利潤被使用部分與被儲蓄部分的比例大小。但在社會主義經濟里，這反而是吸收工人與農民的過剩所得問題。這種過剩所得多少雖要吸收，但正當需要鼓勵農業勞工向工業遷移，以及需要增加農村對城市糧食與原料供應的時刻，用這種辦法來吸收剩餘所得，未免太不實際。如果說這些剩餘所得一定要吸收，這無異於說較高的工資水平是不必要的。由此可見，若干程度的膨脹壓力應被接受為任何大規模發展計劃所必然產生的暫時現象，增加國民所得的投資本身的副產品，而非時常被稱為「錯誤的金融政策」的產物。同時任何人的消費削減也並非意味着他的生活水平降低。（雖然實際上，如果追求利潤與投機活動不被制止的話，很多的生活要變

糟了。)

到現在為止，我所說的，是意味着在不影响生活水準的情形下，工業化的實際進程會受到若干嚴重的限制。與這個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是有關發展程序（order of development）的爭執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問題是前一問題的一種偽裝。投資是否應集中於農業，以便擴展與改進其它經濟領域的發展的「糧食與原料」的基礎呢？或者應優先考慮發展工業以便這樣的發展能為農業改進創造條件以及為農村過剩人口創造就業呢？若應集中發展工業，則到底要優先考慮發展生產消費品的輕工業，或者優先發展生產資本財的重工業呢？實際上，輕重工業兩者應皆兼顧，同時工業各部門也應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可是也有優先的問題——即有限的發展資源應如何在這些部門之間分配，以便使那一部門的發展最迅速。

這些問題的解決，是必須考慮到各種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因素。我不在這里作更多的說明。我只想提起有關經濟因素的部份。以純經濟的觀點來論，投資的決定是涉及三度空間的問題（Three Dimensions）。即一般所謂投資速率問題，涉及在一定時間內，將一定量之資源用于一定的建設工程的決定。此決定是關於在一定年期或五年時期內，創造「貯藏勞動力」的數量問題，在選擇「貯藏勞動力」的方式時，我們也要考慮到這個勞動力要貯藏多久，然後由它取得更大量的消費品的問題。如果你喜歡，就稱它為投資的時間問題里。一般上，輕工業的投資比重工業更快更早地產生果實。重工業是消費品工業將來的擴展的基礎（必須注意，這只是一般而言。還須視總投資計劃的規模，特別是分成廣泛的建設工程，還是集中少數建設工程而定）。若是選擇輕工業，則不久，消費者所得增大，新的工廠紛紛開工，消費品源源不斷地供應到商店去。可是，將來的工業發展速度，會由於生產機器與工廠裝備的工業受到限制而緩慢下來。這樣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工業擴展將不比在首個五年計劃時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速度來得快。反之，如果一開始便優先發展重工業，在起初的幾年內，消費品的供應稀少，但在第二個及以後的五年計劃里，工業發展將很迅速。因為生產機器與工廠設備的工業基礎已打下來了。這就是所謂「成就小但很快實現」及「最終成就大但很慢實現」兩者之間的選擇。這就好比在現存建築物多蓋一層樓——很快地供應居住的新地方——或建立新的基礎以便將來在其上蓋起更多的高樓大廈兩者之間的選擇。

這就是1920年蘇聯計劃者與政策決定者所面對的抉擇。也是當時討論與爭辯得為最劇烈的課題。不用說大家已知道後來的決定是優先發展工業，而把輕工業建設置於第二位。

這種選擇，宛如軍事戰略的制定。不但戰略所涉及的各個部分要密切地相互配合，而且戰略一決定下來，將來可能做的事也跟着決定下來——當然并非很長遠的時期，而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於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優先發展輕工業的決定，將會決定了第二個及第三個五年計劃裏的消費水平以及將來工業發展的水平。相反的，若優先發展重工業，在未來十年，十五年內，只有小比

例的國民所得用于消費，但在更久的將來，則維持高速度的工業發展是容易的事。

過去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程序一般上是很緩慢；先投資于農業或開礦業，然後再到輕工業，特別是紡織業，最後才投資于重工業。這點可由那些擁有富饒的資本遺產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諸如英美，有着高度發展的重工業，而歷史較短的資本主義國家則沒有或很少有重工業這一個事實得到證明。這種發展程序傳統上被認為是最正常與最自然的程序。有一些人更進一步地說世界各地皆發展重工業的作法是違反國際勞動分工的原則。這種觀點時常見諸於下列言論中：世界那些擁有較高資本勞工比例的地方應該專門負責「使用資本」（capital-using）或「資本集中」（capital-intensive）的工業，而那些有較高勞工資本比例的國家應專門負責「使用勞工」的工業（Labour using）這種觀點是靜態的。它從各國一定的資本擁有量出發，而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在于增加資本現存量以及資本增加的速度。很明顯，許多年輕資本主義國家輕工業之所以發達，而重工業，不發達的原因是：他們要由發達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工廠設備才能發展其重工業。國際貿易有凍結現存國際工業分佈模型與資本擁有量以從而凍結落後國家於一定發展水平的作用。與這種停滯勢力對比，落後國家的資本累積動勢還不足以推進其國家進入另一較高的發展階段。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些年輕資本主義國家增加資本裝備，發展重工業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如果所有國家能增加資本擁有量，那麼沒有理由為何長期的國際分工要沿着傳統的路綫繼續下去。否定專業化應沿着傳統路綫並不等於說不要專業化。特殊的重工業產品是需要專門化，正如同輕工業與農業之專門化一樣。例如，現代之機器種類與數量眾多，除非是一大國，不然要一國同時都發展這些重工業設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各國可集中發展某一種工廠設備，而後互換有無。問題中心是，沒有理由要遵循把世界劃分為少數幾個高度發展的國家與大量殖民地地區的傳統路綫。

最後我要提到不同發展部分之相互聯系與互相依賴之關係。這個問題有特別的意義。我曾在第一講是說這種相互聯系的關係是維持資本主義投資的動力。我相信，問題還有其另一面。若這個動力不存在或虛弱，則這種互相依賴關係反而變成阻力。當其它條件還未成熟到足以獨立地大力刺激投資的地步，這就是工業化進展緩慢的一個主要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把私人企業當成是特別有進取心完全是幻想。我甚至要进一步地說，這也是何以私人企業不能擔負工業變革的重任的一個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當然多數經濟決定是相互關連的。——在某一部門的生產發展為其它部門的發展創造多數效用的這個意義上，這是薩氏法則（Say's law）所抓住的一面的真理。我這里所談到是更密切的互相依賴性，即一個經濟決定缺少，另一個經濟決定將是不可能與不完整的那種互相依賴性。這包括共同的需求，不管這需求對各事物是一定的比例，或是可變動的比例。於是在一個地方興建一個工廠將毫無用處，除非在那里也

建新鐵道。一個投資也意味着須先有另一種投資。如果要使勞工長期地在那里工作的話，則還須建築房屋與各種公益事業。再者，在鄰近地區建立供應消費品的工廠或可利用副產品的工廠也是很有利之事，雖然并非一定絕對要不可。有無這些，就能決定到底這樣一個投資經濟不經濟。現代工業是需要各種各樣的組成部份（汽車與飛機工業是最好的例子）。各種需要利用到其它專門生產產品的工廠，是以這些專門生產產品的工廠是否存在為其存在的前提。現代大規模合併的重工業，也是聚集各個有關的生產過程（例如鋼爐工業，焦煤工業，化學工業等）。它們之間是有相互供給與需求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生產在一方面的發展，也使其他方面跟着發展。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便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所謂「外部經濟為學」（external economics）的研究範圍。不同工業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少被人注意的，且其意義不為人所賞識。而這種關係不限於一種工業之經濟內，而且還在一個工業與另一個鄰近工業之間存在着。

為經濟學者們所熟習的一個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cs）的結論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里，投資的決定是受到每一企業能賺取多少利潤的考慮所左右，而這個考慮把該投資所能引起的其它效果撇開不計。這就是說，投資在經濟制度的其它部分——在該企業的範圍之外——所產生的有利或不利的影響，被這種投資決定所忽略。當我們把這個問題置於動態的場合里，則某種需要其它投資同時存在為其存在前提的投資，不論在全面來看它是多麼合理與合乎經濟化原則，也不會被採納。在利潤預期極端樂觀的情況下，或許它不會遇到這種命運。但在利潤預期正常化的情形下，即使最大膽的投資家，也會畏縮不前。無論如何，這類的投資需要巨額的附加成本這個事實使它實現的可能性變成很狹小，從而使投資沿着謹慎穩當的道路前進了。

在這里，我認為計劃經濟在基本上的優越性應該使它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特別是在這種各經濟部門相互依賴關係已成為嚴重的革命的轉捩點時期的主要因素的時期。將單獨的，自主的企業家的投資計劃擴大到整個社會的投資計劃，才能使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的關係得到重視。這也第一次使到以整個複雜的經濟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在事前獲得的調整，來代替由傳統的市場價格制度很緩慢提供的事後調整成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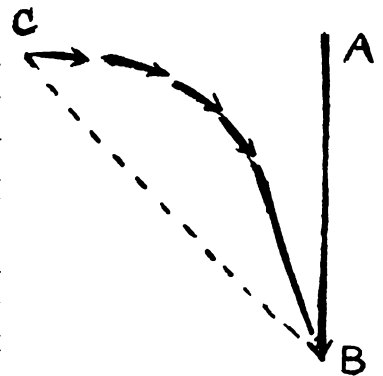
這各種經濟部門相互依賴的關係的可能調整不但是在空間上（即各不同產業與經濟部門在同一時間內所作出的決定），在時間上也適用。這點特別是指某個投資計劃的技術方面。最經濟的計劃方式將是既考慮到將來投

資可能維持的速率，也考慮到在某個工廠設備的壽命期間內，技術創新的可能方向與速率。在非計劃經濟里，這些情況全然不得而知。至多是企業家以過去的趨勢來猜測將來的趨勢罷了。這種猜測必然發生了兩種相反的結果，當技術創新速率被預測為急速時，工廠設備早在其完全折舊時便拋棄了。在這種「天折陳舊」很普遍的美國，企業慣常於在事前給予工廠設備以很高比率的折舊費（結果使當前的營業成本大大增高）。在另一種情況下，大量陳舊資本設備的存在變成使用新生產方法的障礙物，從而阻延了技術創新的速率。這兩種結果皆屬經濟上的一種浪費。良好的經濟計劃當然不能完全不考慮到這種不確定將來趨勢。每個經濟計劃應高瞻遠矚，如果它要成為實際的而非烏托邦式的計劃的話。經濟計劃的時間性也可能比工廠設備的壽命期限來得更短（或者在一個複雜產業單位，取各個組成工廠設備的壽命期限的最高因數為其時間性）然而，計劃經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消除這種不確定性。只要能如此，則達致某種經濟目標所需的投資數額便能很經濟化地使用，從而更迅速地與更節省地達致該目標。

在這裏，我要用著名的「追逐綫」來比喻這個問題。我願用它來結束這篇演講，因為這個簡潔地說明了計劃經濟在經濟發展上的作用的比喻，是含有若干真理的。

這個「追逐綫」可用通俗的例子來說明。有一隻狗由C點（與A B綫成直角）追向它的沿着A B綫騎腳車前進的主人。（見附圖）。由於這隻狗是反射作用的動物，它時常以其主人在A B綫上的剎那間的位置為方向而奔向之。因此這隻狗的追逐路綫是一條曲綫，即A B的漸近綫。如果這隻狗像人一樣有理智的話，它將預算其主人不久將到達A B上之某點，而由C沿C B直綫奔跑，這樣其追逐路程將縮短得多。C B曲綫將好比無計劃經濟為達致一定歷史目標所走的道路，而C B直綫則好比計劃經濟為達致同樣歷史目標而去的理想道路。

這個比喻是有限制的。它假定所追求的是同樣的歷史目標。實際上，兩種經濟的歷史目標不一定相同。而更切實地說，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的最主要不同點是在於兩者各自所定的歷史目標，對一個經濟制度來說是符合實際而對另一制度來說則不符合。



編 後 話

幾經努力，這一期的集刊總算出版了。我們感到慚愧的是：正當大家需要我們在出版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時，我們却久久未能響應。這種局面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堪的。然而事實如此，我們惟有期望日後情況會好轉起來。

我們深深感到：沒有把理論和實際好好結合起來，就不能搞好學術研究；沒有良好的學術研究就不能保証

出版工作的美滿。然而，為什麼理論和實際會結合得不够好呢？檢討起來，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主觀上，我們南大同學對現實社會還不够關心，對新鮮事物還不够敏感，還未能從千變萬化的現實中發掘與解決各種問題，因而，在探討過程中，就不免陷於概念化、公式化。往往文章寫來洋洋大觀，衡量起來又沒有多少斤兩。客觀上，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真正的學術研究自由。我們迫切

亞比倫哥



備設氣冷

五一九七二：話電 號十百二路馬大坡大洲星

優特：人藝；儷結；學社
待別：像術；影婚；校團

大亞參茸藥行

新加坡吉寧街門牌一二〇號

電話：七五一三六·七一九七一

電報掛號：TYEAHMED

營業範圍：

- (一) 代理及批發中國藥材、成藥、參茸幼料及世界各國名廠成藥。
- (二) 附設中國提煉藥部廣泛經售中國各名廠提煉成藥及單味藥。
- (三) 附設門市部專門零售鹿茸、人參、洋參、高麗參、白木耳、珍珠、羚羊等珍貴藥物及中國提煉藥，各國成藥等。

和源魚業

新加坡美芝律鐵吧殺內魚檔四號及七號

HOE GUAN FISHMONGER

No. 4 & 7, BEACH ROAD MARKET,
SINGAPORE.

需要正確的理論來武裝自己，我們熱心地尋找實際情況的資料，然而我們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甚至，我們在刊物上寫點淺薄的東西，還要時刻顧慮會不有千斤重担壓到自己的身上來！

然而，我們到底還是硬着頭皮「擠」出來了。我們只是衷誠期待着大家，給我們批評，幫我們努力，讓我們有勇氣磨練自己。

× × × ×

雖然我們知道自己的成績「微不足道」，然而既然大家都對它這麼關心，對那些在百忙中為我們整理資料，撰寫文稿的朋友，我們是應當在此表示萬分的感激的。同時，有好些文章還值得我們加以介紹。

范小秋君所作有關馬來亞對外貿易一文，相當全面地檢討了這廿年來我國的對外貿易情況，並且還指出了各個時期的特徵，這和時下一般討論貿易的文章之只在表面現象上鋪敘，是大不相同的。

「英殖民主義侵入北婆三邦的幾個歷史問題」及「二次大戰以來聯合邦的民族教育問題」則分別從本質上研究了英殖民主義者如何在各方面進行其對我國與北婆人民的侵略與鎮壓。

「包工制在建築業」與「馬來亞紗廠為什麼會關閉」則具體地反映了本邦建築業及紡織業的真實情況。

小川君的「我國民族問題的歷史的具體的特徵」提出了他對這一向來少為人所注意的問題的看法，值得大家進一步深入探討。

此外，秦林秋君與史丹青君分別說明了研究我國經濟、歷史的當前任務，提出了頗為中肯的見解。陳蒙鶴先生特地介紹了馬來亞的回教改革活動，使我們更好去認識兄弟民族的社會情況。

我們期望着今後的學術研究能在我國人民的改善生活環境的奮鬥事業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讓它像鮮花美果來奉獻給奮鬥中的人們。

世界馳名哥拉牌高貴花布

總代理

陳漢盛出入口商

星加坡十八間後門牌三十六號

電話：九二六四九

吉隆坡安都街門牌二十七號



星馬婆總代理：金星公司
新加坡源順街8-A 電話：70232-70233

南大小販部 (即南大小餐廳)



地點清靜 • 最宜談心
烹飪高明 • 大快口胃
各色飲食 • 日夜常備

社會科學研究會 歷來出版刊物

- (一) 社會科學研究集刊 (一至九期)
- (二) 社會知識 (一至三期)
- (三) 馬來亞經濟建設講座
- (四) 武吉知馬區副糧生產
- (五) 社會經濟調查報告書
- (五) 一九六一年星洲池蝦業
- 經濟地理調查報告書

雲南餐室敬賀

向社會科學進軍

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

源源船務有限公司

新加坡直落亞逸街二十三號

電話：九五五三一

電報掛號：GUANSHIP

GUAN GUAN SHIPPING LTD.

23, *TELOK AYER STREET*,

Cable Address "GUANSHIP"

P. O. Box No. 1145

Tel: 95531 (10 Lines)

SINGAPORE, I.

四海源有限公司

新加坡源順街門牌三十七號

電話：七七九〇四

SOE HAI GUAN CO., LTD.

37, *Telok Ayer Street*,

Tel: 77904

Singapore, I.

CHER HAK & CO.,

51. *BOAT QUAY*,

SINGAPORE I.

TELS: 73963
94301

利安金舖有限公司

金飾滙兌 零沽批發

(冷氣設備)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六至二〇八號

電話：七四二一八・七四二一九

LEE ONN CO., LTD.

GOLDSMITHS & JEWELLERS

(Airconditioned)

No. 206 & 208,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I.

TEL: 74218 & 74219

新順興

星洲裕廊路(南洋大路)卅一，十五號

SIN SOON HIN

31-15, *Nanyang Avenue*, 14 $\frac{3}{4}$ Miles

Jurong Road, Singapore-22

本專京什歐各罐食日洋諸光無歡
號營菓貨美式頭品用貨君顧任迎

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

再接再厲

向學術疆場邁進

雲南茶室敬賀

TIN SING GOLDSMITHS LTD.,

JEWELLERS.

Nos. 215-217,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1.

電話：經理部：76581
TEL：營業部：71869

本公司有：十足的純金。上等
的鑽石。白金精美製作的飾品
• 光亮奪目的珍珠玉器。• 備
蒙惠顧。• 不特價格相宜。• 且
服務週到。• 保證你稱心滿意！

與榮耀！
• 配戴天成金舖精製之珠寶首飾
• 會帶給小姐太太們無限艷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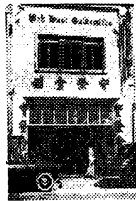
天成金舖有限公司

新嘉坡大坡大馬路二一五及二一七號

請到

寶發金舖

購買妳心愛的首飾



白黃珍寶鑽翠
金金珠石石玉

樣樣齊全·金質純足·工價便宜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新街口)五九六號

電話：三〇一六一

POH HUAT GOLDSMITHS

596,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TEL: 30161

新加坡

德美公司

蜆殼標

武吉智馬服務站

TECK BEE & CO.,

Shell Bukit Timah Service Station

3-A, Bukit Timah Road, 7¼ m.s.

Singapore, 21.

TEL: 68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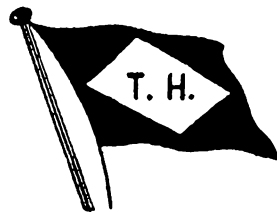
武吉智馬律三號A(7¼哩)

電話：六八四八一

德華船務有限公司

新加坡勿基門牌十二號

電話：九五六四一·七二九五〇·九四七二二·九四七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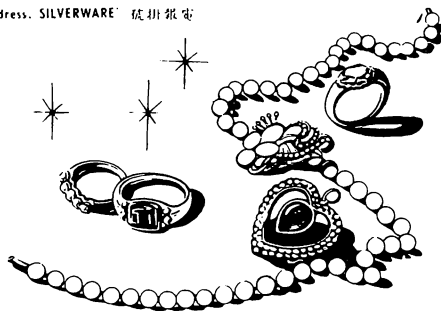
Teck Hwa Shipping Co., Ltd.

12, BOAT QUAY, SINGAPORE, 1.

Tels: 95641, 72950, 94722 & 94723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門牌一八五號：總行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門牌六十三號：分行
 大坡大馬路門牌六十六號：工廠
 HEAD OFFICE NO 185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NO. 72950 / 72952
 BRANCH NO 36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NO. 95107
 FACTORY NO 66 CLUB STREET TEL 72515
 Cable Address: SILVERWARE 德華銀器



麗光齋金莊有限公司

LEE KONG CHYE GOLDSMITH LTD

字號最好 信譽最足 金質最宜 工錢最廉 赤白金飾 珠寶鑽石 一批零售 一律歡迎 委託造價 定期交貨 款式如心 保証滿意 外坡委託 多配不誤 如從何寄 悉從客意 本莊禮券 瑰麗堂皇 贈親友 惠大友



合利成建築有限公司

新加坡小坡羅米歌(即三角埔)四十二號

電話：{ 三五八〇四
二一六六四
二八三〇八



HUP LEE SENG
CONSTRUCTION CO., LTD.

No. 42, DHOBY GHAUT, SINGAPORE, 9.

Tels: { 35804
21664
28308

社會科學研究集刊

出版者：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

編輯者：南大社科出版股

發行者：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

印刷者：文化印務公司

日期：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定價：每冊五角